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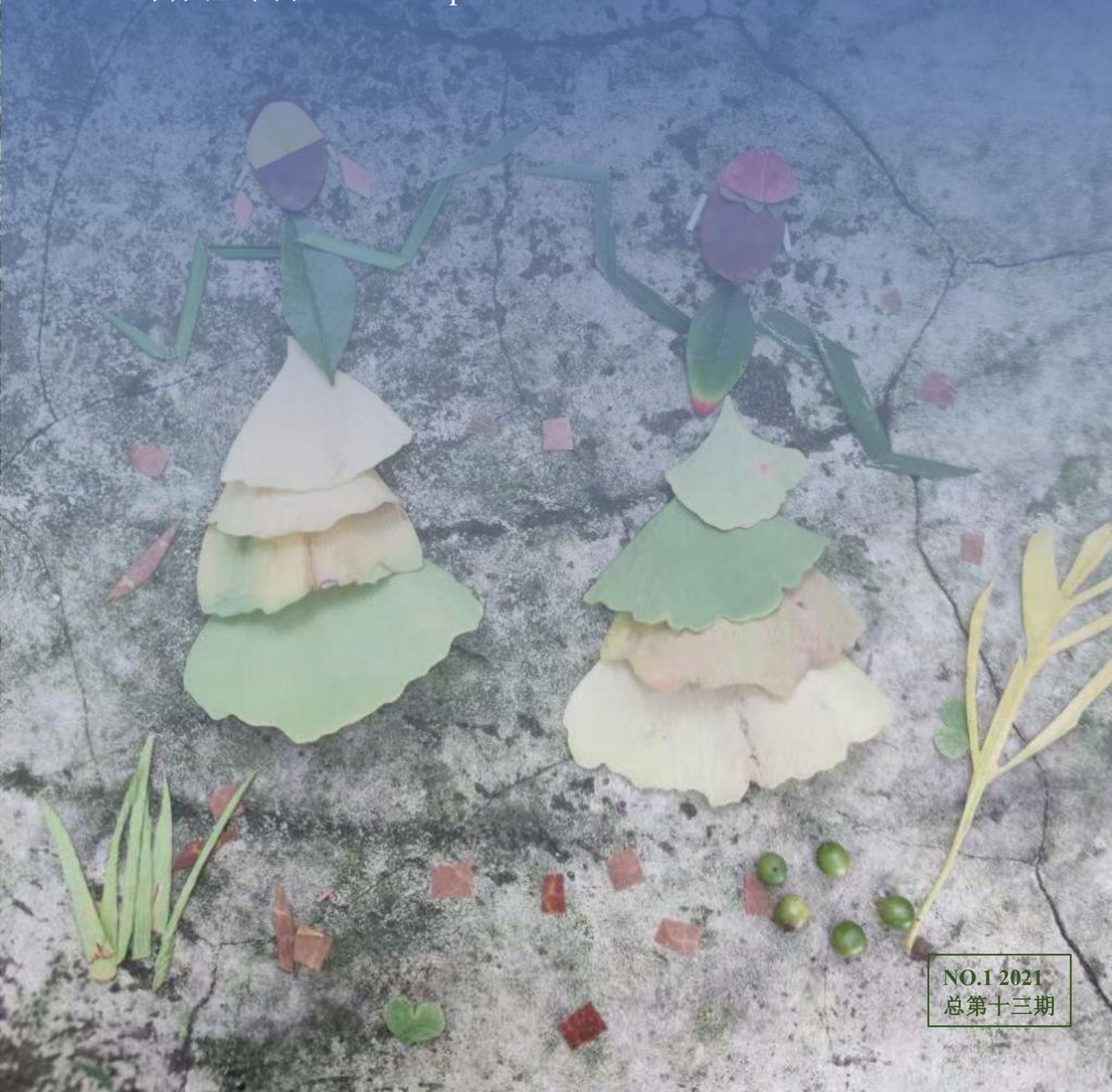
哈佛-复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 FRIENDS OF ANTHROPOLOGY

# 人类学 之友

田野体验专刊 Field Experience



NO.1 2021  
总第十三期

## 学术顾问

哈佛大学人类学资深教授 凯博文

加州大学-洛杉矶（UCLA）人类学资深教授 阎云翔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陈宏图

## 主编

潘天舒

## 编辑

胡凤松、邱子晏

## 封面设计

胡凤松、储怡安

NO.1 2021  
总第十三期



# 目录

## 本期主题 | 人类学田野方法

---

---

### 辑一 2021 年适老科技暑期学校专题

---

---

- 004 认知障碍诊治及照护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 005 从需求出发的智慧养老与数码赋能
- 007 设计思维与社会创新
- 009 老年人的移动与移动科技
- 010 一线老年工作者圆桌会议
- 010 孝道与孝行：内在连接的基本模式
- 011 The Mixed Blessing of Living Together or Close By
- 012 中国农村养老和老年心理干预
- 013 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 014 老年人的记忆与记忆偏差
- 016 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构建
- 020 信息化发展和构建智慧老龄社会
- 023 空间以及空间视阈下的老龄议题研究
- 026 护工陈阿姨
- 027 “以人为中心的认知症照护实践” 圆桌会议
- 027 参与学员感悟

---

---

### 辑二 疫情观察笔记

---

---

- 036 新型冠状病毒的居家隔离 37 天日志
- 049 新冠疫情下的“发热”与“乏力”
- 053 “剃发战士”与“英雄母亲”——新闻中的“新冠女性神话”
- 058 对疫情相关展览的文化人类学观照
- 062 关闭的摄像头：网课时期的一个细节
- 066 疫情中的群体对于社交中道义互惠的理解
- 072 医院疫情志愿者故事
- 082 新冠疫情观察笔记：如何得到我的口罩？
- 088 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新加坡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 102 疫情笔记
- 105 新冠疫情如何重塑乡土的亲属关系与互惠关系：密而不亲
- 109 新冠疫情观察笔记——谈到“抄作业”你会想到什么

- 114 “疫情中的城市”观察笔记
- 120 “疫情中的城市”观察笔记——以山西长治沁源及网络所见为例
- 126 疫情观察：何以“正常居家”？
- 130 疫情中的田野观察——再定义中的“洁净”空间

---

---

### 辑三 课程作业选编

---

---

- 135 洁净与污渍——基于北区食堂田野观察的研究设想
- 140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 144 课程群里，我为何不愿说“谢谢”

---

---

### 辑四 复旦人类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选

---

---

- 151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技助老项目研究——以上海市 Y 街道老龄社区加装电梯为例
- 152 产前基因检测中的风险话语与实践：以上海市某胎儿医学中心民族志研究为例
- 153 民族志视角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基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田野研究
- 154 制造需求：人类学视角下 HPV 疫苗推广的话语实践研究
- 155 多重语境下的“规范治疗”：基于重症肌无力罕见病的民族志研究
- 156 “活在当下”：中国当代都市正念身体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作实地调查。要超越接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你所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语言、传统，入乡随俗，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

----费孝通<sup>1</sup>

---

<sup>1</sup>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年8月“北京论坛”发言），载《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辑一 2021 适老科技暑期学校专题



## 专题引言

后现代条件下带有高度多元色彩的人类学研究风格多变。在专业化、细分化和产业化的合力作用之下，学理探讨与应用实践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得该学科渐渐成了成了“表演才华的戏台”和“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费孝通语），进而渐渐失去了对公共领域，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大众媒体乃至大众社会应有的影响力。有鉴于此，复旦人类学师生秉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的理念，试图使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技能，去应对一个无常莫测的老龄社会本身带来的困扰，去思考和尝试解决包括长者照护服务传递在内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复旦研究生院的有力支持下，从 2018 年第一次举办适老科技暑期课开始，到 2021 年，复旦人类学教研团队已经坚持 4 年举办适老科技暑期学校课程。本辑《复旦人类学之友·田野体验专刊》辑录 2021 年暑期课程的纪要，从这些纪要中，读者朋友可以领略不同学者实践人类学方法的不同风格，也可以领略人类学方法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在人类社会愈加复杂，挑战愈多的时代，以记录和捕捉当事人的观点、意见和言语（native's views, opinions and utterances）这些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田野研究要素的，真正“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语）大有可为。

# 认知障碍诊治及照护体系的实践与探索<sup>1</sup>

黄延焱教授根据“认知障碍诊治及照护体系的实践与探索”这一主题展开分享。黄教授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科主任，兼任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首先她对目前老龄化的现实进行了介绍，2020年的人口学资料显示上海2020年沪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36.1%，65岁以上占25.9%，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5.6%。“纯老家庭”老年人数157.79万，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老年人数35.39万。而65岁以上认知障碍的发病率为5.6%，发病率每五年翻一倍。85岁以上患病率40%左右。认知障碍患者早期表现为学习能力下降和记忆的减退；随着病情发展，除了有记忆力减退、学习理解及逻辑思维能力下降、执行日常工作能力减退、定向障碍（时间、地点），并出现行为及人格变化，表现为精神行为改变（焦虑、猜疑、易激惹、幻觉、虚构及戏剧性的情绪波动）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在社区97%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没有获得诊断，一些家庭并不能意识到老年人存在认知障碍。一方面是因为子女和老人共同生活时间不够，无法即使发现老人出现的认知功能障碍症状，另一方面可能是亲人认为这是老化的一部分。首先，早期识别存在问题。在一项纳入8042人次的神经内科门诊调查中，41例确诊痴呆患者，其中22例(53.7%)在门诊时未得到诊断而在此次调查中确诊，原因是这部分患者以非认知功能障碍症状就诊，而门诊医生仅关注患者的躯体症状，未询问患者的认知功能症状，也未进行神经心理量表测查，导致痴呆漏诊和延误诊治。此外即使确诊了，56%的中度AD未获得诊治，贾建平教授团队针对国内36家医院神经科患者进行为期7个月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其中AD患者接受抗痴呆药物治疗的比率痴呆30.1%、患者接受抗痴呆药物治疗的比率23.6%，接受药物治疗的比例不高。一些家庭对于药物的理解存在差异，认为吃药一定要有效果但是认知症有其特殊性，治疗起的是延缓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一些家属断药，此外认知症就医存在困难、患者和家属对疾病存在悲观态度，也导致治疗比例不高。

黄教授介绍到认知障碍诊治中也存在着许多困境，首先痴呆起病往往隐匿，患者及配偶并不能意识到；公众对相关症状知晓率低；以及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疾病的了解有误区对痴呆这个疾病有很强的羞耻感；常因为并发症和精神行为症状就诊。

黄教授团队在2020年对公众关于认知症的认识进行了调查，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对认知障碍的知晓度明显提高，但对认知症者的恐惧、偏见、歧视仍旧存在；（2）科普在提高公众对疾病认识上的作用必不可少；（3）对认知障碍的诊治和照护应该是全方位、全病程的；（4）为认知症患者及家属提供触手可及的服务十分重要。

黄教授也介绍到认知障碍不仅影响患者本人，它影响患者的整个家庭，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看护者，她需要24小时日夜看护，存在着极强的身体及精神压力以及需要承担误工及收入损失。患者的配偶由于难以应付沉重的看护负担易衰老，他的子女及其他小辈同时承受职业、家庭及社会责任困扰。

面对认知症诊治存在的问题，黄教授及其团队做了许多努力。首先对公众进行科普，翻译和出版科普书，通过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希望可以改变就诊低的困境；其次对社区医生培训，推动认知障碍纳入慢病管理体系之中，以及进行认知功能量表培训及社区筛查认知量表评估师培训，希望能够解决一些患者及其家属存在回避和抗拒现象；并

<sup>1</sup> 黄延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科主任，兼任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14日黄延焱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21级研究生杨如冰。

且推动科技应用，如将 AD8 自筛查量表纳入到上海健康云、在社区进行人机互动，开发一款日常情境下的认知评估“游戏”软件。针对当患者处于迷茫无助的阶段时，开发了认知症服务地图 2.0 版应用，为认知症患者提供能够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信息。

黄教授介绍到阿尔茨海默病是可治疗但不能治愈一个疾病。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药物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及有效延缓脑功能的衰退，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看护者的负担。目前 AD 治疗是单药或两类作用机制不同药物的合并使用，而非药物治疗是重要的补充，在早期鼓励患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活动，尽量维持其生活自理能力，能够延缓脑功能的衰退速度。在实践层面上，黄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了相关课程设计，在社区街道开展居民认知行为干预。课程涉及对老年人进行认知功能训练、身体锻炼；以及对社区的社工、社区医生、对照护者进行培训。

## 从需求出发的智慧养老与数码赋能<sup>1</sup>

陈虹霖老师具有丰富发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本次讲座她从四个方面展开介绍了研究内容。首先她提出老年人正面临着数字鸿沟，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使用，在极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致了“数字鸿沟”现象。社会群体中一部分人群对信息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另一部分人群融入程度较低，其本质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知识权力上的不平等。老年人由于其信息弱势的天然禀赋，很难靠自身完成对数字鸿沟的弥合，实现数字赋权。尤其是疫情的爆发，对于老年人的互联网操作技术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要求。数字鸿沟现象引致数字权力失衡，老年人数字融合已成为社会服务重点。而社会工作干预是老年人数字融合的重要途径。

其次陈老师介绍到面对这些现象，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回应，着重对上海近期发展进行分析。介绍到在 2019 年上海开始试点建设智慧养老，政策频出，在 2020 年上海公布首批 12 个智慧养老应用场景，破解智慧养老“叫好不叫座”之困。指出应落实上海市经信委和民政局联合发布的智慧养老四大类 12 个应用场景，ITH 中国智慧康养产业价值榜组委会在四大类 12 个应用场景基础上补充，组成六大类 14+x 应用场景。并且养老行业内首次以养老机构、康复机构视角评选智慧康复、智慧养老场景解决方案，通过几十位养老机构和康复机构负责人角度，寻找中国切实解决老人需求的具有价值的智慧养老、康复场景解决方案。随后在 2021 年 6 月，上海发布了第二批 8 个应用场景。

第三部分陈老师从老年服务、创新、以及场景需求展开分享。她详细介绍了一些场景分类。

在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困境中，“认知症老人防走失”是重要场景困境之一，指出了存在以下几点困难：（1）手表耗电较快，子女忘记充电。产品关机功能发挥失效；（2）容易被老人从手腕上面摘掉；（3）手表、手环以及徽章的颜色设置过于醒目，标签化现象；（4）手表、手环以及徽章的设置过于厚重，会产生拒绝佩戴的行为；“泰国高中生芯片袜子”（5）感应芯片轻薄微小，类似于“名片贴”<sup>1</sup>，可以贴在老年人的衣角，避免了老人随意摘除的风险，当携带感应芯片的老人离开社区或者机构会引发报警，但无法安装定位系统，如感应芯片的终端设备反应迟钝，寻找仍是难题；（6）智慧化产品的精准度仍需要不断完善，产品本身会存在误报以及不报的情况。（7）价格昂贵。此外还有对

<sup>1</sup> 陈虹霖，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工作学系副系主任。本纪要根据 2021 年 8 月 14 日陈虹霖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 2021 级研究生杨如冰。

于“认知症污名化现象”，陈老师提到在产品的设计过程如何面对解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和建设解决这些问题。其次认知症居家训练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患者家属需要技术支持。

陈虹霖老师分享了第三个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困境----失能老人护理及救援。

尤其是一些辅具产品，首先辅具租赁受到市场化产品的制约，部分智能化产品落地以来，很快就会受到同质化产品的价格挤压。其次产品不具备适老化特征，以智能马桶为例。智能马桶在手柄上安装有一键报警装置，如果老年人在卫生间不幸发生意外，对于已经摔倒在地的老年人而言，如何去马桶边操作智能报警装置是一个问题。所以许多产品的适老化特征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此外紧急呼叫或者报警之后，报给谁、如何进门、误报的处理，也是存在的问题。并且护理产品费用不亲民。

在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困境中还存在着智能相伴以及老年人自我实现这一困境。

如现在的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运营，它需要伴随着硬件的适配。并且点播功能待完善，人际互动有待增强，老人处于信息的被动接收方。此外交流互动性不足、亲代交流功能亟待开发；落地缺乏人群细分，针对不同老年群体的定制服务有待开发，也是 IPTV 存在的问题。

陈老师还介绍了“花样百姓”这一服务平台，它是百姓网通过智能化的方式依托于公众号、小程序以及 APP 专为“50+”人群提供专业的线上线下学习、活动、赛事以及消费等多元化的为老服务，旨在于提升老年用户群体的退休生活品质 and 幸福感。内设花样大学、花样领袖俱乐部、花样活动板块，老年美容整容行业，老年模特班。

第四，机构监管也是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困境之一，目前来看存在着安全隐患、价格昂贵、技术漏洞、伦理问题这几个方面。其中安全隐患，出于认知症老人安全的考虑，机构不得不在消防通道也设置梯控，但是这带来了消防安全的隐患；而人脸识别+体温测量+访客预约系统价格昂贵，机构资金不足，所以该技术的应用尚未实现，仍处于规划阶段；一些已经投入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的机构反映，目前的人脸识别系统虽然在精度上已经可以达到 99% 的识别准确率，但是该系统目前缺少查重功能，存在重复识别出现在附近的老人的情况；部分老年人对于人脸识别较为抗拒，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该技术即使已经成熟也较难在老年人中推广。

机构照料是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之一。一些护理程序通过电子化平台实现，员工通过手环/二维码上传服务数据护理人员每两个小时就需要走到老人床前扫手环，手环设置的反应时间是 30 秒，30 秒后才能扫成功，老人的情况即可上传到公司后台，便于监管。没有按时扫手环，罚款 200 元/次。每 2 小时扫手环上传老人情况相当于工作人员定时打卡，这 30 秒的等待时间意在保证护理人员真正关注老人状况，避免护工为了完成任务而打卡。类似的方式也在徐汇区第二社会福利院被应用。但是存在管理系统研发成本高等等问题。

最后陈老师分享了远程医疗以及慢性病用药也是发展智慧养老中的重要场景。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医院方还是平台方都存在一些意见。“远程医疗现阶段仍是伪命题”，陈老师介绍到还存在以下这些问题，（1）技术障碍（2）难以精准诊断（3）医疗资源紧张，一方面增加了医院和医生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4）健康云知晓度低（5）数码隔离导致健康云实名认证困难，三种认证方式对于高龄老人来说都较为困难；（6）自主检测工具简单，只能进行基础指标的测量和疾病风险的粗糙初筛，对于真正有医疗需求的老人缺乏实际应用价值。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慢性病用药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如（1）开药困难（2）无法实现自动放药分药（3）服药依旧依靠人工监督：智能药盒提醒吃药功能的目的是为了监督老人按时吃药，

但是老人到底是否吃药依旧需要护理人员监督看着老人把药吃下去后扫描二维码上传这一服务内容。自动的、智能化的监管尚未实现。

在第四部分,陈老师针对数码赋能这一主题展开。介绍了一家社会工作组织——“夕阳再晨”及其工作成果,发现其针对老年人所做的干预取得了一些成果。这对于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启示颇多。1.社工要做好推动者。社工在干预老年人信息技术普及的过程中,核心是发挥专业能力搭建平台、构建环境、协调资源,而不是陷入产品开发和普及本身,这样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将专业服务开展得高效高质。2.对老年人来说,信息技术普及活动的教学内容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普及的过程是否让老年人感受到对数字权力的掌控。因此,社工机构在信息技术普及中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激发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的兴趣;(2)为老年人信息技术学习构建相对较少压力的环境;(3)不强调教学效果,不强迫每个人学习速度都一样;(4)除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外,还应关注个人发展。

陈老师总结道:对于以夕阳再晨为代表的社工机构而言,所提供的信息技术普及服务仅是广义数字融入成功要素的能力建设部分。而数字融入需要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努力,智慧场景落地需要多学科合作,社工是学科链条中重要一环。

她指出智慧养老的本质是利用先进的技术与服务的力量,协助长者及其环境与系统进行良性互动,满足需求,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过程。需要多种要素:(1)主体平等,包括长者、长者服务的系统、为长者服务的系统之间的平等共融,这需要文化和价值观的养成。(2)主体间、主体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这需要良好技术的辅助(3)需求的满足不是单向的,大多数都是双向或者多向的,有服务长者的就业机会的提供,也有服务长者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的增长,技术发展使失能老人也有正向贡献社会的可能和机会。(4)群体的需求和服务偏好是动态变化的,需要文化、技术和制度达致适应性平衡,让不同时代的主体获得所认可的生活质量。(5)智慧并不一定是新技术,智慧也包括为人们所喜好的传统服务。

陈老师特地强调智慧养老中的知和心字的重要性,认为在老年陪护工作中,在智慧养老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知心”。基于此陈老师介绍了为老服务创新大赛历届冠军:“远程陪护仪”“小雅音响”“老人的声音”,对于最后这些看似“普通”的产品被评选冠军,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老年人看的是需求,这些产品做到了“知心”。

在最后,陈虹霖老师分享了一个短片,主要关于老年人如何接触电子产品,如何“笨拙”地了解年轻人的世界。看完短片后,许多同学纷纷留言,觉得很受触动。

在会议的最后,老师和同学进行了交流。同学们踊跃提问。关于如何推广长三角发达城市的养老经验、养老机构护工面临的问题、科技能否改变病重老人提高老人的自尊感、以及针对农村养老、非药干预……陈老师一一作了回答。

## 设计思维与社会创新<sup>1</sup>

在讲座一开始,俞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创新?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今天的讲座。首先俞老师介绍了三个养老领域的故事案例。分别是一部电影《不老骑士》,

---

<sup>1</sup> 俞志元,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14日俞志元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21级研究生杨如冰。

此片主要讲述 5 个平均年龄 81 台湾老人，梦想环岛一圈，准备了六个月后终于实现了梦想。俞老师讲到“梦想”是这部电影的关键词，也是追求社会创新的前提和价值观，只有希望能够改变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接下来介绍了养老领域的一家社会创新企业“朗力养老”，深耕于家庭适老化改造。以及设计师姚彦慈因为祖母确诊阿兹海默症后设计出的 Eatwell 餐具，专门为有认知障碍的特殊群体服务。结合这三个故事，俞老师介绍到社会创新是为社会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式，力求通过新的解决方法达到更有效果，有效率，可持续的社会结果，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是实现社会目标、推动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接着俞老师提出为什么需要社会创新，首先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挑战，目前正面临着流动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贫困和社会隔离、老龄问题、环境问题……而政府存在财政压力，市场机制的失灵，公益慈善部门也有其局限性。那么我们更需要社会创新、社会创业来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俞老师介绍到在社会创新领域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如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只贷款给穷人且不需要抵押；Colalife——利用“可口可乐”销售渠道将药品送到穷人手；以及印度以社会企业运营的方式，为印度低收入人群提供廉价住房，创新经济与社会价值。

根据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谢家驹(香港社创之父)归纳出社会创新的六大元素：(1) 彰显或建立某些社会价值；(2) 新思维、新方法；(3) 吸纳和调动受益人；(4) 改变社会关系；(5) 以积极有效的方法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6) 强调实践行动或新的行动。随后俞老师介绍了中国的一些社会创新项目，如支教中国、爱德面包坊、海上青焙坊。

根据相关事件，俞老师总结了社会创新的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认为一要致力于根治社会问题，而非施舍与怜悯；二要有对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的不断追求；三要进行充能与联结，对受益人进行赋能和联结。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创新，俞老师指出要运用设计思维，一切从用户需求出发，关注用户需求；此外还要多多引入互联网技术，以“互联网+”为助力，以及创造“资源”。

俞老师重点介绍了什么是设计思维，主要分为五步，分别是 (1) 同理心 empathy (2) define 分析 (3) ideate 创意 (4) prototype 制作原型 (5) test 测试，以及进行再一次迭代。强调了设计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创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讲求迭代、共创、以人为中心，站在用户的角度来发现和解决问题

随后俞老师结合相关短片分享 ideo 公司的创新设计和理念，及其在设计椅子这一过程中“同理心”的展现。俞老师具体介绍了设计思维五个步骤是如何展开的。首先收集信息，强调在调研过程中，人类学的方法显得很重要，通过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能够收集很多信息。第二步，对信息编码归类，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定义问题。第三，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来创意。第四，大胆创意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挑选合适的建立模型。最后进行测试，以及不断完善。在中间一位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学生（何霆同学）进行了反馈，强调了社会创新中 empathy 的重要性。同济创新创业的周昭宇同学分享了在她创新设计过程中，运用了人类学相关学科知识的经验。

俞老师分享了 1999 年，美国 ABC 电视台关于 IDEO 在 5 天内重新设计购物手推车的全过程的纪录片，并向同学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设计团队是如何完成 empathy, define, ideate, prototype, test 这五个步骤的？2.你觉得设计思维的成功要素有哪些？3.你觉得 IDEO 团队设计的 shopping cart 怎么样？同学们都踊跃回答，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俞老师总结道：创新始于观察，要仔细观察，综合分析，可以跟踪调查几个有趣的用户，深入调查与交流，揣测用户潜在需求和愿望；要有完美的集体讨论，讨论要具有外向性、

开放性、关注客户的具体需要，不要一开始就批评或争论某些创意，并且一个好的集体讨论是形象生动的，其中会有草稿、图示、表格、数据等，要注意避免：老板率先发言，轮流发言，只让专家发言；此外要建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计划要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期限，需要某种值得为之奋斗和自豪的东西，要具有激情，激情会激发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团队。在团队中没有卑微等级之分，团队组成是多样化-亲密无间、互相信任，团队成员背景广、没有等级。此外，俞老师介绍了另一个案例“一公斤盒子”，该项目提倡驴友旅行时可以多背一公斤盒子带到乡村小学去。

## 老年人的移动与移动科技<sup>1</sup>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王桂新教授开展了以“老年人的移动与移动科技”为主题的课程。

王桂新教授以具体案例为基础，首先展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现状，即社会发展导致的低增长、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以及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加速的人口转变和寿命延长。基于中国的老龄化背景，进一步提出中国老龄化的具体特点和挑战。王桂新教授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具有开始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呈加速趋势；高龄老人规模大，超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少子化趋势加快的三大特点。他指出中国老龄化社会具有少子化和人口减少；长寿化的两大挑战。同时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极为重要的，这意味着延长其寿命，更要使老年人在增长寿命的同时能够健康、有尊严的活着直至生命结束。王桂新教授进一步对老年人口寿命与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口移动原因、现存问题及对策、老年人口移动科技具体案例等方面对老年人的移动与移动科技进行了全面介绍。王桂新教授认为老年人移动和移动工具的开发利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非常重要，他将老年人移动的原因区分为主动型移动和被动型移动两类，前者包括外出旅游、欣赏山河等，而后者这主要指通过社会或其他人来帮助老年人完成移动达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的，如移转介助、如厕支援、移动支援、入浴支援、业务支援等。王桂新教授还接受当前世界主要的移动工具，如自立移动的运输式移动方式（工具）、借助电动轮椅、电动推车、机器人、拐杖等短程工具、完全依赖他人或机器人的工具。但是当前我国在老年移动工具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如缺乏老年人移动工具、交通事故频发，还需针对当前问题不断改进。后王桂新教授指出老年人口可通过“移动”参与社会生活，提高其社会参与度，增强老年人口“后半程”的主观性幸福感，因此在老龄化仍在继续的社会环境下，需要对老年人的移动与照护问题给予更多关注。最后王桂新教授对健康老龄化和适老科技发展提出了美好的愿景，他认为老年化趋势还在继续，推动适老科技，建设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健康老龄化与健康移动老龄社会势在必行。课程结束后王桂新教授还就能够在在中国快速落地和借鉴的日本或美国的适老科技模式与潘天舒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桂新教授还回答了同学关于中国老龄政策和生育政策推动；中国适老商业机构可行性；养老院环境与地段；中国特色的老年人出行产品；中国生育率东西部差异；中国人口问题的战略排位；活力老年人和自理老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等问题。

---

<sup>1</sup> 王桂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本纪要根据 2021 年 8 月 15 日王桂新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 2020 级博士生张睿俞。

# 一线老年工作者圆桌会议<sup>1</sup>

2020年8月15日下午，以“一线照护实践者的分享，社区——机构——康复辅具”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在江苏产研院适老社会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芮国兴老师的主持下展开。与会专家还有复旦大学人类学潘天舒教授，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负责人戴玉玲老师，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师社工室张静老师，南京市瑞海博老年康复中心院长朱卉老师和江苏集萃适老科技研究所的陈辰老师。

首先戴玉玲老师以“社区嵌入式医养结合服务实践体会”为题进行分享，在南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大于供给的背景下，普斯康健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以老人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供给老年人综合性和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家庭照护、上门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戴玉玲老师介绍普斯康健在实践中积极打造专业的服务队伍，为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提质增能。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医保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完善，是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关键。同时互联网+诊疗+健康养老的模式，实现了智慧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创新和持续发展。并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治理。最后护理师张静老师通过工作中几个上门照护的实例，强调在老年人照护中需要以上门照护为抓手，深入推进社区居家医养结合。

朱卉老师就认知症照护在养老机构中的落地和实践为题，从瑞海博机构简介；“认知症照护”在机构内的定义；影响照护质量的各类因素，机构内的具体实践情况四大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讲解。瑞海博老年康复中心创立于2006年，是江苏省首家专收阿兹海默病老人及失能老人的一级社会福利机构。朱卉老师认为对认知症的照护必须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要对老人了解、尊重和认可。日常照护包含生活照护和周边行为症状管理两大方面，影响照护质量的因素有被照护者的疾病状况、生活背景和家庭情况；照护者对照护理念的理解、对照护对象的了解和沟通以及老年人周围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朱卉老师最后介绍了失智症老人在机构内照护的具体实践内容。

陈辰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适老化辅具专业化发展服务老龄化社会的积极意义。陈辰老师指出养老辅具能够弥补使用者因衰老或疾病导致的机体功能不足，必须以客户需求为优先。养老辅具产品设计的内核是匹配年长着身体衰老的需求，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开发，同时符合现实生活环境。

最后几位老师就机构养老具体实践，适老化辅具专业化发展推广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 孝道与孝行：内在连接的基本模式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胡安宁教授开展了以“孝道与孝行：内在连接的基本模式”为主题的课程。潘天舒教授在开场致辞中表示胡安宁教授的研究将理论研究和严谨的实证研究相结合，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与日常照护息息相关的孝道与孝行的问题。

胡安宁教授首先对课程背景进行了介绍：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一

---

<sup>1</sup>胡安宁，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15日王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的圆桌会议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20级博士生张睿俞。

个重要变化是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带来了巨大的家庭养老压力，也对子女的孝道与孝行提出新的要求，而孝道与孝行之间存在着复杂联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被赋予了现代化命题，具有多元现代性和文化的自主性。在中国这种转型期的孝道研究中，需要探讨传统孝道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式微”及其原因，当代社会特定群体对孝道伦理的理解以及孝道挂念内涵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变化。胡安宁教授讲解了社会转型和老龄化变迁如何带来人们对于孝道的多角度理解，并提出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两个维度，前者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以及子女对父母意愿的遵从，而后者以亲子之间自然产生的情感和亲和状态为基础，子女因为这种情感基础的存在而自发地表现出对父母的关心和支持。之后，胡安宁教授介绍了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他提出权威关系和子女角色义务的权威性孝道更能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强调亲情、代际对等地位的相互性孝道则显著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与之对比，孝道的这两个基本维度都无法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另外，胡安宁教授以实证研究为例还介绍了我国祖先崇拜与养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家庭层面上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信仰与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有关，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仍然与祖先崇拜的规范有关。

在讲课过程中同学们纷纷在线上提出对中国的孝道文化和祖先崇拜的理解与讨论，胡安宁教授在课程结束后回答了同学们关于孝道文化与子女对丧葬文化的安排；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对孝道孝行差异性；子女支持的反哺行为和父母支持的逆反哺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 **The Mixed Blessing of Living Together or Close By<sup>1</sup>**

8月16日晚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沈可教授带来题为“The Mixed Blessing of Living Together or Close By”的讲座。讲座由潘天舒教授主持，潘天舒教授首先向各位学员介绍了沈可教授，沈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老龄化、家庭转型和人口政策。入选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社科新人，上海市曙光计划等。近年在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Demography*, *BMC Geriatrics*, *Demographic Research*,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人口研究》，《金融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三十余篇，出版专著2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等多项课题。主讲课程荣获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复旦大学优秀全英语课程与精品课程等荣誉。

沈可教授讲座主要围绕其研究展开。首先沈可教授向大家展示了我国家庭的一些变化，包括家庭户规模在历次普查数据中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家庭结构在不断变化；各个省份在1982年和2002年一人户家庭的比例变化。此外，沈可教授还向学员进一步分解、细致讲述了更为具体的变化，比如分年龄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展示和讲解，沈可教授让学员了解了我国家庭的基本状况。接下来，沈可教授讲述了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以及其对生活安一度的影响，沈可教授研究发现，居住距离显著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同住也会对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对女性、丧偶或者

---

<sup>1</sup> 沈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16日沈可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20级博士生王焱。

农村的老人而言。沈可教授指出如何安排家庭居住模式，不但影响老年人，也影响着子女，尤其是子女的劳动参与。沈可教授介绍了她所使用的数据：2002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和2002年中国家庭动态社会调查（PSFD），并将成年子女与父母的数据进行了匹配。通过对劳动参与、居住方式、家庭负担等变量的测量并进行了统计分析。接着，沈可教授介绍了其研究的结果。首先沈可教授向学员分享了她的研究发现，多代同堂模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很大影响，其中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就业率显著高于与父母分开的女性；与母亲同住对女性就业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与父母同住。沈可教授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机制；相对父亲而言，母亲往往更多地为女儿分担家务；而与父母在同一个村或同一小区也能显著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沈可教授还对比了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她提到与父母同住、与母亲同住或者与父母同住一个小区对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沈可教授还讲述了多代同堂模式对女性家务负担的影响。

最后沈可教授认为多代同堂家庭模式的淡化已成为女性劳动参与抑制因素。这从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补充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更快的现象。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不仅会影响她们自身福利和发展，而且还会通过代际传递效应对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沈可教授就此提出四点可以环节女性在家庭责任和劳动参与之间的冲突，降低女性就业的机会成本的政策建议：首先，适当鼓励子女和父母居住在同一住宅楼或者同一小区内；其次，政府应共普惠制的学前教育机构；再次，鼓励用人单位为女性职工提供更多家庭友好政策；最后，以北欧广泛实施男性产假为例，鼓励男性职工更多地分担家庭责任。

## 中国农村养老和老年心理干预<sup>1</sup>

此研究的学理意义：首先景军老师介绍了此研究的学理意义。此次汇报说的是农村老年养老与老年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简称就叫守门人计划。它的学理之一是行动研究，超越价值中立的立场，将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主张作为行动研究的纲领，这种主张就是促进社会的亲和力。第一个关键词是行动研究，第二个关键词是超越价值中立，第三个关键词是社会变革，第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亲和力。学理之二是理论转化，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将一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作为行动研究的指南，而这种理论就是社会学的互惠原则、人类学的互惠原则和社会学的共性理论。第一个关键词是互惠原则；第二个关键词是共情理论：**social empathy**。

研究的整体运作过程（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随后孙薇薇老师向各位学员详细介绍了研究的具体运作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去关怀或改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恐怕不得不转向更加宏大的社会背景。因此我们把它置于了更加广阔的社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以及农村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之下来进行讨论。社会转型的特点：第一个就是社会转型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个就是社会转型是一个动态漫长的连续统的过程；第三个就是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冲突

---

<sup>1</sup>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18日景军和孙薇薇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20级研究生刘秋芳。

与问题可能难以避免。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困境。首先是家庭养老困境。第一个就是家庭结构的核心化；第二个就是家庭经济利益的代际转移；第三个是代际分离；第四种就是家庭的这种养老文化减弱。社区层面的养老困境表现第一个就是乡土疏化，还有一点就是基层政府的服务缺位。

如何开展心理干预？我们并不采用精神科所采用的药物的原理，也不采用心理学所采用的心理咨询的专业方法，我们很少去引入专业人士，真正就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去对老年人个体开展干预，而是用一种社会学的方式来开展社区层面的干预。我们参考了国外的一系列的研究，也引入了国外的一些研究经验，其中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守门人培训。守门人培训它的基本的理论，范式是社会整合理论，这是最早由涂尔干提出来的。在守门人培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它的特点就是动员和培训，不单纯的去依靠专业人士，它更多的是激励公众参与，适用于农村等任何社区环境，适用于多种心理干预活动，它可以链接政府专家和公众，挖掘潜在的社区资源，他们成为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支持体系，这是守门人培训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我们设计了三条核心路径。第一个就是强调基层政府的引领和参与，提升基层干部对老人的支持；第二是培育友邻同伴互助，促进相邻对老人的支持；三是关注代际养老部分，修复家庭养老模式。守门人在我们的本土化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乡镇干部、村干部、村医和热心群众为基础的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人团队，那么他们成为了我们在整个的项目当中直接对接老年人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研究者，仅仅是开展培训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经过培训的守门人，他们直接去将我们的各类干预模式、干预路径落地，然后执行。

守门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参加健康相关的专题讲座，要建立与心理专家或者其他相关专家的联系途径，建立包括老人在内的广大群众的联系制度。具体工作中的目标是对于那些高危老人，我们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并且开展医疗转诊，使得他们可以获得绿色通道，及时获得治疗；对于普通老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过得更开心一些；而对于那些临界的养老人，我们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拉他们一把，避免他们跌落到精神健康的精神疾病的陷阱当中。

从 2011 年开始一直到 2018 年，总共开展了 6 期相关的研究，从试点到示范县的建设以及多省铺开等，在全国 10 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开展相应的干预的项目，直接受益的老人近 3000 人，间接受益的农村人口近 2 万人。

## 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行动者网络分析<sup>1</sup>

赵德余老师在课程中提出了如何运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来构建一个社会养老服务模式，行动者网络分析的价值和局限，如何改进这种网络分析等问题。赵老师提出，与社会网络分析不同，我们在这里用的是政策网络方法，在我们讲政策网络分析的时候，它显然是包含了社会学上所说的一些工具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网络它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交互性的、博弈性的。

### 行动者网络的模型

赵老师通过举例子给大家演示了要介绍的内容。第一个例子是 hr 养老院。行动者

---

<sup>1</sup> 赵德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系主任。本纪要根据 2021 年 8 月 19 日赵德余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 2020 级研究生刘秋芳。

网络分析方法它的核心要素是点（knot）和线（link），分别表示行动者和关系，所有的网络结构图都是由点和线构成。赵老师指出，任何一个网络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或者说政策网络模型也好，它基本上就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描述性的，一个是分析性的。在网络当中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单向的，一种是双向的。我们在看网络结构的时候，重点关注叫互惠性的关系，两个行动者互有关系，我们称为互惠性的关系，互惠性的关系在这个叫网络分析当中至关重要。两个行动者之间交易的关系的频率越高，信任感越强，越是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关系往往对网络的整个结构和形态会形成什么结构和形态，或者是说对网络的它的政策功能和目标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

我们提出的模型，首先满足一种描述性的功能，这种描述性它是有范围边界的，取决于、依赖于我们研究目的。

如何提高模型的分析性功能。分析性功能那就意味着我要建立假说了，首先要有一个研究性的目的，比如研究医养结合或者是长期护理问题的时候，你的中心是什么？如果做这样的研究，那么在设计网络的时候，就要说明医养结合的竞争的优势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老年人家属和老年人的客户的特性，还是来自于医疗机构提供的支持，还是你得到了更好的政府资源和社会组织的支持。研究分析性的功能的时候，分析性功能的落脚点是在养老机构它提供的医养结合服务的吸引力上面，所以这个是中心点。一个网络的效应，不光是由点和线决定，还有网络结构形态决定。构造单中心的网络是为了塑造我们研究的假说，聚焦我们研究的命题，这个命题的重心是落在核心的行动者身上。

#### 拥有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行动者

个人作为一个行动者就是最小单位，只要不是个人之外的其他的任何一个组织，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或者是政府国家，它都有内部网络关系。对我们社会服务组织来说，也有内部网络关系，内部网络关系包括 HR 的集团总部核心管理层，他的中层管理者，一个具体的养老院的叫中层管理者，还有护理人员等。一旦触及到内部网络关系，特别是研究一个组织的内部网络关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微观了。要研究这样的微观模型，势必要到一个养老机构当中去蹲点，去连续的观察，甚至是在里面作为一个员工去实习。从内部行动者网络分析来说，我们最关心的是信息交易的特征。

#### 我们应该怎么分析？

比如说可以通过养老院治理网络的描述性的分析，来比较公立的养老院和私立养老院，他们在治理主体上的一些特点的差异，他们的治理工具上的差异，治理结构上的结构完整性，互动关系，系统的网络的开放性，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它的内部网络，它是扁平的还是垂直的，它是互惠的，它是单向的，它是单中心的还是多中心的，这些结构的形态，它体现出来就是治理结构。单个的看这样的网络模型是没有意义的，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要把它归纳成一些关系。

## 老年人的记忆与记忆偏差<sup>1</sup>

周楚老师分享的内容主要来自其专著，是对其过去若干年的在记忆领域当中的一些尝试和探索的一些梳理和总结，以及对认知心理学家的同行们在记忆领域内的一些探索

---

<sup>1</sup> 周楚，基础心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本纪要根据 2021 年 8 月 20 日周楚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 2020 级研究生刘秋芳。

的归纳和总结。周楚老师指出本次交流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讲，到底什么是记忆，人类记忆又有怎么样的一些特点，但是它最本质的特点可能我在标题当中已经体现了，其实它是有偏差的；第二由于我们要探讨的是老年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群，所以就涉及到整个人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在一生当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第三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记忆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关于错误记忆当中一些偏差和扭曲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背后的这种认知的机制有可能是什么？以及当下我们记忆心理学工作者们，我们在开展自己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怎样的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记忆的特点和本质，我们怎么样去切入来做一些更新的研究。最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老年人的记忆，这种研究它有什么理论价值，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应用意义？

### 记忆及其特点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到底什么是记忆？科学心理学是以 1879 年冯特在德国建立的莱比锡大学的实验室，作为科学心理学诞生的一个标志。那个时候的记忆限于感觉、知觉、注意这样的一些很初级的认知加工过程。首先进行的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当我们的注意聚焦在刺激上之后，我们会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感、知觉的加工，比如说认识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跟周围物体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经过知觉加工之后，这个信息就在头脑当中储存。之后进入感觉记忆系统，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储存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衰退会非常快。还有的信息虽然一闪而过，但是它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闪光灯记忆。有一些信息可以保持很短的时间，可以直接转入到我们头脑当中，永久储存，我们是把这种叫做常识记忆。

我们在加工一个事件的时候，它并不是准确无误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变化，会用一些没有的信息去替代一些已有的信息，如果有些信息细节缺失了，基于知识经验，我们会对它进行填补。现在我们对记忆的看法是，人类记忆是有建构特征的，无论是何事件，我们对它的储存都不是 100%是原样复制的。可以把记忆理解为是一个心理上的时间旅程（mental time travel）。

### 老化主题下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究竟我们整体的认知过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一个概念叫做日常认知，在认知老化的领域当中，有一块研究聚焦在人类的日常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上。日常认知指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完成一些复杂认知活动的的能力，它其实是多种能力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服药、理财、打电话、做家务等，涉及到刚才提过的所有的这些认知过程的参与。那么怎么测量老年人的日常认知能力？通常包括自评式的量表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测量。有一个发现就是完成的速度跟他的测验上的得分高度相关。另外也有研究发现，从认知老化的角度来看的话，日常认知的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但是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所有的日常认知它都是基于基本认知能力的改变的，所以他最终依赖的是基本的认知过程的一个变化。有学者做过研究发现成人的各项基本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下降，但是下降的显著程度对于不同的认知能力和不同的年龄组而言，表现是不同的。

为什么会发生认知老化？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日常认知和基本认知能力衰退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带来了认知的老化；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感知觉和运动功能也会发生变化，但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有的人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可能别人说话就要听很大声了，就有点听不清了，但是可能有的人在 90 岁的时候还是耳聪目明。

# 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构建<sup>1</sup>

2021年8月21日上午9:30至11:30，合肥工业大学安宁教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构建”。

安宁教授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老龄科技的实践前沿和规划战略进行梳理。安宁教授指出，人类正经历两个史无前例而又互相交融的潮流，一是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二是科技产品及服务的高速发展和扩散。多数发达国家正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在老龄化社会发挥作用的有效路径。1991年8月，荷兰埃因霍温召开“第一次老龄科技国际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erontology)，为老龄科技建立了研究框架。1997年，“国际老龄科技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erontology, ISG)在欧洲正式成立。老龄科技的目标在于，为老年人健康、舒适、安全地独立生活并参与社会，设计科技与环境。目前，老龄科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大的关注与支持。欧洲委员会和17个国家共同资助设立了“积极辅助生活计划”(Active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 AAL)，预算约为7亿欧元，期限直到2020年。AAL致力于资助面向老年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项目。每个项目都由中小企业、研究机构和最终用户构成。自2008年以来，AAL已经资助了220多个项目，涉及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慢性病管理、社会包容、日常活动管理、以及提供非正式护理人员等多项服务。2019年，美国政府颁布的《支持老龄人口的新兴技术》指出，技术进步应对老人的诸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包括独立生活的关键活动、认知、沟通和社会连接力、移动力、交通运输、可获得医疗保健、交叉情景等。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Society 5.0”概念，该概念立足整个经济社会，着眼的范围更加宽广，不仅要对工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产业的生产性，还要提升生活的便捷性，应对少子化、高龄化以及环境、能源、教育、医疗、偏远地区生活等涵盖各领域的社会课题。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第四点强调，要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

安宁教授指出，在老龄科技的研发和智慧养老的实践中，应关注“场景”的意义。所谓“场景”概念，一般指戏剧、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场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场景”泛指情景，包括各类社会与文化情景。安宁教授以电视剧《都挺好》中罹患认知障碍的老人苏大强为例，指出研究者应关注日常生活中对老人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与事件，将其构建为具体的场景，并不断积累场景库，为老龄科技的研发与智慧养老的实践提供依据。

安宁教授分析了多个智慧养老的应用场景，包括认知障碍老人防走失场景，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老年人进食困难场景，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场景，家庭养老床位场景。

安宁教授分析了构建认知障碍老人防走失场景的社会意义与具体实践。认知障碍老人走失的问题，已经成为老龄科技和智慧养老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养老机构，部分认知障碍老人容易发生走失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不仅老人自身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也给机构工作人员和家属带来很大的困扰。现有的智能手环、智能腕表则存在老人不愿意携带、需要充电等不足，采取配饰、服装、二维码等方式也可

---

<sup>1</sup> 安宁，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高级会员。现任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安宁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

能侵犯老人的隐私，以及存在长期使用不便等问题。因而，对于老龄科技和智慧养老的目标而言，亟需提出一种方便易用、老人接受程度高、成本低、定位准确、后台支持成本低的防走失解决方案。在居家场景中，主要关注轻度认知障碍老人出门后忘记回家或忘记家庭地址的问题，主要解决定位设备充电和设置的复杂性的问题，帮助老人克服不愿意佩戴的心理。在机构场景中，主要关注中度和重度认知障碍老人，解决老人抗拒佩戴设备、故意损坏设备的问题。安宁教授列举了美国 SafeWander® “智能袜子”的老龄科技研发个案。日裔美籍青年 Kenneth Shinozuka 的祖父罹患认知障碍，频繁夜间游荡，导致跌倒和受伤。为解决这一问题，Shinozuka 为祖父研发了一款“智能袜子”，通过袜子，在祖父的后脚跟设置压力传感器，每当祖父下床时，传感器就能检测到这一行动，并将无线传输警报信号传输至看护者的手机，从而提高认知障碍老人日常生活的安全性。“智能袜子”个案的启示在于，把握和理解认知障碍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景，是研发老龄科技和实践智慧养老的关键。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中，安宁教授列举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生何伊在武汉的亲身经历，对这一场景的特征和问题进行分析。2021年2月6日，春节前夕，何伊住在武汉养老院的89岁爷爷突然高烧，被送到就近的蔡甸医院治疗。当晚十点多，老人初步诊断为间质性肺炎，接种消炎针，并被建议送进ICU观察。2021年2月7日，由于蔡甸医院设施有限，老人被转院至武汉协和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然而，协和医院并不承认前一晚在蔡甸医院做的核酸阴性报告，并表示拒收跨区发热病人。老人已经八十九岁了，需要重新向社区申报发热，再进行隔离，再送往医院，然而，老人病情较重，显然无法再拖延时间。何伊等家属将老人转院至同属一个社区的同济医院的门诊。由于蔡甸医院并非三甲，同济医院依然要求重新做四项检测，包括三项核酸检测和肺部扫描。由于前一晚有发热症状，同济把老人和其他发热病人一同隔离在一个房间里，直到六个小时后出检测报告为止。六个小时之后，报告和化验结果排除新冠肺炎，同济急诊医生诊断老人肺部发炎情况不乐观，建议住院。通过何伊一波三折的经历，安宁教授指出，在这一个案场景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疫情防控依靠社区网格化管理有漏洞。目前不在户籍所在地网格区居住的老人并不少见，特别是居住在城市郊区养老机构的老人。当养老院发现老人有发热情况，叫救护车送老人到就近的三甲医院，可能被医院以只接收本区网格内的发热病人为由拒收，耽误老年人治疗。第二，三甲医院对于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收治要求四项检测（三项核酸检测和肺部扫描），但对别家医院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持怀疑态度，特别不认可基层医院的报告，这一现状将延长病情的诊治时间。第三，医院对发热老年人隔离观察的安排不合理。当医院确认老人有发热现象后，必须进行六小时的隔离观察，旨在排除新冠肺炎病人的可能性。但是很多原先具有肺部疾病而发热的老人，其症状与新冠肺炎基本症状很类似，很难分辨，因而不得不与其他发热病人一同被隔离六小时。对本身身体免疫力弱的发热老年人，这一要求不仅对其病情和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而且也增大了其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安宁教授指出，诸多医学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数量多，老年人免疫功能弱，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和高危易发人群，新冠肺炎危重症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老年人特别是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在生活、就医、照护、心理健康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中，各地区对发热老年人就诊需要建立统一标准，规定执行细则，包括：第一，完善预约转诊服务。推进社区和养老机构预约转诊机制建设，以信息化手段推动发热老年人从社区和养老机构，到医联体基层医疗机构，以致到医联体核心医院的转诊，避免发热老年人在医院吃“闭门羹”的情况。第二，推动医疗机构互认检测结果。在提高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的基础上，各地要结合本地疫情防控需要，制订区域内核酸检测结果互认的规定，明

确互认的条件、有效期、医疗机构范围等，最大程度减少重复检测。第三，改善隔离设施，提高发热病人，特别是发热老年人，的隔离体验。重视隔离期间老年人心理调节，纾解焦虑恐惧情绪。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养老机构老年人就医指南的通知》指出，“老年人出现急性发热，如确无流行病学史，可先在机构内隔离观察，按一般感冒发热进行治疗。如机构内有条件，可完善血常规、肝肾功能、CRP等常规检查（或抽血送附近医疗机构检验）。”并且指出，“老年人出现新冠肺炎可疑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不排除有流行病学史的，需立即执行隔离观察，并及时送医疗机构排查。”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在无流行病学史的发热老年人的诊前隔离的方案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针对老年人进食困难场景，安宁教授列举了Eatwell®创始人姚彦慈为罹患认知障碍的外婆发明特制餐具的个案。由于各种健康原因，许多老人的独立进食能力下降。与年龄相关的食欲、嗅觉和味觉的变化也造成老年人的进食困难。这不仅影响他们的营养物质摄取，对健康产生进一步负面影响，也给家属和护理人员带来很大困扰。其中，吞咽障碍是造成老年人进食困难的一大原因。姚彦慈在照护患认知症的外婆时，发现外婆进食非常困难：吃的比较少，且经常洒出食物和打翻餐具。基于外婆的遭遇，姚彦慈决定解决老年人独立进食能力下降问题。她研发了针对老年人进食困难的餐具，帮助增加老人对食物的摄入量，维护老人的尊严，同时也帮助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使老人进食过程尽可能轻松，并形成愉悦的视觉体验。

针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场景，安宁教授列举了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孙薇薇副教授在此次复旦暑期学校课程上所做的题为“中国农村养老与老年心理干预”的报告，结合老龄科技研发与智慧养老实践，对这一议题进行分析。包括景军与孙薇薇在内的诸多学者指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老人，脆弱性和易损性特征明显。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躯体健康等个体因素对老年人心理有显著影响。社会影响因素中，学者关注最多的是社会支持状况，积极的子女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有正向作用；但当前农村代际关系弱化使老年人心理健康面临威胁，代际关系松动与恶化甚至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频发，农村留守老人存在消极情绪的比例较高，老年人在家庭外也难以找到精神寄托。较高的综合性社会支持可促进老年心理健康，但农村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依然以家庭成员为主，社会疏离感较强，整体支持水平较低。在这一现实情况下，老年人存在诸多不同含义的需求：第一，老有所依的需求，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部分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生病期间得不到良好照顾，致使部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变得艰辛而凄凉。老年人在年老的时候，衣食住行等方面有所依靠，是一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第二，表达情感的需求，情感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与周围人的联系日趋减少，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主要从家庭中获得情感支持。然而，部分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由于长期与子女分离，从家庭中获得的情感支持是很有限的，缺乏应有的聚焦和关怀。农村老年人需要一个互相聆听倾诉，可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对象。第三，渴望国家关注的需求，农村老年人们对国家有着很强的眷恋，希望国家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让他们安享晚年。第四，老有所尊的需求，老年人在自己能力、社会地位下降后依然有获得他人尊重的心理需求，这种高层次心理需求对老年人而言尤其重要。第四，老有所为的需求，是老年人自我实现心理需求的体现，是老年人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当前，农村老年人生活单调、无所寄托的情况非常普遍。第五，期待体制精英的关注，在老年人心中，村干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同时，村干部也是跟自己熟悉和较为亲近的人，从村干部那里可以了解到很多惠民政策，很多手续也要通过村干部才能

得到办理。因此，老年人期待得到村干部的重视，一方面是在村内部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支持村委工作的表现。第六，寻求群体认同，农村老年人渴望接触到跟自己相似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获得认可和接纳，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孙薇薇和景军提出了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即以“守门人”模式为核心的社区“分级干预”模型，主要内容包括形成以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科专家为核心的守门人培训团队；筛选并培训以乡镇村干部、村医、热心群众为基础的守门人团队；在守门人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对农村老人心理危机的社区“分级干预”模式。通过调查将老年人分为普通人群、临界点人群和高危人群，建立不同强度的预防和干预方法。“守门人”计划的操作方案可概括为：开展守门人培训(由精神科和心理学专家团队开展心理问题筛查、心理关爱等知识技能培训)，建立守门人督导机制，建立守门人与专家的直接联系机制，培养并督导守门人实施以下计划。计划包括：第一，向所有农村老人和所有村民实践幸福提升计划，科普与宣传健康知识，培育及倡导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倡导养老敬老社会活动。第二，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养老守护计划，建立守门人与老人的联系机制、守门人定期走访机制、守门人定期开展老年活动机制。第三，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同伴支持计划，举行老年互助会、邻里互助组等团体活动。第四，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家庭幸福计划，邀请家属，特别是配偶与子女参与老年健康科普活动、家庭联谊会、家庭互助会。第五，向高危老人实践转诊计划，建立医疗转诊机制。

针对家庭养老床位场景，安宁教授对 2020 年上海市民政局在《上海市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清单（2020 年版）》中所包含的“家庭照护床位远程支持场景”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中国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模式，多数老年人倾向居家养老。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失能老人增多，家庭养老遇到了照护者精力、时间以及专业能力的挑战，甚至出现“一位失能老人拖垮一个家”的现象。高晓兵表示，家庭养老床位就是在养老服务改革中出现的符合基层实际的创新举措，有效做到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协调，符合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精神。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上海市民政局在《上海市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方案》中，提出了家庭照护（养老）床位具有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专业照护机构为支点，家庭养老床位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延伸服务；二是以社区为服务半径，确保及时响应和服务可及；三是以家庭为基础，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的愿望。许多老年人因术后康复、失能失智程度增加、经济条件受限等原因，迫切需要在家中得到专业的照护服务，并依靠远程指导等功能进行突发情况应急处理，使老年人家中的床位成为具备“类机构”照护功能的床位。家庭养老床位是中国养老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需要有多方面支撑。政策方面，有关部门需制定家庭养老床位的规范标准，把它纳入养老服务监管范围。还要很好地布局养老服务机构作为支撑点，并出台政策来支持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家庭养老。技术方面，需提供家庭养老床位的集成式智能化设备解决方案，要求设备具备卧床护理、离床感应、体征监测、紧急呼叫、数据回传、远程指导等功能；可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指导老年人家属开展日常护理和突发情况应急处理；体积小，安装简便，购买价格适中，年综合成本较低（支持租赁服务）。通过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必要的适老化改造，配置照护服务所需的护理床、康复器具、移动辅具等设施设备，安装离床感应、体征监测、紧急呼叫等基本智能设备，由服务团队定期或及时响应服务请求，上门开展专业照护服务。

# 信息化发展和构建智慧老龄社会<sup>1</sup>

2021年8月21日下午14:00至16:00,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信息化发展和构建智慧老龄社会”。

任远教授对老龄议题中所涉及的人口学概念进行辨析。“老化”(aging)的概念存在诸多含义,它不仅用来描述个体的老化过程,也用来描述人口总体的老龄化状态。人口学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老龄化是一个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总人口平均年龄增加的过程。在定义“老年”时,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年龄段划分标准,例如,发展中国家往往将60岁以上的人口划分为老年人口,老年的概念一般与人的预期寿命和社会体制相关联。任远教授区分了“老龄化”、“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等概念。在人口学领域,一般认为,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或者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便被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7%至14%之间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14%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老龄化概念被用来描述人口的变化过程,老龄社会概念则被用来描述人口的形态。当代中国社会,随着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使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使得寿命得以延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出生人口的比例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老龄化。因而,老龄化是人口变动的结果,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此外,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问题,而是整体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老龄化存在两种形态: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老龄化被称为“低端老龄化”;由死亡率下降所带来的老龄化则被成为“顶端老龄化”。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始于生育率的下降,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死亡率的下降将加快社会的老龄化速度。197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使得中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过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8%,按照这样的速度,预计至2021年,我国将步入老龄社会。因而,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老龄社会是基于人口老龄化所隐含的不可逆的人口内在规律的结果,并会随着老龄化的持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乃至超级老龄化社会。

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由生育率和死亡率内在驱动的人口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但老龄化的时间节点和转变速度存在差异。17世纪以后,欧洲进入工业化时期,至1950年代,欧洲完成人口转变。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口转变速度则较为缓慢。然而,有些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人口转变,20世纪末,中国将完成人口转变。以各国的人口转变经验来看,人口转变往往将带动人口老龄化。在人口转变较早的欧美以及日本等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在人口转变较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则较低,但可能速度也会更快。总体上,全球人口处于不断老龄化的过程中。联合国预测,1950年至2100年,全球人口将持续处于老龄化状态。1950年至2050年,中国也将持续处于老龄化状态,人口老龄化内生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2000年,中国开始老龄化,老年人口比率超过7%,2020年,老年人口比率达到14%,在20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从人口形态来看,中国已成为老龄社会。同时,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中国社会的老龄程度在不断加深。基于1953年至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也在持续上升,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老龄化水平在持续提高。导致这一人口形态的原因可能在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转变。1950年至2010年,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以

<sup>1</sup>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任远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

后持续下降，导致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产生底部老龄化。1800年至2000年，死亡率也在下降，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目前，预期寿命已高达76岁，形成顶部老龄化。当今中国社会，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也受到历史出生人口波动性的影响。由于战后的和平，1962年至1975年，曾迎来人口增长，这些增长人口则直接对应当今的老龄人口。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的人口形态和经济体制带来压力。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被部署为一项国家战略。2022年至2035年之间，国家经济体制需要对此做出足够充分的应对。作为后发老龄化社会，中国可以借鉴先发老龄化社会的经验，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作为后发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龄社会存在自身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于，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庞大。基于人口学预测，2050年，中国社会将存在4到5亿的老年人口，形成超大规模老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既能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制度形成压力，也能形成独有的社会条件，形成充沛的老年人力资源。第二个特点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世界其它老龄化国家更快。从1970年至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的年增长率预计比世界的平均年增长率更快。第三个特点在于，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不平衡。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引发了老龄化水平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别在扩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更低，农村的老龄化更高，而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大规模的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更多，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去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口的人口特征背后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2015年，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数量达到4063万，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比重高达51.3%，在空巢老人中有一部分老人处于独居状态，部分由于配偶死亡，部分由于配偶随同子女迁移至其它城市，帮助子女抚养第三代，从而形成家庭成员的分离。因而，超大规模的、快速的老龄化过程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积极应对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养老服务体系，鼓励老年人口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活性”老龄化，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其中，技术进步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效的工具。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技术进步和老龄化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技术进步带来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从而引发人口老龄化。因而，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构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步）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的工具。在第三波技术革命和正在到来的第四波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化发展的深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解决办法。互联网和信息化提高老龄化社会的运行质量，提高老年人口生活需求和生命福祉，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技术进步将满足老年人口的具体需求。信息技术支持的智慧养老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口需求，为老年人口和不同人口群体提供便利、高效、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化和技术进步构造出在线的社会网络。互联网增强老年人口社会交往和积累社会资本。信息化也将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避免使他们和社会体系脱离，增强老年人口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增强老年人口的发展能力。通过满足老年人口购物、健康、交流、娱乐等各种需求，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更幸福。

技术进步提升老年人口管理和服务供给。信息化使得老年人口行为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产生出大数据的信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实现对老年人口的精准化服务，甚至是实现需求和服务供给的自动配置。带来膨胀和扩展的需求和服务。目前已经有丰富的智慧养老企业、智慧养老社区和服务基地建设等智慧养老实践。智慧养老主要通过技术服务的整合、服务系统的架构和管理服务体制建设，能使老龄事业管理和服务有很大提升，

信息化的重要优势是促进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整合、优化。

信息化所支持的老龄化构成了一种智慧老龄化，能有助于建设一个智慧老龄社会。信息化在老龄化过程中的应用服务是建设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老龄社会也勾勒出了未来老龄社会的社会形态，可能也是解决老龄化挑战的发展出路。基于信息化和大数据的发展，可以推动和整合其他技术革命，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使智慧养老的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任远教授也指出，虽然智慧老龄社会的建设存在较为广阔的理念与实践空间，但社会的现实状况与这样的模式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当前老年人口生活状况与各种适老技术可以提供的解决方案相比，也还存在相当距离，即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是老年人口仍然没有充分享受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智慧老龄社会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适老科技对老年生活的介入还存在显著的缺口，老龄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任远教授认为，现阶段老龄化发展主要存在三种“数字鸿沟”。第一，数字鸿沟首先表现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获得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第二，数字鸿沟也表现为对于信息化服务的应用能力和使用技能的不平等。前者是能不能获得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后者是会不会使用信息化技术的不平等。第三，数字化鸿沟也是“数字对人的鸿沟”，是信息技术应用所针对的人口群体有不同的目标对象和不同的效果。此外，也存在基于年龄差别的数字鸿沟。老年人口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是显然存在的。例如老年人口拥有电脑、使用电脑、接入网络服务、拥有智能手机等和更低年龄人口相比存在不平等。在信息化知识和技能上也存在不平等，包括经常使用的信息化应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触网”程度，以及对信息化的态度。老年人口代际性的数字鸿沟相当大程度是由于经济不平等所决定，同时也是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差别的结果。在老龄化过程中，数字鸿沟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农村的老龄化比重更高，而农村地区的收入保障及信息化服务水平更低，信息化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的城乡不平等。在不同经济收入群体间、城市的不同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口群体之间，也存在信息化服务的广泛的数字不平等。这种基于制度结构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代际不平等和老年人口内部的不平等。

针对数字鸿沟的问题，任远教授提出老龄化社会应实践数字包容。信息化社会要求构建智慧老龄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使老年人口更好地分享信息化过程所带来的红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视减少数字不平等，减少信息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出现的数字排斥。需要采取一种数字包容的策略，支持老年人口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及支持老年人口深度地进入信息化社会。任远教授提出四种数字包容的具体策略。第一，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减少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基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减少信息服务的费用，例如将数字信息服务作为免费的公共物品。将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公共设施，这肯定是未来信息化社会的努力方向。在信息化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城乡网吧的改造是值得探讨的，家庭中有线和无线网络的数字化改造也是可行的。利用数字化接口将信息化服务最为便捷地接入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老人，形成智慧家居、智慧社区，并构成信息化社会的基础物质环境。第二，提高老年人口的信息化素养和应用能力。增强老年人口的信息化素养，避免网络犯罪、网络欺诈，增强信息安全维护的意识。老年人口更为迫切需要的还不是能够联网的电脑和智能手机，而是需要知道如何使用信息化的工具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服务。对老年人福利和幸福感发挥影响的还不是“是否能”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问题，而是“是否会”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问题。此外，社会需要实践文化反哺。需要建设一种终生教育的体系，帮助人口从中年以后就能及时跟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步伐。在知识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知识快速膨胀的情况下，社会的教育模式需要开始从青年一代向上传递，由青年来教育父母和祖父母辈。这构成了一种向上代的知识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反哺。子女对于父

母的教育是一种新的家庭责任。文化反哺的责任也应该由社会性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共同承担，例如老年大学、志愿者的投入，等等，也需要加强“老吾老及人之老”的社会友爱。第三，构建智慧老龄化过程中的两种通道。信息化带来的智慧老龄生活的便利，很大程度上使智慧老龄化具有“退不回来”的优势。但是也仍然有一些老年人口确实因为知识、学习能力的限制，客观上被排斥在日益发展的数字社会之外，特别是高龄人口。因此，一方面要鼓励“六十岁学吹打”的终身学习，数字包容也需要避免信息化社会跑得过于极端，需要发展数字社会之外的数字包容。对关系到基础生活服务的一些社会部门，应该发展适应传统生活的两种通道，实现“逐步淘汰”和“尾部演进”。第四，不仅要老年人适应技术，也要科学技术的发展适老化。科学技术需要以一种适应老年人口生活方式、生活需求和知识能力的方式来设计和加以应用，能够简便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要基于老年人口的具体需求，得到构造、应用和发展。信息化技术的更好地应用，需要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弥合社会生活的鸿沟，才能支持科学技术的适老化。

## 空间以及空间视阈下的老龄议题研究<sup>1</sup>

2021年8月21日晚19:00至21:00，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敏老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空间以及空间视阈下的老龄议题研究”。

“空间”（space）是张敏老师的研究议题中的核心概念。张敏老师对空间理论的早期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相邻学科的进展探讨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并从空间的视阈分析当代社会的老龄议题。

空间是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与展开的场所。现代人对于空间的“三维”认知，是非常晚近的知识产物。Spa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patium*，意指“距离”（distance）或“延伸”（stretch），是一个二维的概念。中世纪晚期，将空间指称为“容器”（container）的用法开始出现，并开始产生近似于“场所”（place）的理解。笛卡尔进一步将 *spatium* 的意涵衍生为长、宽、高三个维度，由此奠定了此后有关空间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解。空间的现代性理解在人类学的脉络中是一个重要议题。人类学是有关于他者的学科，它关注的是区别于“自我”的群体，对自身之外的文化形态或族群，即所谓“他者”的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存在于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之中，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开始，就有对异文化的记载，这些记载充满了好奇和想象。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让人类从技术上突破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开始去探索外部的、遥远的地理位置，旅行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工业革命使关于空间的理念和实践陡然增多，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宗教改革纷至沓来，大量的航海日志、旅行散记乃至殖民文件，都促使人类学的发轫与成型。在发现多样性的文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扶手椅中的人类学”试图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分类与排序，并试图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超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向着一种特定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贯穿于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人的论述和研究之中。例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明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志，构建人类社会、氏族、婚姻以及财产的发展进程。弗雷泽在《金枝》中将人类思维的基本发展过程总结为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线性历程。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进化论关注人类的总体发展，而非某一个具体社会或具体文化的内部运作；强调人类心

---

<sup>1</sup> 张敏，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任远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

理能力的一致性及其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试图通过“文化残余”、“文化类比”等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分类、分析与排序。德奥的文化传播论则是另一种研究方法，强调各种文化是从中心向周围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引起了文化的变迁。通过回溯这两个早期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并从空间的视阈来理解进化论和传播论，我们会发现，进化论和传播论本质上都是在回应近代以来突然发现的、不可回避的、多种多样的欧洲以外的文化存在。表面的分歧背后，进化论和传播论都在回应全球性的历史过程。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时间的自然化”，把历史时间视为和物理学的单性时间相一致，《想象的共同体》中也有对线性时间的论述。早期人类学共同假定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各类文化的分类与排序，区分了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对照。社会进化论将空间上所遭遇到的文化多样性纳入到特定的时间序列之中，把不同文化视为同一时间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传播论则是对文化的多样性在空间维度给出解读。因而，对空间的关照，从早期的人类学阶段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潜在的论述形式与理论视阈。

20 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正式确立其作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地位。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关注从宏大的全球视野转向更为具体的、历时性的单位。空间从全球视野中人类文明传播的轨迹转化为经典民族志研究中盛放文化的容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库拉圈进行考察，库拉圈是一种具有跨部落性质的礼物交换形式。用于哭啦交换的核心是项圈和臂镯，它们在封闭的循环圈内沿着自己的方向相向运动。在这种交换中，没有人会长期持有一项物品，但库拉伙伴的关系却是终身的，即遵循“一旦在库拉，永远在库拉”。库拉亦是一种间隔一段时间就要酬报的回礼，具有非等时性。库拉还涉及到一些独木舟的建造，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技术、巫术以及整体的社会组织。出于一定的心理需要，社会成员投入库拉圈，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当我们从空间维度来解读库拉圈时，我们会发现，库拉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和场所，而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个体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延展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因而，在库拉圈中，空间是文化形态和社会关系在其中发生和展开的容器。另一个例子便是我们熟悉的努尔人。埃文斯-普理查德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无集权的社会，秩序如何存在。在努尔人的世界中，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捕鱼以及园艺，人们与牛亲密且共生，雨季和旱季，高山与草地，人群的集中与分散，政治上实践对立裂变制和世仇制。因而，努尔人的社会在时间上划分了生态性与社会性的时间节律，在空间上则划分了政治距离、一般距离以及个体的社会范围。努尔人的社会有自然而然的政治生活，无需培育出国家机构，拥有自身的秩序与动态。从空间维度来理解早期人类学，我们会发现，20 世纪上半年的人类学主要关注群体的社会生活和空间秩序的关系，空间往往以静态且均质的承载文化的容器的形态出现在研究视野中。在这样的知识传统下，作为田野实践的民族志聚焦于“亲身观察土著的原始材料”以及“提供完整而适当的土著文化图景”。民族志写作相应成为“场所塑造”（place-making）的过程，旨在呈现空间内围绕特定主体的人与物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传统也为日后有关“写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埋下了伏笔。

1950 年代以来，空间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含义发生根本转变，空间不仅是影响行动者日常行为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空间日益成为人类学领域独立且极具活力的关键性议题。这一时期，人类学对空间进行跨学科的理解与阐释，包括段义孚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以及列斐伏尔、福柯和布迪厄，都对人类学的空间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学说。从“生产”的概念出发，列斐伏尔将空间界定为一种动态的、不断被塑造的过程性产物。列斐伏尔主张空间绝非中性的物理存在，其本身是人们脑海中既有思维模式的产物，并提出空间生产三元理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生成、使用并感知到空间的存在，

生成的空间还会进一步促发生存于其间的行动者的认知，进而引发有关该空间产物的不同想象，此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与之并行的是专业人士所设计的主导性的、理论化的、技术性的体现意识形态即主导秩序的空间，也即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空间的第三维度体现在生活于其间的个体经由想象或象征性地使用物理空间来挑战甚至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体及话语。个体进一步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其所生活于其间的空间，故此又生成了空间生产的第三个维度，即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这三个层面并不具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存在并呈现出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空间绝非全然决定行动者的行为，空间本身也并不能够行使能动性；相反，是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在空间中或者经由空间表达其能动性。布迪厄则更关注空间的象征意涵，关注的中心转向呈现既定空间秩序与象征的动态关联，特别是不同群体对空间的分割、占有与使用。福柯对空间的论述则开启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福柯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权力的存在即暗含空间的存在。权力的存在本身也即空间生成的过程。因而，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领域形成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被视作规制(conditioned)社会交往以及行动发生的环境的关键变量，但也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分析单位，被赋予日益重要的分析价值。受上述理论的影响，康德意义上的抽象空间概念日益演变为复杂、动态以及关系性的构型(configuration)。空间不仅只是消极的容器或者人类活动的背景板，而是人类具身性的社会活动互相缠绕并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新空间的过程。

1990年代，人类学对于空间的关注从文化的空间维度日渐转向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别是空间被生成、构建与想象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生产者所持有的立场、价值以及意义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关于空间，存在三种阐释路径。第一种是政治经济空间(political-economic space)。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属性，即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到物理空间的分层与分布，特别是空间、身份与差异三者之间的交叉与交汇。第二种是诗性空间(poetics of space)。从个体的视角进入，分析生活于城市中的个体如何理解自身所生活的空间的文化意义，以及如何策略性地将物理空间化为己有，澍化为个体空间。第三种是身体空间(embodied space)。身体是人类空间体验的基本单位与社会文化要素发生作用的基本空间场所。

如今，空间可以作为方法论工具来回应诸多重要的研究议题。教育人类学也正在经历空间转向。传统研究关注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志研究开始转向有关“教育机构的地理学”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空间过程的考察。在城市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空间如何因宏观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现有的样貌，以及城市的空间范围内不同层级的空间的使用。

空间视阈正在成为探讨老龄议题的重要维度。老去、老化或变老(aging)，是人类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不同群体如何老去，老去对他们的经历和意义生成的影响，如何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的福祉，都是亟待探讨的议题。以空间作为理论工具，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重新理解老龄议题。从宏观角度出发，“在地老龄化”和“移动中的老龄化”是一对关键的议题。在地的老龄化涉及到国家间的、国家内部的、城市内部的老龄化。对在地老龄化的研究中，人们基本上关注两类老人，一类是留在城市当中、自然老去的老人，另一类则是农村的留守老人。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两类老人一般处于“不动”的状态。当然，老龄化老去的过程也可以在流动中发生，这种“移动”的老去状态一般涉及两类老人，一种是季节性的移动，即所谓的“候鸟老人”，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发达区域较为常见，他们往往在每年的冬季去南部的佛罗里达度假，在那里便出现了很多老年人社区。近年来，这一现象在中国也较为普遍，许多东北地区的老年人会前往海南度假。另一类则是老人在退休之后移民至其它国家。现在有新进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一些老年人退休之后，会前往印尼等国家安度晚年。此外，处于“逗

留”状态中的老人，即“老漂族”，也需要被关注。老漂族往往是“五零后”、“五五后”以及“六五后”，常见于教育程度较高的职业白领家庭。他们为了关照自己的成年子女，或帮助照看孙辈，随子女一起迁移至城市居住。从老漂族身上，可以看到老年人身份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基于传统观念，老年人兼顾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动态身份；另一方面，老人助养孙辈的深度和广度正在加剧。从中观层面来看，在地老龄化涉及老年人在城市中的分布问题，移动中的老龄化则涉及到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融入与适应的问题。从观层面来看，老年人的空间使用构成了适老科技的应用场景，包括小区周围的环境、住宅内外的设施以及住宅内部的条件，都是构成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科技最后需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情境当中。

最后，张敏老师倡导创造有关老人的“有温度的空间”。从政治经济空间的维度，关注老年人所身处的空间的不平等，以政策积极介入与改善；从诗性空间的角度，强调空间使用过程中的意义与能动性；从身体空间的视角，倡导适老科技建立新的指向，制造有温度的空间。

## 护工陈阿姨<sup>1</sup>

8月22日上午，作为照护亲历者的朱健老师，以与护工陈阿姨的互动经历作为主线，向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们讲述和反思了照护背后的道德重量以及当前护工市场存在的问题。朱老师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参与到照护的一线工作中，他以外部者的视角探索着医院、护工、患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照护的经历者，朱健老师的演讲内容真诚而实在地将照护的全景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

2020年11月21日，朱健老师的母亲意外滑倒。对于八十八岁高龄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朱健母亲来说，大腿骨折是一场极其痛苦且急需长期照护的疾痛过程，在照护初期，朱老师及时联系到了一对一的护工服务，却惊讶地发现，患者及其家属在当前人手紧缺的护工市场中十分被动，患者及其家属无法也没有时间自行选择护工。患者家属无法也没有机会在短促的时间内，辨别出来谁才能承担起“专业”的照护责任，保证患者能够获得最优质的照护服务。这也就导致了家属在以照护为商品的护工市场中，几乎是盲选的被动状态。护工陈阿姨便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成为朱老师母亲住院期间的主要照护者的。在住院期间，陈阿姨完美地体现了护工的专业性，她能够保证既配合专业医务人员随时根据患者身体状况调整照护方案，又能够时刻以患者心理需求为中心提供陪伴性照护。

在当前不规范的护工市场内部，位置被动的不仅仅是有照护需求的家属，护工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照护市场中的性别问题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女性护工穿梭于家庭照护和临床陪护，身上肩负着多重压力；其二，护工群体内部自我照护问题也是护工群体内部常见的困境，在耗费心力和体力的照护工作中，护工群体自身的健康问题由谁来保障和负责？第三，“专业护理”与实际的生活护理之间的界限何在？身处于医疗照护体系底层的护工群体，他们与专业的医疗照护中存在着职业的隔阂和壁垒，却承担了更多实际的照护压力，琐碎和重复的身体照护，是他们职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照护的边界在哪里？在长期照护的情景之下，护理是一场夹杂着道德互惠的交换。

---

<sup>1</sup> 朱健，前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微信公众号《朱健 zhujian》的创办者和写作者，《护工陈阿姨》系列推文有千万阅读量。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2日朱健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研究生赵雅卓。

护工陈阿姨对奶奶尽心的照顾，使得陈阿姨拜托雇佣关系，以一种全新的身份重新进入患者的生命中，对于朱老师来说，护工陈阿姨不仅仅是护理服务的提供者，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生命故事的个体和个人。陈阿姨是广大护工群体的缩影，他们也是为了生计穿梭在城乡之间的劳工群体，他们的专业性是在常年不断的照护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们与疾痛与衰老为伴，并用十足的耐心和毅力分担着每一个家庭的苦痛。

## “以人为中心的认知症照护实践”圆桌会议<sup>1</sup>

2021年8月22日下午，在以“以人为中心的认知症照护实践”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中，作家于是老师以照护亲历者以及作家的双重身份，依托大量的文学作品，向参与暑校的各位同学们展演了疾痛和衰老的原貌。如何以文字当作棱镜，描绘照护背后的困境，记叙认知症本身给亲历者及家属造成的伤痛是于是老师演讲的主线。“衰老”、“遗忘”、“关怀”、“陪伴”、“在场”、每一个关键词背后都是一段刺骨且琐碎的照护故事。

本次讲座，于是老师围绕“疾病的文学叙述”这个主题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讲解——如何用文字有效描绘“照护的方式”、“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手法的异同、文学与田野之间的关系、影视场景中的疾痛描述。

讲座伊始，于是老师用四本纪实文学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照护中的位置与压力。在成长阶段中，女性往往被期待成为照护的主理人，这些单打独斗的“独立照护者”，最终选择将自我与家庭责任紧紧地包裹在一起。这四本以照护和衰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用最真实的笔触向同学们展演了四位照护亲历者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身处在照护漩涡中女性的挣扎，还原疾痛体验的起点是与读者产生共情。

用文字表达疾病过程的困难之处，不在于选择哪种文学写作手法，在真实的写作中，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之间的边界往往是模糊，因为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对现实的编排。疾痛转译，最艰难之处在于，疾病与照护是一种无法转述的感受和体验，这种叠加在真实性上的想象是极其考验作者的洞察能力的。小说的创作是从田野回到扶手椅的过程，是一个积极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

在讲座最后，于是老师向参会同学分享了《查无此人》的写作历程以及自己的照护故事。这本书的起点，是于是老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作为家中的小女儿，于是老师担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父亲的意识与记忆在疾病的干扰下逐渐随风而去，作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照顾者，穿梭在繁琐沉重的照护工作中，于是老师开始寻找父亲逝去的记忆。当父亲的意识完全消散之时，于是老师不得不和姐姐一起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在最后的照护中，于是老师看到了适合认知症老年生存的养老机构及其有限。银色浪潮来临，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需要借助养老机构的服务，如何提高养老机构的软实力成为了于是老师关注的新问题。

## 参与学员感悟<sup>2</sup>

---

<sup>1</sup> 于是，签约作家，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2日于是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研究生赵雅卓。

<sup>2</sup> 有较多学员写了参与感悟，限于篇幅，在此仅为选编。

王琨，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已毕业：

参加本次暑校让我获益良多。这不仅是学术上的提升，更是一种心态和认知上的改变。在报名之处，面对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的回答大多是感性的，甚至是有些忧郁的。想到衰老、想到已经衰老的亲人，即便是想到与“老”有关的议题，都让我感到某种衰败的情绪。但在第一节黄老师的授课中，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随着课程的推进和深入，这让我开始正视“老”这个主题，也让我对“养老”、“适老”等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正如同本次暑校名称，“适老科技与社会发展：多学科视角”，我在这里真的体会到了多学科交融的魅力。潘老师也曾说过，这届暑校所请的老师、所讲的议题既前沿，又综合，我以实际感受证明，此言非虚。就我自己的学术经历来看，虽然在本科期间就学习过社会学，但毕竟不是本专业，在此次暑校期间看到了专业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不仅学习了方法论，也在视野思路得到了启发。比如胡老师所讲的“孝道与孝行”，从我的思考角度，这可能是个讨论传统与现代化的民族志式的调查书写；但胡老师却是用相对直观的数据说话，通过数据的分析比较，让原本可能比较“虚”的问题实在化了，即让问题真的变成了具体的问题，这与我所在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某种对照关系，细想之下，不知是否可以“返景入深林”。同样，在其他老师的讲述中我都感受到了学科交叉、视野多元的强大输出力与吸引力，只恨自己脑容量有限，日后还要多多重温、多多学习。

同时，更让我心有感慨的是暑校营造的轻松、舒适和极具人文关怀的优质氛围。虽然上课是严肃的，但老师们是亲切的，他们都在尽力让学生们听懂且感受到学术的意义与实践力量。除此之外，几次圆桌会议也都让我印象深刻，使我亲眼所见到了适老科技、照护实践真正被运用的场景。想象总是飘渺，现实则更加复杂、琐碎，而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者也好、志愿者也好、行业人也好，都体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热情与专业精神，这也感染了我，让我也萌发出想要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的想法。

正是被这种慢慢积累起来的温暖充实着，我对所谓的“适老科技”有了新的认知，真正懂得了“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的涵义；更重要的是，连缀于其后的“社会发展”不再是一个宏观的、难以把握的大议题，而是可以被具体切入的文化场域。就比如前两次作业，就将科技设计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促动了学员们的体验感与想象力。即便只是收获了这些经验与经历，也让这个暑假足够充实。

最后，还是回到人文精神，这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所有社会科学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它能让学术变得真正有关怀，也能让学者变得真正有暖意。这份关怀与暖意就如同抒写民族志，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诗意的，它们并不冲突，甚至总是相伴相随。就像此次暑校邀请了于是老师、朱健先生，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既能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共鸣，也能找到对应的可以挖掘的研究点。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本次暑校就是富有民族志诗学气息的，它的开展、推荐与完成就是一次鲜活且成功的民族志书写。能够参与其中，成为执笔的小小分子，就已感恩、满足。

陈安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已毕业：

本次暑期学校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如招生简章中所说的跨学科的探讨适老性科技。很感谢有这样一个聚集了来自护理，医学，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工程与工程等专业等教授和同学围绕老年话题提供了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思想碰撞的平台。

在人类学的学习中，对于人类学如何确实的落实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真正地对人们的生活有意义是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而这次课程中，每一节课程都生动的解释了人类学该如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如何在看似毫不相干的数字化工程中融入“在场”的关

怀，真正使得理论落地。例如在养老机构利用摄像头，红外线感知系统对夜晚老年人睡眠和起夜状况的监控能一定程度的让看护人员更好地关注到老年人的状态和更高效地分配看护工作。

不仅如此，本次的暑期学校也让我更深入的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年龄层的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家人，护理人员，业内从业者等相关者在面对养老问题上的思考和困境，还有目前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发展中的创新和遇到的问题。在发展方面，社区活动上对于针对早期的阿兹海默症患者通过相应游戏和社区互动，例如模拟交易的超市，疗愈花园来锻炼老人对金钱，数字的认知，增加老年人的社交互动。在困难方面也有如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缺少年轻专业从业者，高强度，低薪酬，养老机构盈利与家庭基本开支无法平衡等问题。因此，在面对如何将科技更好地融入养老生活中，一定不能缺乏的就是从老年人的角度去发现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到养老相关看护者从业者的的心声。利用科技更好地帮助到老年人和其照护者的生活。

据海昕，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21 级：

作为一名临床专业的学生，之前更多地是从疾病、生理上去理解老人。而这次的暑校也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可以了解不同领域对于老年人问题的见解，感受交叉学科之间思想的碰撞交流，让我对社会学、人类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暑校中，不仅有科技产业的工作人员、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作家等等，展示自己与老年人相关的工作与研究，而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们的提问或是分享也给了我很多启迪。行动者网络分析、孝道与孝行联系课程让我对社会学研究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而智慧养老场景构建、设计思维与社会创新的课程给人以启发我们需要从老年人真正需求出发来做出有益于适合老年人的创新产品。正如任远老师所提及的，“不仅要老年人适应技术也要科学技术的发展适老化”。我想很多老人其实是渴望了解发展，但很多时候科技的发展的确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快的道路，有时候却忽略了老年人的意愿，将他们原本习惯的路关闭了。科技的发展不应该将老年人挡在门外。其实应该保留老年人传统习惯的方式，同时要为他们在新技术道路之间搭建桥梁。让我想起之前参加数字鸿沟论坛上的一位老师所说，“对老年人最好的关爱，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也希望未来自己不管从事什么方向，也能够尽自己所能为老年人健康奉献一份力量。

林华旌，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2018 级(本科)：

通过本次课程，我对健康老龄社会、科技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实践、适老科技产品在老年服务中的应用等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不仅收获了做学问做研究的勇气，也收获了专业的思维视角。在开幕式上，刘欣院长说“这次课或许影响终身”。对于现在只是大三的我来说，谈终身或许过于空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暑校带给我的影响，会延续到我博士研究生毕业。

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我一直期望自己能够做“有温度”的研究，成为“有温度”的研究者。或许是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属性特征，我对这两个学科一直很感兴趣，修读过社会学概论等课程，内心对这两个学科一直充满向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许

自己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会与这两门学科和养老 议题渐行渐远，但持续的关注、不断的求索，应该是新时代青年应有的素养。正是出于这样的期待，我报名了暑校。出乎意料的是，学员不仅有人类学专业的，还有护理、中文、建筑等专业的学生，同时也有实务领域的从业者，授课老师也有很多是人类学领域以外的专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融入“交叉学科”的氛围。不同的专业背景、人生经历，带来的不仅是新知识，同时也是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

通过黄廷焱老师的“认知障碍诊治及照护体系的实践与探索”，我对认知症 治疗的痛点有了初步的认知，正如新冠疫情初期社区内部的防控对减少疫情扩散 发挥了关键作用，社区、街道等基层医护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应该在预防、识别认知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复旦大学俞志元老师的“设计思维与社会创新”，全程的气氛都很活跃，让我印象深刻。俞老师指出设计思维包括“重新定义问题”和“创新解决方案”，而“重新定义问题”强调的是定义需求和同理心。之前在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课时，老师也提到社会创业者着重以创新的方法更 有效地服务于长期存在的基本需求，也有发现和创造新需求的使命。不论是社会 创新还是社会创业，关注的都是“需求”，与商业创新截然不同。复旦大学王桂新老师的“老龄社会与适老移动科技”，让我关注到我此前一直忽略的老年人的出行问题，真切地感受到健康老龄化和适老科技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 8 月 15 日江苏产研院适老社会科技创新中心带来的圆桌会议上，养老服务从业服务人员 的心得分享再次验证了照顾老年人是一个需要“走心”的行业，需要了解、尊重、认可与参与。其中一位分享者提到“过于科技化的产品不一定对机构有用”让我 很受触动。我们不能因为过于追求技术而忘记了初衷，也不能让科技的高度取代 人性的温度。复旦大学胡安宁老师的“孝道与孝行：内在连接的基本模式”，从日常行为切入，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来建构理论，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意义，让我受益匪浅。说实话，在看到 Providing more but receiving less: Daughters in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这个标题时，我第一反应是很有趣，第二反应是：我们能改变这一现象吗？如果没有，那么这个研究还有什么实际价值吗？个人的粗浅看法是这个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很难通过外力进行干 预，可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我过于重视解决问题，而忽视了 发现问题的重要性。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不论是人 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当务之急是发现需要解决或是值得被关注的现象，继而 分析现象的本质，最后才是想办法寻找解决的途径。复旦大学沈可老师的 The Mixed Blessing of Living Together or Close By 和 Co-residence with elderly parents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in China, 关注

的都是多代同堂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跨专业的学生，我此前也关注过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但没有想到可以分析家庭结构对家庭成员的影响。这场讲座给我的启发是当我们在设计与人口、家庭有关的政策时，也应着重考虑政策对家庭内部关系的潜在影响。8月17日的圆桌会议“聊聊我们在抖音中畅游的爸妈”可谓是本次暑校中最生动也最接地气的一课了。作为00后，听80后和90后的哥哥姐姐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感到共鸣，但不知为什么突然体会到生活不易的心酸。景军老师、孙薇薇老师的“中国农村养老与老年心理干预”，关注农村的养老问题。这场讲座最打动我的是老师们的研究内容和产出的社会效益。两位老师的“社会实验”，不仅真正改善了很多老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关注，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的推广，体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真谛。此外，潘老师反复提及养老研究存在“urban bias”。从我所学的专业来看，“城”与“乡”的研究对立的隔阂是明显的，关于城市的研究数量也远胜于农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与农村有太大的差别，城市的公共管理问题更为凸显。但实际上，不论是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困境，还是农村的基层管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也需要得到同样的重视。复旦大学赵德余老师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是我最感亲切的一场讲座，因为“政策网络”是我们专业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与此同时，我感受到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结合的魅力所在——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来审视政策效应。复旦大学周楚老师的“老年人的记忆与记忆偏差”，让我认识到老年人记忆研究、相关产品设计的重要性。安宁老师的“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构建”，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来更好地把握老年人的需求，从而提供更精准的帮助。复旦大学任远老师的“信息化发展和构建智慧老龄社会”，再次强调了要从需求出发，不是从技术出发来构建智慧养老社会，要老年人适应科技以及科技适老化的同频共振。朱健老师“护工陈阿姨”的故事，很质朴，却非常打动人心。我在课下也阅读了朱老师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被平凡的真实所打动。“政策好不好，要看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或许，一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程度，才是其真正的格局所在。最后一场，是于是老师、薛琦老师和许永春老师分别围绕自己的职业展开的分享。笔记记的不多，更多是被情怀所打动。

这次暑校，带给我很大启发或是触动的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如黄延焱老师PPT最后一页的“老是忘记，老是爱”；圆桌会议上“我们需要的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最炫的；过于科技化的产品不一定对机构有用”；王桂新老师的“健康老龄社会应该是平等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潘天舒老师的总结“人类学家是脚踏实地的哲学家”……作为跨

专业学生，围绕适老科技展开的讨论，或者说人类学带给我的，更多是“在场”二字。“在场”来源于凯博文老师的 Presence 一文：“在场，简单地理解，就是‘在那里’……这种“会在那里陪着你”的态度、行为或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逐渐干瘪。……我们经常谈到 医学的人文精神，而‘在场’或许就是这种精神的核心之一，而这或许也是作为人的核心之一。”人类学学科和养老议题，强调的是对他者的尊重，需要我们换位思考，调动自己的情感，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现值得关怀的问题，并用行动带来善意和温暖。

# 辑二 疫情观察笔记



## 专题引言

新冠疫情是有史以来人类面对的波及面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传染病之一，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人类学擅长从细微处看见整体，将个体与包绕个体、甚至印刻在个体身体上（embody）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勾连起来，从而关照个体，以及关照个体所处的更大的世界。此期《复旦人类学之友·人类学田野方法专刊》辑录了复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疫情期间的观察和思考，从各个方面为“尚未过去”的疫情写“过去不久”或“正在发生”的历史。实际上，人类学学者一直在从事的一个工作就是记录和留住历史的瞬间，将其化作田野笔记、文字、影像等，换言之人类学在见证着历史。除此之外，人类学还试图去参与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由此人类学还应进一步询问：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和病毒、自然如何相处？如此方为“有担当的人类学”。

# 新型冠状病毒的居家隔离 37 天日志

金雁<sup>1</sup>

自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中国扩散以来，作为一名硕士在读生，我自 1 月 21 日至 2 月 26 日期间一直在居家隔离。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2 月 27 日我才首次踏出小区，现对此一个多月的隔离经历、情绪变化及所获知的主要信息进行记录与总结。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疫情防护印象：江苏省启动一级响应较晚（1 月 25 日），但管控到位。信息披露及时，对于每一个病例及小区住址皆有详细说明。2 月开始早上、下午、晚上皆有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中进行防护提醒播报，2 月 11 日小区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并限制外来人口进出。

## 居家隔离前期

首次获知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还得追溯至 12 月 31 日网上突然爆出湖北武汉发现 SARS 病例，但随后央视新闻迅速辟谣：将该呼吸疾病定义为不明原因肺炎并表示已派专家组前往武汉调研处理。联想起 SARS 原本被定义为非典型性肺炎，我对该病毒的恐惧与担忧也不禁加深了一层。因此，在当晚的跨年活动中，我便下意识地戴了口罩并去静安寺撞钟以祈求来年平安。

在专家组前往武汉之后，1 月 9 日获知该肺炎由新型的冠状病毒引起。然而，此时我对该病毒的了解仍停留在传染性不强，具有动物传人病例，但不存在人传人病例。同时，1 月 10 日开始的春运未受影响，且政府未采取任何控制行为也使我更加坚信该病毒并不值得重视。因此，我于 1 月 14 日晚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迎春晚会，一切工作、生活照常运转，而网传 SARS 病毒再次出现的消息则慢慢随风而逝，成为众多网络谣言中的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 月 15 日却在网上得知该新型冠状病毒确实能够在人际间传播，但并不持续。存在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同时，获知疾病的致死率不高，病例早期的症状表现以发热和咳嗽症状为主，死亡者一般年龄较大且有基础性疾病。可信的遗传病专家也指出该病毒的易感人群以男性为主，中老年发病较多。自此，对该病毒略有警惕，出门置办年货、逛商场时开始戴防尘口罩进行防护，但并不认为该病毒会大面积扩散，且觉得武汉离江浙沪很远，这次我国反应及时，应该不会再次造成重大的经济社会损

---

<sup>1</sup>金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学博士研究生。

失。在此时，我始终认为病毒确有一定的传染性但并不高，只有年纪较大、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才容易感染，年轻人则不用太过担心且儿童罕见。因此，在此期间，我还是照常学习、出门、聚会、逛商场并准备迎接新年。出门时，口罩也是时戴时不戴，想起来戴便戴。

随后，1月18日网传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已有确诊病例，但未被证实。1月19日微博爆出上海肺炎，1月20日从南方都市报获知武汉两日新增136例深圳1例北京2例，且感染者皆有武汉旅行史。我开始怀疑该病毒的传染性强度可能略高，但仍旧未很重视，认为没有武汉旅行史便不危险。毕竟，媒体偶尔会报道一些引人眼球，但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事件。因此，20日下午我还是去了人群聚集的家乐福商场置办年货，但开始戴医用护理口罩进行防护。与此同时，虽然接连有城市爆出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但20日下午仍有媒体播报武汉百步亭社区在举行第二十届万家宴，未有任何政府干预，仿佛该病毒的传播仅是小概率事件。我也开始对自己的防护行为是否过激表示怀疑，但随后证实了我的提前预防还是很有必要的。

1月20日晚，事件突然出现转折。钟南山院士首次证实了存在持续人传人现象，并在官方平台呼吁大家出门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一瞬间，紧张、焦虑与愤怒的情绪被点燃。在钟南山院士发声后，我开始与朋友分享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得知上海已确诊首例，我们互相开始讨论前期未防护的行为的危险性，并互相提醒不要出门，且对前期官方所宣传的不存在持续人传人存有质疑。同时，由于此时仍不了解该病毒的传染途径、传染强度及致死率，为了尽可能避免被感染并减少疫情对生活的影响，在看到此条信息呼吁后，1月21日上午我便很忐忑地去药店买了口罩、酒精棉片、衣物消毒水、板蓝根和抗病毒冲剂。虽然不知道板蓝根和抗病毒冲剂有没有用，但还是提前准备了些。此时，大街上戴口罩的人仍寥寥无几，酒精棉片和口罩也都还有存货。但此时我仍认为病毒会在短时间内控制，故只买了少量口罩。1月21日下午，我正式开始居家隔离，取消了原定的聚会和春节访友行程。

## 居家隔离进行中

我的隔离经历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 第一阶段（1月21日-1月25日）：信息爆炸期中的“孤军奋战”

在此阶段，网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与信息暴涨，官方信息、谣言与居民的曝光层出不穷。随着时间推移，我对新冠病毒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且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也逐日增加。

此时，每日情绪受网络信息的影响较大，紧张、焦虑交杂恐惧，但仍旧对疫情能够快速解决抱有希望。开始严格控制自我外出，每日也皆会提醒家人戴口罩并减少外出。然而，电视新闻中有关病毒报道仍较少，家人此时仍处在迎接新年的气氛中，认为该病毒影响不到苏州，仅仅是武汉有所影响，抱有不用紧张、不会被感染的心态。对是否戴口罩、是否需要隔离存在代际分歧。我紧张的隔离行为与家人松散的、放松的行为产生对立。具体而言：

1月21日：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开始迅速出现，受该病毒传染突发事件的影响，我在寒假休息之余开始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发展，时不时便会刷微博头条、微信朋友圈和丁香医生的疫情播报数据，以了解全国各地有哪些地区已存在确诊病例，各地区新增、疑似病例的数量。此时，每当有一个省市爆出确诊病例，我便会紧张起来。下午了解到武汉开始逐步限制进出，但汉口火车站仍然运行。同时，全国存在较少数量的确诊病患，病毒具有一定扩散趋势。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新病毒可能持续人传人，铁路部门也开始免收到达和离开武汉的火车票退票手续费。

此时，我仍认为湖北武汉将受病毒较大影响，但对于该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究竟多强仍没有概念，且认为疫情不会在江浙沪地区大量扩散。此外，下午得知病毒的致死率一般，大部分患者都能自愈。但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下药，依靠患者的自身免疫力以痊愈。因此，在没有任何医疗指导的情况下，下午4点，我盲目地冲了一包板蓝根冲剂，期望能够增强抵抗力和抗病毒能力。截止晚上6点发现中国各大省市已都有疑似和确诊病例，中国版图不断被新冠病毒点亮。其中，湖北武汉数量已破两百且重症病人数量不低，政府开始将湖北作为疫区警惕起来。

1月22日：

醒来睁眼第一件事便是查看丁香医生的疫情播报数据、朋友圈所分享的文章，微博、热点头条及人们的评论。学习计划几乎停滞，和伙伴们分享疫情传播趋势、疫情重点事件并对事件进行评论占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有关新冠病毒的内容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且官方信息与谣言夹杂，每几分钟便有新消息出现。同时，朋友们也发来各种新闻、辟谣文章，例如指出吸烟、室内煮醋、吃VC、吃达菲、吃病毒灵、吃板蓝根、抗生素、带多层口罩等传统的病毒应急方式无效；传出各一线医生已被感染。此时，虽然各省市接连爆出确诊，但江苏仍

未有感染病例，开始期待江苏能够没有感染病例，但也明白被确诊只是时间问题。晚间得知 ECMO（移动心肺仪）技术可成功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便开始搜索关于此技术的科普贴。

1 月 23 日：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惧度达到高峰，关注度达到顶点，并对武汉政府的疫情防控不到位感到愤怒。这是我首次因关注疫情信息而熬夜，该日的时间概念模糊，只是跟着事件的发展趋势走。同时，白天开始向医生朋友了解该病毒的临床症状，并询问治疗手段。刷微博、微信并与朋友们对此病毒进行讨论、分享信息成为生活主体，各娱乐活动（例如追剧、看综艺节目）停滞、学习进程停摆。时不时向家人分享网络信息，提醒家人注意防护，但家人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度并不高。

凌晨 得知江苏首例在苏州工业园区，对此感到忐忑，并预测南京即将也有案例。

7 点 得知武汉开始封城。在南方城市全部沦陷后，对武汉政府预警不到位感到愤怒。

中午 得知内蒙古爆出疑似，大西北失守。

午饭后 得知财新网爆出管轶的评论，认为此次感染规模是 SARS 的 10 倍起跳。

虽然仍对此半信半疑，但看了该报道后对分析仍较信任，且对该病毒的恐惧情绪达到极点，也预估这次疫情不会很快结束，开始担心是否能够按时开学，并对中国此次能否成功抗疫感到迷茫与无能为力。

14: 00 得知湖北省在早晨 10 点封了公共交通后，开始封闭高速。

15: 00 发现上海环球港、苏州圆融大厦、苏州景城邻里皆被传有感染者。同时，各类在场被诊断出发热而被隔离带走的视频进一步在朋友圈引起关注与紧张。

16:00 得知浙江启动一级响应。感受到江浙沪虽离武汉很远，但受人口流动的影响，疫情也很严峻。

18:30 得知新疆失守。此时，全国仅剩 2 个地方仍未有确诊。已经对各地区发现确诊病例的推送消息麻木。

21:30 得知武汉各医院防护物资紧缺，医院开始在线征集捐赠。对该事件感到无可奈何与焦虑，并为武汉医生的付出所感动。

22:00 得知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第一批重症和呼吸科医生前往武汉支援。

22:10 得知武汉将在蔡甸以“小汤山模式”建立医院；上海将在金山建立小汤山医院。

自此，对疫情会有好转的期待彻底落空，开始接受“第二次非典”的来临，对于疫情的走向与发展抱有消极态度。

1月24日：

醒来便关注病例数字与朋友圈所转发的文章。同时，丝毫没有欢度新年的气氛与心情，在经历了23日的疫情信息轰炸后，彻底坚定不再出门。原定打算买的卤菜也被取消，除夕成为了平常的一天，春节联欢晚会也几乎没有观看，而是在网络上关注疫情事件的发展与人们的评论。

10:00 得知江苏确诊9例；南京、无锡、南通、连云港各市陆续失守。

11:00 得知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感染；感受到此次病毒的高传染性。

16:00 得知上海市与湖北省同一天一级响应。对湖北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

20:00 吃完晚饭后几乎没有观看春晚，仅看了春晚特别节目——疫情诗朗诵后就开始关注微博头条信息，得知有众多病例无法被收治。

21:00 全国除西藏外已几乎全都有确诊、疑似病例。

22:00 各地医院开始支援武汉。

00:00 仅简单地道了新年快乐，没有任何的跨年活动与喜悦。

00:30 得知江苏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25日：

正式接受疫情已全面扩散，不再对病毒感到恐惧与紧张，而是开始担忧未来的发展。醒来第一件事仍是关注疫情发展，但开始强制自己减少对媒体信息的关注，仅在三餐及休息时查看疫情的发展情况。同时，试图限制全家人的出行，但家人对此次疫情的重视程度仍不高，25日还坚持出门散步并忽视戴口罩的重要性。在心理上，期待政府能够早日解决该问题，并开始担忧春节后的返程高峰会使疫情进一步扩散。

10:50 有关发热病人的同车厢乘客信息开始传播，我也紧张地核对自己先前坐的高铁是否有同乘客发热。

11:00 广西新增2例，其中有2岁的婴儿被感染。首例婴儿感染病例也进一步加强了我对该病毒的恐惧。

15:00 有亲戚来访拜年，认为苏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也未留下吃晚饭，仅待了2个

小时便快速结束了今年的走亲戚环节。

17:00 从微信公众号上得知从 24 日起苏州已进入空城时代：各商场、汽车站、旅游景点皆空无一人。

19:30 看完新闻联播后，全家开始意识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父母也表示会尽量避免出门、少去人多的地方。由此，正式进入全家抗疫模式。

20:00 得知苏州三元二村有确诊病例；上海大学推迟春季开学，预测复旦可能也会晚开学。由此，对今年的毕业生就业、毕业感到担忧。

21:00 得知北京道路省际客运全部停运（停大巴），预测上海、苏州可能也将限制交通。

### *第二阶段（1月26日-1月31日）：全家抗疫，情绪大起大落直至归于平静*

在此阶段，父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忌惮逐日提升，也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这六天内，我仍旧保持着每日醒来先看一下丁香医生所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并将昨日的新增病例与死亡病例对全家进行播报。此外，我的居家隔离模式也由主动转向被动，家人也参与到了互相劝诫不出门、尽量避免走动的行动中，主动取消了走亲访友、逛街等安排。CCTV13 午间新闻、东方卫视晚间新闻、新闻联播成为了全家每日必看的节目。日常生活仍被疫情信息所充斥，但开始尽量避免关注。

1月26日：

对疫情的关注在 24 日和 25 日略有下降后又再次达到高点，几乎时不时便会刷手机查看最新信息，与朋友们的讨论再次达到高峰，并持续至 27 日凌晨。同时，该日晚间的消极情绪很高。最终，无可奈何地选择睡去。

08:00 得知上海已出现死亡病例。由此认为该病毒的致死率可能不会特别低，确实需要特别警惕。担忧情绪在家庭中弥漫，将出门视为危险行为。人人自危，家里但凡有人咳嗽、流鼻涕都会引起过分关心，并责令其量体温。

11:30 全国共有一千多例，开始担心中国的疫情被 WHO 定性为 PHEIC 事件，从而影响 GDP 和未来就业。

12:20 得知浙江破百，确诊 104 人。

13:00 上海轨交 11 号线花桥-安亭站暂停运营，昆山段被停。发现各行政区域之间已有隔离趋势。同时，得知苏州轨道交通开始提醒广大乘客必须佩戴口罩进站，防护强制措施进一步加强，且江苏省明确 2 月 23 日之前不可提前返校，预计全国延缓开学

及复工不可避免。

- 15:00 关注 Twitter 的外网评论，了解国外对于此事的报道及反应。对种族歧视、外网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感到愤怒。
- 16:00 上海省际客运站发送与到达所有班车、省际包车停运。
- 17:00 北京大中小学幼儿园延期开学，售楼处关闭；认为上海马上也会延期开学，通知发布只是时间问题。
- 18:30 上海医疗队开始正式接手武汉金银潭医院两病区。
- 19:00 有关央视新闻频道（13 频道）将播出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直播，建议家长与孩子同时收看的谣言出现并被迅速辟谣。同时，获知苏州全市企业延迟上班，学生延迟上学。
- 22:00 各医院陆续爆出缺物资，并请求物资捐赠。对此感到无能为力与痛心并为海外同胞的努力而感动。
- 00:10 对湖北省人民政府首次发言中所陈述的自相矛盾的内容感到愤怒，情绪被网络评论带动到高点，最终选择不再关注并睡去。

1 月 27 日至 1 月 28 日：

将居家隔离贯彻到底。同时，由于认为延迟开学基本已成事实，开始强迫自己把卧室当成图书馆，并试图进入稳定的居家学习状态，强制自己减少对网络的关注，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然而，在家的学习效率一开始并不高，无法很快进入学习状态。在学习间隙，把凤凰卫视 2013 年所拍摄的纪录片《非典十年祭》又再次回顾了一遍。此外，27 日开始，全家每天中午和晚上的饭点都开始关注新闻播报。在信息的感受上，呈现出电视报道积极向上、一切向好，但网络世界混乱、绝望与消极的态势。

1 月 27 日：

- 12:45 得知苏州境内 32 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关闭并宣布 2.8 日开始复工。
- 19:00 得知口罩脱销，物资十分紧缺。武汉市内物价上涨：大白菜卖到一颗 30 的照片开始传播。武汉人民的求助信息开始散播。

1 月 28 日：

得知苏州开始对每个病例进行通报。

1月29日:

连绵的阴雨结束，苏州首次出太阳。在居家隔离一周后，想出门的情绪在29日下午达到高峰。同时，由于已连续2日没有再关注网上的新闻，对于疫情已不太了解，抱有出门不会被感染的侥幸感，但父母仍对出门十分忌惮，在其劝阻下只好选择继续待在家中。

13:00 知网开始免费开放，呼吁大家在家写论文。

14:00 各地皆出台延期复工、延期复学通知。

1月30日:

家里长辈对于延迟复工、不用上班感到满足，开始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假期，进入吃喝睡的模式。同时，通过微信视频互相问候小区状况。我对于疫情的关注继续下降，情绪多日保持平稳，开始享受寒假假期，仅关注了WHO的紧急会议。

11:00 对WHO将在30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感到紧张，担忧中国武汉的疫情会被列为PHEIC，从而影响2020年的经济发展。同时，网上也再次弥漫有关疫情国的消极分析，消极情绪也被评论带动。

1月31日:

10:00 得知WHO已将武汉病毒事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同时，各国开始限制中国人出入境。自此，感受到该次事件的严重性，认为疫情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准备进入长期的居家隔离模式，不再对疫情能够快速好转抱有希望。同时，网络上的负面消息与正面消息几乎无法再引起情绪波动，只是随意看看，希望政府能够慢慢控制疫情。此外，开始与家人为长期居家隔离做准备，打算过几天去囤点菜。

13:00 阳光很好，在阳台口放风。发现已有三三两两的老年人走动，并聚在楼下讨论此次事件。其间，老人们谈论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美国开发的针对亚洲人种的生化武器，说得有模有样。

自此，疫情不再是生活中的大新闻，开始彻底放弃在网络上对疫情进行的特别关注，下午正式选择回归正常生活。打算将过去翻篇，进入新的2月。

*第三阶段 (2月1日-2月13日): 与世隔离, 正常学习, 期待武汉拐点*

开始接受在卧室学习, 并安排每日的学习内容。进入追剧放松、正常学习的状态。然而, 此阶段的憋闷情绪逐日增长, 时不时地便会想要出门放松, 想要运动。因此, 在学习间歇, 偶尔打扫屋子并与家人一起做饭以转移注意力并活动筋骨。

对疫情的关注进一步下降, 仅在饭点看看新闻消息, 偶尔看一下微博头条的标题, 但不仔细看内容。值得一提的是, 在2月7日凌晨, 再次因为李文亮医生而被调动情绪, 作息也再次被打乱。隔离后期, 开始期待2月10日的疫情拐点能够出现, 每日会特别关注湖北的新增病例数量是否减少, 是否已出现疫情拐点。

2月1日:

10:00 得知今日凌晨爆出双黄连口服液能够抑制病毒的消息, 并引起众人疯抢。由此感到民众的疯狂, 开始在休息间歇回顾《传染病》这部电影。

16:00 得知黄冈开始出现每户每2天只能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2月2日:

早饭后:

09:00 得知新的病毒传播方式: 粪口传播。

午饭后:

12:00 为红十字会的不透明处理感到无奈。

12:19 看到有文章分析该病毒是由SARS和HIV合成, 初现阴谋论端倪。

12:25 浙江温州开始封城。

12:34 厦门摇号抽出首批口罩购买者, 口罩成为紧缺物资。

下午休息:

16:00 得知内蒙古一新增病例被楼下的确诊病例感染, 感受到该病毒的传染性极强。

进一步加强了对病毒的警惕。

2月3日至2月4日:

几乎没有获知特别的疫情信息, 看到网上有人希望社区发放口罩以解决口罩短缺问题。

同时，黑龙江省高院对故意传播新冠病毒者最高判刑死刑出台。体会到国家从法律层面开始管控病毒传播，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2月5日：

14:00 得知上海各级各类学校2月底前不开学。

16:00 想出门的情绪暴涨，迫切地想要出门逛逛，但被家人阻止。最后，只好继续居家隔离，打算根据后续企业的复工情况，再来判断是否出门。

18:00 得知北京外国语学校3月2日至4月30日为线上教学阶段，5月1日开始正常课堂教学阶段。认为上海也极有可能跟北京的安排一致，后续上网课。

2月6日：

总体而言，是平常且有规律的一天。但在晚间洗漱上床后，被李文亮医生是否去世而牵动情绪，凌晨开始为其祈祷，并迫切想要知道最新消息。

08:30 得知有15秒接触感染病例，提醒父母尽量不要去人多的菜市场买菜。

睡前：

22:30 爆出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已去世，对此持怀疑态度。

23:00 丁香园确认李文亮医生抢救无效去世，对此感到震惊。

00:30 得知李文亮医生的同事爆出其仍在抢救，对其死亡进行辟谣。事件出现转机。

00:45 开始祈祷李文亮医生能够起死回生。同时，各类关于李文亮医生的治疗信息爆出。我期待奇迹能够出现，时不时地便刷网友的评论并搜索李文亮医生的名字，期望得到有关李文亮医生的新的信息。

01:00 仍旧未得到有关李文亮医生是否去世的消息，但在看了各网友的分析后觉得希望渺茫，最终选择不再关注，疲惫睡去。

2月7日：

正常学习、生活，并期待2月10日能够出现拐点。同时，家里为过年而储备的食材基本都已吃完。猜测还要隔离一段时间，且不知道疫情会如何发展，家人首次去菜市场采购了半月的食材。

09:00 醒来第一时间便关注李文亮医生的消息，得知其确实已去世。对此感到惋惜。

13:00 得知新冠病毒会造成炎症风暴并带来严重影响。

13: 10 得知国家监察委派调查组赴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2月8日:

得知姑苏区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各重点地区人员一律劝返。姑苏区小区开始严格管控。

2月9日:

家人首次开始去社区附近的树林、公园闲逛,但我仍然被要求待在家中。虽然已开始复工,但众多店面仍没有营业。

09:00 得知苏州的张家港也有了确诊病例,图片显示直接拿木板封了小区单元楼宇,感到有些简单粗暴,但又觉得有安全感。

10: 30 网传新冠病毒可通过气溶胶传播,对此感到恐惧。后被辟谣。

17: 00 得知关于暂停园区所有零售药店销售退热、止咳类药品的通知。

2月10日:

武汉的确诊数量还是平稳上涨,似乎拐点并未到来。在正常学习生活过程中,继续每日关注病例数字。

2月11日:

苏州开始实行复工申请,但多数皆未曾开工。此外,学校开始要求每日疫情上报,得知出小区需要通行证和身份证,发现社区管控愈加严格。

2月12日:

对家常菜已无比厌倦,在尝试了摊鸡蛋饼、做面点等各类花样后,迫切地想要换个口味,但还是不太敢点外卖,也不敢吃卤菜。

2月13日:

发现武汉市开始人员调整,上海市市长应勇被调至武汉。此外,得知全国的病例在短暂

减少后，今日爆发式增长，变为新增 15104 例。至此，因确诊标准不统一，不再关注每日的确诊病例数字是否增加，也不再试图从确诊的病例中来推断武汉是否已出现拐点，对于疫情的关注进一步下降，拐点期待也不在。

*第四阶段：（2月14日-2月27日）：不再关注疫情，规律生活*

此阶段，对于疫情不再主动了解，开始规律地、高效地学习与生活，前期还偶尔会从朋友处获知有关苏州与上海的疫情信息。同时，家人在尝试性地出门后，开始不再担心被感染，每日皆有规律地去公园、树林放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外界的了解主要由家人带回，每日问询情况是否好转，得知店面逐渐开张，路上的车子慢慢多了起来，只是公交车仍旧没有人乘坐。我也彻底接受了在家高效看书、写论文的状态，生活完全步入正轨，仅受仍未开学的小部分影响。同时，隔离后期，由于家人开始规律出门并满足了我改善伙食的需求，我也逐渐接受了在家学习，慢慢地几乎不再会抱怨想出门。

2月14日：

得知苏州新增确诊病例为 0，认为情况开始好转，基本已被控制住。

社区有打电话到家中问询家人身体情况。

2月15日：

未关注。

2月16日：

得知苏州被上海列为疫情重点关注地区。

想出门的情绪进一步提升，并想换个口味。

2月17日：

未关注。

2月18日：

得知苏州地铁需要实名登记，迫切地想要吃火锅，憋闷的感受达到高点。虽然我还没有出门，但家人开始规律地购买卤菜及各类小吃从而改善伙食。

2月19日：

开始申请随申码。

自此，关于疫情的讨论几乎为零，我不再主动关注，身边的朋友也不再向我分享其看到的疫情信息。

## 部分解除居家隔离

### *第五阶段(2月27日一至今)：享受居家学习与网课的推行*

在苏州零病例两周后，我也首次被获准出门，不再受到劝阻。发现小区门口的防疫工作很细致并按照要求办理了社区通行证、申请了苏城码。同时，看到前几天父母说没开的店面也都开始营业。自此，对于疫情的恐惧、担忧皆消失，认为一切都在向好发展。3月2日后，正式开始上网课。我也在学习之余，每日与父母一同出门散步，开始享受居家网课。甚至觉得在家学习不用被限制洗澡时间，不用自己操心三餐，网课能省去通勤时间，还能够陪伴父母并做些家务，比在学校的学习效率更高，更好。心态由原先的期待开学，期待回到图书馆学习，转变为希望部分推行网课。

## 总结

截止3月9日，中国境内的新型冠状病毒已得到了很好控制，但境外输入病例略有增加。意大利、韩国、伊朗、美国的疫情控制不容乐观，病例仍在爬坡。虽然中国已走出了疫情的阴霾，但全球何时能够摆脱疫情的影响，回归正常的运行仍是未知。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无法完全抛开别国，独善其身，只有每个国家都控制住疫情的发展，才是真正战胜了新型冠状病毒。

此次隔离给了我情绪被媒体信息控制并影响的体验，也给了我重新思考生活的机会。虽然目前仍不知道何时能回学校，我也还处于半隔离的状态，不能够考雅思、不敢出去下馆子、也参加不了硕博连读的面试，但至少现在很好，我想未来也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 新冠疫情下的“发热”与“乏力”

黄可琰<sup>1</sup>

## 观察背景

2019年12月初，我国湖北省武汉市报道了“不明原因肺炎”的首个病例，随后其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Peirlinck et al. 2020）；短短一个多月后，2020年1月23日，国内首个出现感染者的城市武汉采取“封城”措施，疫情在全国各地进入集中爆发期。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对自以为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已经远离大规模流行病的我们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和严重的打击。而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中，诸多在公共卫生安全时期没有明显体现的社会问题及现象逐渐在这一特殊背景得以显现。其中，与疫情相关较为紧密的“疾病”与“疾痛”的现象以及对“身体”的认识，随着疫情期间人们对于自我防护的重视和对于疫病传播的恐慌而越发显著。因此，笔者谨在下文中对其在疫情期间（特别是疫情较为严重、交通受到严格限制的集中爆发期，即1月末至3月初）观察到的若干与“疾痛”相关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希冀从社会科学的视野中寻求其可能的原因。

## “发热”——疾痛在流行病环境下的爆发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疫情通报，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拥有几个较为典型的发病特征，其中包含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以及全身乏力等（Hu et al. 2020）。由于发热的症状易于通过使用红外线测温仪等设备进行非接触地快速体温测量而识别，因而成为了我国的防疫措施中对人群进行监控防控的主要症状，往往在测得异常体温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病毒核酸检测。对于体温测量和发热人群的筛查在疫情防控早中期阶段尤其得到重视，各媒体渠道也同时呼吁市民日常居家进行体温测量，此后体温测量逐渐成为市民在疫情期间识别自身感染状况的主要手段。

而在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状态相互叠加，从而使“发热”这样一个在医学上有着较为精确的定义的的症状产生了模糊化、主观化的现象：许多居家的市民在疫情期间表示有时晨起会感觉到轻微的发热和身体不适，但经测量并未符合发热的医学标准；这些症状在午后逐渐消退，至夜晚基本完全消失。这样的现象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给市民大众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作为疫情期间的面向公众的最直接也最安全的就医问询途

---

<sup>1</sup>黄可琰：复旦大学2018级英语系本科生。

径，各大医院开设的线上问诊平台，特别是其中的发热门诊和疫情咨询板块，是观察这一现象的较为适合的“地点”。笔者在疫情期间由于家人的慢性病服药需求关注了上海市新华医院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线上问诊平台。在平台上，每日都有数十条关于“发热”症状的问诊记录，症状的出现一般在早晨或午后，并且这些问诊中基本都提到了“是否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猜测。其中或许有真正的感染者，但更多的问诊对话记录表明许多“发热”症状快速得到缓解。线上的医师也提及了紧张的精神状态导致“发热”感受的可能性。而在笔者身边，包括笔者自己，上述的“伪发热”同样十分常见：自己曾在2月初感受到明显的“发热”、“肌肉酸痛”和“乏力”，并在当时极度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导致了近一个月的恐慌。除去必然存在的少部分的真正的感染者或感染了普通季节性流感的人群外，我们之中较多所感受到的“发热”现象，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发热症状；但在主观层面，其感受或体会是绝对真实而深刻的，在疫情背景下必然导致对自身可能感染的怀疑。笔者由此联想到，作为主观体验而被认识的“发热”或许是一种“疾痛”；“发热”的主观感受是强烈而明显的，但是并不直接表明疾病的确实发生。

而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一现象在疫情之前的发生频率明显低于疫情期间：“疾痛”与“疾病”之间的距离由于疫情广泛深刻的介入而变得尤为特别。而在疫情的广泛社会环境和人们增长的疾痛感知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媒介：身体。疫情通过迫使人们重新唤起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出视线的对于自身身体的清醒意识，让更多平常被忽视的主观的疾痛感受得到重视，因而造成了人们所真实感受到的疾痛的频繁发生。疾痛的集中爆发也与传染病的流行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仅在自己出现某种较强烈而明显的身体反馈的疾痛之后才会逐渐唤醒身体意识，即疾痛感知先于身体意识。但当大规模的流行病发生，人们耳闻目睹周围人群的疾痛反应，从而先唤醒了自己的身体意识，进而对于细微的身体变化更为敏感，即身体意识先于疾痛感知，导致了在轻微的诱发条件下疾痛的明显化；而个人对于疾痛的敏感度增加，在大基数的流行病困扰的社会中便体现为疾痛的集中反映或爆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疾痛的代表是发热、肌肉酸痛和乏力，而发热症状尤为显著且被广泛采纳用以判断健康状态，因而成为了集中之最。

### **“呼吸困难”与“血氧仪”——人们如何消除疾痛恐慌**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集中显现的疾痛症状除“发热”外，“乏力”、“肌肉酸痛”与“呼吸困难”也占据一席之地。“发热”的主观感受在精确的体温测量之后可能被消除，但“乏力”、“肌肉酸

痛”、“呼吸困难”等主观感受却很难在居家环境下与其所对应的严格的医学症状所区分开：它们并没有一个十分严格的判断标准（临床上呼吸困难一般不以每分钟呼吸计数为标准，而是以患者的主观感受为准；因此，即使在临床上“疾痛”的主观感受仍十分重要）。此外，上述的症状与“发热”不同，均可能由紧张的精神环境导致，如紧张和恐慌可能导致肾上腺素激发，从而引起轻微的心悸和呼吸困难。因此，在“发热”的疾痛之后，往往会继发以上的疾痛，并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人们有方法确认疾病是否发生或其自行消除。

“乏力”作为一种在非疫情时期也较为普遍和寻常的疾痛症状，在疫情时期却具有了特殊的隐喻，即新冠肺炎；而“乏力”也因而成为“新冠肺炎潜伏期内导致的乏力”。“呼吸困难”由于被广泛的宣传为新冠肺炎进入发病期的显著病征，在人们所担忧的症状之中受到的关注仅位于“发热”之后。通过“呼吸困难”这一症状，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疾痛的：由于呼吸困难在人们的常识中与氧气有着必然关联，即呼吸困难是氧气的缺乏，而通过疫情期间运作的媒体，我们又可以直接获取疫区病房的救治画面，并借此了解到“血氧饱和度”等与“呼吸困难”的症状相关的精确量度。从而找到了近似于通过体温测量将“发热”的主观感受，即疾痛，与发热的临床定义，即疾病，相区分开从而消除疑虑并减轻恐慌情绪的方法——使用血氧仪检测实时的血氧饱和度。笔者在疫情期间观察到，各大电商平台的血氧检测仪均处于热销状态。笔者曾购买过一款可以监测血氧饱和度的手表，而在其使用中，笔者发现，在疫情时期，自身更倾向于相信仪器给出的显示出异常的结果，如当血氧值显示为 92%这一较低水平时，笔者首先相信了这一结果，并主观上感受到呼吸急迫的发生；而在随后的测量中，当结果显示为 98%时，笔者主观感受到的呼吸窘迫消失了。但在非疫情时期，当出现 92%的结果时，笔者的第一反应是仪器出现了偏差，而非接受这一结果，并体验到其暗示的主观疾痛的产生。在疫情期间的测温程序中，笔者同样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当测温枪显示出偏高的体温（如 37.8℃）时，工作人员会首先将受测者快速转移至临时隔离点，而非直接二次确认仪器结果是否出错。在一次外出志愿者服务中，笔者的母亲就曾遇到这一状况：她被直接送至测温点旁的临时隔离区，随后再进行二次和三次确认，发现初次测温偏高。事后笔者的母亲反映，在临时隔离点等待期间，她确实感到轻微的发热感觉，而在确认健康后症状立即消失。可见，疫情期间，疾痛的产生往往立刻与疾病挂钩，并得到严肃的对待，以确认之间的关联性；而疾痛由于疫情高传染率和较高死亡率带来的的强烈隐喻，导致了人们对于疾痛的恐慌和对身体的过度关注，从而更加易于感受到主观症状，并导致了“疾痛因子风暴”，促使人们快速地寻求方法区分疾痛与其可能暗示的疾病。

## 结语

新冠疫情是一场影响深刻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诸如本文中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本文所观察的疾痛与疾病在疫情期间的爆发、延续、区分以及消除都随着身体概念在疫情的高压下的重新显现而进行。可以说,这场疫情揭示了我们日常所忽视的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常常被人们所混淆的疾痛与疾病在身体意识下是如何被人们识别并摆脱的。这或许能给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处理自我与病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些有限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Peirlinck, M., Linka, K., Costabal, F. S. et al. 2020. Outbreak dynamics of COVID-19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omechanics and Modeling in Mechanobiology*.
- Hui, D. S. , Azhar, E. I. , Madani, T. A. , Ntoumi, F. , Kock, R. , & Dar, O. , et al. 2020. The continuing 2019-ncov epidemic threat of novel coronaviruses to global health — the latest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wuh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91, 264-266.

# “剃发战士”与“英雄母亲”——新闻中的“新冠女性神话”

岑书畅<sup>1</sup>

## 引言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 60%，围绕她们的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产生了许多新闻，其中有一部分引起了巨大争议。本文选取了两个突出的主题类型：剃发和生育（流产），从性别视角出发，结合历史梳理和不同的理论，讨论这些新闻聚焦的“身体仪式”作为固化的符号如何构建出波伏娃所谓的“女性神话”，充斥着赞美的文本又传递了怎样的性别认知。

2 月 16 日，每日甘肃网发布了《剪去秀发，整装出征》的新闻，报道了女护士们在出征仪式上被安排集体剃光头（而男同事则保持原有发型）<sup>1</sup>，并附上很多流泪的特写镜头，以宣扬医护人员的无私伟大。此报道引发了很多质疑，网友认为这种做法是将女性作为邀功、作秀的工具。

另一类新闻则紧扣生育话题，如“女护士流产十天后即返回岗位”、“即将临盆的孕妇拒绝回家待产坚守一线”、“新妈妈强行断奶奔赴前线”等。通过角色身份矛盾突出女医护的英雄形象，似乎强行给血肉之躯披挂上英雄主义的悲壮外衣。

这些新闻的出发点固然是真诚的、正面的，但从呈现出来的效果看，某些角度却落入性别刻板印象的“神话”陷阱之中。在将女性生理、心理需求和母亲角色置于与大义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时，也折射出社会对于女性奉献行为和性别形象的暧昧态度。可见，此类新闻的底层逻辑与“提高女医护的地位，强调其价值”的目标是相悖的，也不利于整体的性别平等。

## 头发的隐喻：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用人类学的视角解读“剃发”，首先要回溯历史。古往今来，头发一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发式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审美问题，而是与性别形象、地位、社会变革相关联，并折射出深刻的政治性图景。

古代中国，受儒家礼教观念的影响，发式不同是男女有别的身体标志之一。长发审美观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一环。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最终确立了男性短发的社会形象，也引发了一股女性剪发潮。剪发

---

<sup>1</sup>岑书畅：复旦大学 2017 级汉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是“新女性”的标记，拥有着代表革命意味的短发女性却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稳定性的焦虑，政府出面制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子放足则受到提倡。相比剪发，禁缠足符合国家对女性身体“强国保种”工具性价值的肯定，是国家话语主导女性身体改造的表现(周洪宇,周娜,2016)。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五四平权浪潮。可以说，符号化的女性身体被有话语权的男性精英及其代表的国家机器所言说和干预，女性解放的应有之义被民族、国家的崇高叙事所遮蔽。

十七年、文革时期，“短发”、“双辫”的革命风盛行。平等思想异化为否认两性差异、“去性别化”的审美要求。舆论对女性形象加以束缚，长发、烫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刘春,王蕾,2019)。“阴阳头”尤其是一个具有羞辱性政治含义的符号。

霍皮克(1969)认为剪发与社会控制相联系，长发的艺术家、隐士往往超然遁世，而剪发则象征着人们处于社会纪律的统治之下(比如囚犯)。这些解读虽然并不能兼容所有情况，但依然极具启发意义。

在主流审美中，长发是“女性化”的形象，短发一般是“男性化”的形象。文学和影视艺术将女性剪发这一行为渲染成一种悲剧性的“壮举”：《悲惨世界》中芳汀卖发还债、《海的女儿》中姐姐们用头发换取杀死王子的匕首……头发被视为女性身体中具有特殊价值的部分，这其实隐含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女性天生应该留长发，头发是女性的生命，因为这是温婉柔美的表现。于是女性剃头变成了一件“值得被报道”的事，甚至被争相效仿。社会用男性凝视下的固化女性美塑造女性；此处，“神话思维以固定的永恒的女性去对抗女人分散的、偶然的和多样性的存在”(Beauvoir,1949/2011)。

呼应霍皮克的“社会控制”说，女护士被迫剃头体现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值得商榷的不是女性剃头本身，而是“含泪被剃头”的头条夺取女性的身体自由来进行宏大叙事的形式主义宣传，以迎合社会对女性牺牲的想象。

最讽刺的是，报道一边大肆颂扬“剃头为大义”，记者还一边问“剪了头发还能找到男朋友吗？”

### **观看的暴力：镜头话语与媒体伦理**

现代性社会中过饱和的视觉刺激将人塑造成感官动物。镜头是观看的工具，而观看是一种社会实践，无论我们是参与还是拒绝这个观看，都在行使观看的“政治性”——观看行为不只是单向度的接收，它决定我们如何定义、解读以及评论被观看者(Sturken, Cartwright, 2009)，

镜头则是用来加工、展示、夸张、扭曲被观看者的工具。

与其说镜头的目的是展现真实，不如说是一种无法避免主观性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镜头的暴力仍可能转嫁到现实的人身上，所以媒体伦理就显得格外重要。“剃发出征”视频的拍摄者或许只是想表现“她们很有决心”，通过头发落下的那一刻让感染观众。但粗暴的特写镜头“再现”出的现场反而让人感觉到片中的女性受到冒犯和羞辱——通过摄影叙事，女性被物化成一种带有强烈价值观的诱导性的炫耀工具，并未受到作为人的尊重。

### “英雄母亲”、生育和牺牲

“新冠女性神话”的另一面，是由怀孕、流产的相关新闻来书写的。波伏娃(1949/2011)认为，一方面，女性繁殖力作为一种被动但重要的功能被崇拜，另一方面，男性在梦想与母性融合的同时又表现出对肉体状态的反叛。出于对无偿性和动物性的厌恶，尽管社会对生育投以尊重，人类却本能地反感生育。所以公共话语往往会避开与生育相关的月经、孕期和哺乳期等话题，甚至视其为污秽、禁忌。

日常宣传中的母亲形象大多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们坚持她的纯洁、圣洁，是因为“不想承认她有身体”。但在疫情期间，大量新闻反而选择强化女性的生育特征，来论证女性集体的伟大和牺牲，也就是说其个体性被抹去，只作为“母亲”存在。在斯巴达、纳粹德国这样的战争型社会，女性理想与男性理想是对称的，即抹去性别共同隶属于国家机器，这样的机制或能促进女性地位的提高(Beauvoir,1949/2011)。反观上述这些报道，关于生育的表述甚至作为证明女性努力超越无能、柔弱、阴性的性别障碍接近男性功能的例证被主流媒体赞美(即怀孕、流产或经期都会使女性虚弱，丧失生产力，在功利层面沦于“第二性”，而这些医护人员能够克服这种生理的“缺陷”，不受影响地和男性一样战斗，这是其中隐含的价值取向)。此处，两性关系的钟摆运动显现出另一阶段：“她没有失去任何原始属性，但这些属性改变了标志，它们从不详的变成吉祥的；妖术变成神术。作为女仆，女人有权获得最辉煌的荣誉”(Beauvoir,1949/2011: 240)。

可以发现，社会结构中的女性身体承受着这样的矛盾：肯定又否定，光荣又可耻。一方面，流产、怀孕、月经等深刻的身体经验作为性别标签被反复利用，烙印在女性形象上；另一方面，个体作为人的真实需求、权利和感受又遭到阳性叙事下“更高使命”的遮蔽、忽略、打压，和鄙视<sup>1</sup>。

---

<sup>1</sup>比如，安全裤和卫生巾送不到女医护的手上，也是抗疫期间一大新闻热点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1949/2011:242）分析了“英雄母亲”崇拜与乐观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她的作用正是将死与生命、社会、善融合在一起。因此，对‘英雄母亲’的崇拜一贯受到鼓励……拉拢母亲对社会是有利的……一个群体越是坚决地主张乐观，它就越顺从地接受这温柔的权威，母亲就越是变得美好”。

这种固执的乐观主义在疫情期间的大部分官媒报道中都有所呈现，哀歌赞歌化，是服务于整体动员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崇高的神话表面上将牺牲与生命、社会、善融合在一起，却丧失了根本的真实性；缺乏对人性的关怀，也就无法引起深层共鸣，更是与女性主体性的构建背道而驰。特殊时期的公共话语平台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人们对这种“神话”的反应如何，也值得深思<sup>1</sup>。

## 总结

是否想剃头发，如何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抗疫号召之间决策和平衡，是医护人员的个人选择，其职业身份和家庭身份、性别身份对行为的影响也没有先后主次之分，我无权也无意评判任何一个涉事主体；但是新闻媒体如何处理和传播这些事件却是观察世界的一个切入点：新闻如何塑造神话式的“理想意象”来达到宣传目的？这些女性形象有什么特点？隐藏在微妙的措辞之中的对于女性的核心态度是什么？“女性神话”和现实中的女性个体有怎样的影响和互动关系？

作为一名女性，我感到遗憾和反感的是，一系列与“怀孕”、“流产”、“长发”等行为或特征紧密相关的新闻不断煽情地叙述女性如何“忍痛”割舍女性气质，强调其投入社会生产是非常态的、需要被报道的，底色仍是性别本质主义。神话中的女性“无血无肉”，仅仅是作为符号化的失语的他者。而正如波伏娃(1949/2011)所说，“女人越是作为人而确立，他者的‘美好品质’就越要在她们身上消失。”

## 参考文献：

- 波伏娃·西蒙娜. 2011. *第二性*.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49)
- C.R.霍皮克.1969. 社会之发.见史宗(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pp.215-22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刘春,王蕾. 2019.中国女性剪发谱系考:基于社会观念视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31, 96-101.

---

<sup>1</sup>这与之前提到的“事实再现”、媒体伦理也有关系。

玛莉塔·史特肯, 莉莎·卡莱特.2009. *观看的实践* (陈品秀译.).台北: 脸谱文化.(原著出版年: 2005)

周洪宇,周娜.2016.隐喻的身体:民国时期学校中的女子“剪发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4, 41-47.

# 对疫情相关展览的文化人类学观照

范翊<sup>1</sup>

## 疫情中的展览：观“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专题展”

在疫情最紧张的 2 月初，中国科学技术馆即推出“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专题展”，展览的目的是呈现“从疫情现象到科学本质，再到精神内涵”<sup>2</sup>，广泛从卫健委文件、《人民日报》等官媒和视频网站等平台整理资料，以期还原疫情的发展与防治全局。同时科普病毒危害、口罩的防护功用等防疫知识。尤其在展示技术上，设有代入式的情景还原，如“做一天白衣天使”（见图 1）、“抗疫战士的‘盔甲’”（见图 2）等，使线上受众得以了解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这些线上展览特有的展示技术似乎也能激发我们动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图 1：“做一天白衣天使”

值得指出的是，该展览最主要的展示内容是文本。这些文本引用了不同身份的“发声者”的不同形式的“话语”，如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指示、“逆行”医护人员的请战书、家属的家书、官方媒体的报导、高亮醒目的横幅标语、情景还原中的医护人员（甚至拟人化的病房以第一人称自述其配备的防护装置）等等，已然形成了某种“多声源”（multivocality）叙事。

<sup>1</sup>范翊：复旦大学 2018 级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生。

<sup>2</sup>“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专题展”，<https://statics.cdstm.cn/subjects/yqfk/>。



图 2：各种标语

这一兼具“高度、温度、广度、力度、亮度、深度”<sup>1</sup>的展览在“战役”的紧要期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参与，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而究其意图，可大致分为两类：医疗防治知识的理性科普传播，以及在感性层面抚慰、稳定社会公众，亦即展板上醒目标明的“暖人心、强信心、稳民心”。

这些传播意图的目标对象无疑是不直接参与“战役”的绝大多数公众，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理所当然地被预设为需要科普、抚慰和竭力稳定的对象，以至于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和谣言、自媒体平台上的未经认证的影像报道以及公众的集体无意识的“疯狂”反应（如抢购口罩、双黄连等）都未被纳入展览叙事——甚至在疫情的特定危机中，它们已然构成了与官方主导相对立的另一叙事，两类叙事之间形成了相当的张力。

这对于既代表官方、权威，又面向目标受众（在这个案例中，亦即绝大多数公众）的博物馆展览而言，似应意味着两难——但大多数的策展仍预设受众是被动对象而非具有能动性（agency）的展览参与者；更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纪念类展览正持续参与到“官方叙事”<sup>2</sup>的某种“符号化”过程中，或许会继续固化上述的叙事对立，而忽视了该对立的意义与影响。

### “后疫情”展览的文化人类学观照

博物馆学学者曾提出过一对概念：“博物馆性”（Muséalité）和“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前者指将物品抽离出原现实情境而置于博物馆中展示，而对物品的择取则取决于其“博物馆性”，亦即与特定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互动形成的综合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展品、展览、博物馆其实也分有、凝练、展示着文化（Culture）的“符号-价值-规范”系统。<sup>3</sup>

<sup>1</sup>中国数字科技馆.阴霾中的一片

光,2020.05.21,[https://www.cdstm.cn/subjects/wsyjkpz/kjgtx/tzxzd/202005/t20200521\\_1020347.html](https://www.cdstm.cn/subjects/wsyjkpz/kjgtx/tzxzd/202005/t20200521_1020347.html)。

<sup>2</sup>这里特意没有选择“主流叙事”，亦即希望强调疫情期间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另一叙事并非“非主流”。

<sup>3</sup>更多的观展经验使我感受到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某种文化资本，甚至作为符号霸权的载体，也因此长期以来博物馆学都致力于推进平等化和社会共融（social inclusion），正如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或许经历“疫情面前，人人

国家文物局在战役中后期的3月颁布通知征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所谓“代表性”亦可解释为“博物馆性”或“象征性”。

对于征集范围，《通知》明确：“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发布的行政命令、通知公告等相关文件原件；请战书……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基层组织、人民群众、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标语横幅……典型人物、典型事迹的宣传报道”<sup>1</sup>，这些以文字信息为主要价值的见证物借由其更稳固的物质形态获得了更鲜明的主体性，而在实物展出中，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已然不局限于其（多经刊布的）文字信息，更是作为疫情的“官方叙事”的重要符号。



图3，图4：网络展览中作为“盔甲”的防护服和“复旦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专题展”的实体展中挺立如卫士的防护服

那“官方叙事”的所指是什么？这次疫情和（网络展览所回顾的）新中国初期防治血吸虫病的“血防”一样，都被抬升至“人民战争”的高度，卫生医疗建设也长期被冠以“爱国”头衔，当它们成为象征动员能力、制度优势和“胜利”的符号时，社会经历是否正被某些“理性的官僚术语、生物学知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塑造？（Kleinman and Watson eds, 2006）是否尚留着某些“社会苦痛”（social suffering）未经彻底审视与治愈？——这是我对“民间叙事”的关怀所在。

从修昔底德对突现雅典的大瘟疫的记载（也是欧洲历史上对大瘟疫的最早记述）可见，人们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些患者身体一痊愈就患上遗忘症”<sup>2</sup>，而另一些则“一时大喜过望，竟异想天开地认为，以后的岁月任何疾病都夺不走他们的性命”；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失序和道德崩塌，“人们朝不虑夕，对所有的法律，神圣的和世俗的，均持轻蔑的态度。”<sup>3</sup>

平等”之后，博物馆人的努力将投注更多真诚与坚定。

<sup>1</sup>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征集和保存工作的通知,2018.02.18,<[http://www.ncha.gov.cn/art/2020/3/18/art\\_722\\_159642.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20/3/18/art_722_159642.html)>。

<sup>2</sup> 这似乎也可引申为对社会苦难的集体性遗忘的一种隐喻。

<sup>3</sup>参见吴晓群.如何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地思考？,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复旦通识·学人疫思”,2020.03.2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4760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476010)>

（修昔底德，1985）我以为疫情期间“民间叙事”正是其前期表征，即使社会不太可能失序，却也可能将进一步引发持续性的“道德生活”（moral life）危机。（凯博文，2008）

### 对展览叙事的反思：回归道德生活

该如何回望（展览）？如何记忆（历史）？如何继续（道德生活）？——观展之后我不得不如是扪心自问。

我想借用尼采的名言，“生活需要历史学的服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却是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的最高问题和关怀之一”。博物馆的展览就是“历史学的服务”，它首先是严守真实性、尊重历史的，其次应“服务于道德生活”、对社会情绪与道德怀以关照，最后是对精神与意志的弘扬——则“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亦可取得相应平衡——一旦过度失衡将会形成某种过剩，则生活与道德“将支离破碎、将退化，并且又由于这种退化，历史学亦复如是。”（尼采，2007）

我所同样信守的是，历史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等人文或社会科学的终极使命将是推动价值观、道义和伦理的自觉与超越，进而回归于对日常性道德生活的“批判性伦理反思”（critical ethical reflection）。

像凯博文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的安逸和秩序是何等容易被动摇，而当我们面临深深的苦难时要维护我们的认同和文明世界的抗争又是何等不易——我们还在为寻找我们人性的意义而奋斗。”（凯博文，2008）

### 参考文献：

Kleinman, & Arthur. 2006. *SARS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古希腊]修昔底德. 198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德] 尼采. 2007. *不合时宜的沉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阿瑟·克莱曼. 2008. *道德的重量: 在无常和危机前*. 方筱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关闭的摄像头：网课时期的一个细节

程伊泽<sup>1</sup>

“真是很可惜，给同学们上了一学期的课，却还没见过大家长什么样子。”在我上周的英语课上，老师如此说到。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在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同学一次都没有打开过自己的摄像头。尽管这是个不足为道的细节，但我们也能从中窥得对网课时期的一些新了解。

## 网课完成的“提纯”

与以往相比，本学期所采取的网络教学无疑是疫情之下的特殊应对方式。若要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的特定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进行语境上的检视。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教学实现了对教学活动的提纯。传统教学要求学生身处教室、出席课程，但无论是学生上课前的位移还是上课时身体所占据的空间，都最终指向听课这一目的。实际上，知识的传授与交流是一个更为直接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它只需要视觉、听觉以及声音的参与；也就是说，眼、耳、口是网络教学中仅剩的三个器官，是维持课程进行的必要的与最低的配置。当教学场所完成了由实体教室向网络直播室的让渡，教学活动也能够最大程度地聚焦在信息的交换之上。

这种理论上的聚焦或者说提纯，是完全基于知识传递的维度之上的。但问题在于，上学这件事从来并不仅限于此。当人们穿过校园前往教室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空间之中得到了潜移默化影响，不断地对自己的学生身份进行强化；当人们在桌子后面坐下，环顾四周的同学和前方的老师时，他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眼神和手势中满足自己社交的需求。仅仅是坐满了人的教室，便构成了一个绝佳的社交场所：聊天、游戏、开玩笑，人们在平衡互惠的氛围之内进行互动，改善着自己与他人的心情<sup>2</sup>。传统的教学方式绝不是仅仅与知识的传递有关，它在客观上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学生们在主观上也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上文的“提纯”称为“简化”，它使得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潜在的平衡互惠趋近于零，使得其中的社交功能无可寻踪。

---

<sup>1</sup>程伊泽：复旦大学 2018 级法语系本科生。

<sup>2</sup>萨林斯认为平衡互惠是要求价值相当、报偿时间明确的交换，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在此处的场景中，我认为同学们之间的良好互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交换关注、精力与好感，这样的互惠可以在同学群体的社会纽带之上发挥作用。

## 无关紧要的设备

那么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学生们不愿意打开摄像头交流呢?若是能看到彼此的面孔,人们不是可以构建出更亲切的氛围么?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课程的直播会议室具有某种公开性,摄像头并不能像空气一样不加干扰地传递彼此的眼神。在会议室的视频功能里,根本不存在私密性这回事;当你直视摄像头时你的眼光会射向几十个人,而同时你又陷入了这几十个人的审视之中。目光的直线传播被错综复杂的视觉链条搅乱,更何况这些链条都需要经由技术与网络之手中转。人们在这样的场景之下难以自处,无可避免地落入萨特式的困境之中:“我在无数注视下被抛上舞台,又无数次脱离我自己。”<sup>1</sup> (让-保罗·萨特, 2007)

这一点与视频聊天全然不同。尽管同样需要借助通讯技术,但此两者的性质与出发点大相径庭。在视频聊天的语境下,摄像头的开启是为了让相隔遥远的人们更亲密地沟通,呈现两个或几个人的面孔,传递彼此之间的目光;它全然地服务于聊天的社交目的。而至于网课,它已经将教室所占据的空间抛向身后,与之一并消失的还有传统教学所承载的社交意义。直播会议室寻求的并非缩短各与会者之间的距离,而是跨越数千公里,将来自某一点的信息辐射到其余的端点。不难看出,摄像头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无关紧要,人们没有任何打开摄像头的需求。

## 摄像头之罪

让我们回到摄像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与我们的另一个选择“相机”对比,它与审美和艺术有着天然的疏离,人们拍照的工具永远都是“相机”而不会是“摄像头”。在这个呈现出偏正结构的词汇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明确的功能指向:这种设备的任务就是将画面记录下来,简单如斯。

这种近乎粗暴的简单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若是与人们的面孔相联系起来,它便几乎要沦为众矢之的。对于这一批大学生——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而言,我们大概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便对个人形象的美观有着近乎夸张的执着。这一代人是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原住民,依赖自拍与自拍之下的点赞与评论构建自我,迷失在拟真之中而深以为乐。而在挑选照片的标准之中,“好看”自然而然地占据了至高的地位,只有足够好看的内容才能够配上文

---

<sup>1</sup>实际上,萨特认为主体恒久地处于这样一种窘迫的人际关系之中,“注视”并不需要目光便可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来说,直播会议室的存在几乎将这种窘迫放大到了可以感知的地步。关于萨特对于“凝视”的论证,详见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第 319-376 页。

案，登上微博或者朋友圈。这种心态的最佳表征便是相机与图片的滤镜，面孔与现实被它们恰当地美化，在对真实的稍稍背离中达到这个时代的默契，以至于人们难以接受不够好看的图像。如同居伊·德波 (2005)所言：“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的、虚构的事物。”在人们被疫情隔离在家中的当下，生活的重心逐渐向网络倾斜时，这个论断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而摄像头的原罪便在于此。它在会议室中呈现出的只能是完全复刻后的图像，不加修饰，直白粗糙。直播式的呈现打破了人们精心准备、挑挑拣拣的拍照过程；它从斜下方 45°所记录的东西更近于讨人厌的真实：凌乱的刘海，顽固的黑眼圈，反光的鼻尖，甚至是层叠的下巴。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当代大学生，这显然是不能忍受的。我们并不希望眼见着自己在社交媒体中构建出的理想形象被打破，也不希望自己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都被忠实地记录下来。

### 考场：一种特殊情况

但之前所讨论的只是大多数的情况，实际上总有一些时候学生们必须打开摄像头。我用到了“必须”，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任课教师可能要求学生开启摄像头以完成考勤，或是进行监考。“期末考试时同学们需要使用至少两个设备，分别对电脑屏幕与上半身进行录像。”当摄像头与考核相联系时，直播会议室几乎要转变成为边沁所描绘的全景式监狱<sup>1</sup>，福柯的论断在其中一次次回响：“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米歇尔·福柯, 2012)

此时，摄像头完全地作为监视工具而存在，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会认为其中存在着哪怕一丝一毫的社交意味。它闪烁的不再是同学们错乱的眼神，而是来自任课教师、教务系统与其身后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审视。各个摄像头不再作为分散的端点存在，以排列组合的方式连接其与与会者的目光；它们向中心聚拢，演变为了监视系统最末梢的触角。也就是说，虽然此时的摄像头已经打开，但这个转变同样彰显了网络教学中教学的至高地位。

需要澄清的是，这样的监视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可以在某些情景下与个体的意愿相吻合。以考试为例，学生群体所追求的莫过于尽可能的公平，而这种公平在当下只能通过摄像头监考的方式尽量达成。所以，同学们唯一会心甘情愿打开摄像头的情况，大概也就是在期末的考场之上。

---

<sup>1</sup>这种监狱由中心的监视塔和四周的透明牢房构成，从中间可以看到四周发生的一切，但中心则无法被观看。福柯将边沁的这个构想视作一种“神奇的机器”，它不仅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也可以用于教育学生等其他目的，这样便可以通过监视来免除暴力的参与。详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 224-235 页。

**参考文献:**

居伊·德波. 2005. *景观社会*.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 2012. *规训与惩罚*.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让-保罗·萨特. 2007. *存在与虚无*.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疫情中的群体对于社交中道义互惠的理解

尤淇正<sup>1</sup>

该笔记主要记录了本人于5月29日至31日期间进行的疫情相关的观察。通过对材料的整理，该笔记重点聚焦“疫情中的社交”。第一部分的观察实录，主要记录了菜市场中人们“摘掉口罩”的原因；第二部分的观察实录，主要记录了本人对一位武汉高中生关于“戴口罩的校园社交”的访谈，前两部分为观察实录。第三部分是对于实录的概述和讨论，讨论了疫情社交中的“先前”文化的张力，也讨论了受访者、被观察者代表的群体对于“社交”、“道义互惠”的可能的认识。

## 香烟如何让人们摘掉口罩——对疫情期间菜场的顾客和商贩摘掉口罩原因的观察

观察时间：5月29日上午

观察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大华路六园街路口

地点选择的原因：

(1) 该菜场是一个设立在街口的露天市场，其中的商户包括临街店铺商家、摆摊摊贩，由于商户类型复杂不便管理，该市场的卫生条件差，存在异味、污水等卫生问题。并且在疫情期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首例死亡患者的溯源地，浙江省有多起集中传染情况发生在菜市场，这些信息有可能关联了“疫情”和“菜市场”两个意象。综合卫生条件和“菜市场”概念在疫情中的隐喻，从现象上看，菜场中顾客戴口罩的比例更高了。

(2) 在观察时段，菜场的顾客大多是老年人，观察对象的年龄层较为固定。这是因为该菜场周边的小区大多是一些单位的退休员工宿舍，且大多需要工作的中青年人会选择在下班后买菜。

*观察现象记录：*

本次观察主要聚焦于人们“摘掉口罩”这一行为发生的条件和情况。以下记录了本人在观察期间注意到的两个高频出现的摘口罩发生的情景。

第一种情景：当交谈的双方处在某物质上的隔离物的两边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为了“交流方便”而摘下口罩交谈，摘下口罩的同时，他们也会提高自己说话的音量。特别地，当本

---

<sup>1</sup>尤淇正：复旦大学2018级数学系本科生。

人在肉类摊铺边观察的时候，很多顾客都会习惯性地和商贩交流前摘掉口罩并提高音量。这是因为肉类摊铺的摆设结构比较特殊，在销售者和顾客之前有一块高达腰际的高案板，其上堆放了待销售的肉类食品；然而蔬菜商贩会将蔬菜摆在地上供挑选，同时坐在摊铺的旁边。通过采访，部分顾客也表示，这样的摆设结构让肉类商铺的“高案板”带上了一种“阻隔”、“距离感”的隐喻，尽管这些距离对实际交流不会构成较大的影响。

第二种情景：一旦出现了交换香烟的行为，几乎所有的被观察者都摘掉了口罩，他们或者直接吸烟，或者将香烟夹在耳后的位置。同时，交换香烟的大多是男性。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其他社交行为，“摘掉口罩”和“递香烟”高度关联。在观察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交谈双方在见面握手、交谈的时候都未摘掉口罩，而在道别的时候，一方递了一根香烟，由此双方便都摘掉了口罩。

### **戴口罩的校园社交——关于“口罩”意象在社交中的隐喻及其和常规社交的差别的谈话**

访谈时间：5月31日

受访对象：张同学（武汉生源，高中二年级，系本人在参加线上支教时的学生）

访谈方式：微信电话

（下面的对话是整合之后的访谈概要，其中省略了部分和论述内容无关的对话）

**Q：**你是什么时候感到疫情的的确确发生在你的身边？

**A：**我最开始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感染病毒，这导致了我们的提前一天放假。那个时候我挺害怕的，学校里很多同学戴着口罩上课，学校也建议我们戴口罩、少交谈，我也会催着家里人买口罩。但是我的长辈们变得担心是因为突然的封城，他们变得很容易相信社交软件上流传的谣言。

**Q：**疫情期间你总是在晚上一两点钟发朋友圈，你之前也这样吗？

**A：**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出去玩，我确实经常熬夜玩手机，班里的同学也都这样。我觉得是因为缺乏线下社交吧，如果能够出去大家肯定借着寒假一起约自习约饭。但是现在疫情放缓，我还是经常玩手机到半夜，有时候也经常和同学聊微信聊到凌晨。放开出行之后，我和同学在线下见了一面，但是我们都戴着口罩，整个玩耍的过程让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有趣，我有一种“这样的社交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交”的感受。之后我们也习惯在网上聊天了，由于网上聊天不受时间天气等条件的限制，我们也经常一聊了就停不下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熬夜玩耍的习惯。

Q: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A: 是的, 很多同学都觉得, 在疫情的种种限制条件下社交让他们觉得非常不适, 非常拘于形式。另外, 我们在网上也组织出了很多有趣的社交活动, 比如开黑游戏、听书群等等, 这些比较有趣的活动也在吸引很多同学加入。

Q: 你觉得大家戴着口罩的学校生活和原来有什么不同吗?

A: 我只感觉同学之间生疏了不少, 有些关系不那么好的同学见面了索性就不打招呼了, 大家都在避免不必要的交谈, 就让大家社交生活很大程度的缩水了。除了个人的刻意避免之外, 我感觉戴着口罩让大家的交谈也变得非常困难了, 有些时候别人说一句话, 你看不到它的表情, 还要通过仔细听对方的语气来鉴别对方的心情和话的含义, 这让我的线下社交变得非常累, 到最后自己也懒得去交谈了。

Q: 你觉得口罩在社交中代表了什么呢?

A: 我觉得在疫情中, 口罩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在我看来, 戴着口罩和别人交流至少表现了你对别人生命权的尊重。但是现在疫情放缓, 我越来越觉得戴着口罩社交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口罩有点像一个阻隔了一切东西的屏障, 在挡住病毒的同时, 也挡住了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在社交时候的表情和声音。另外, 口罩也很影响我说话, 以我个人的经历, 我在戴着口罩说话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利索, 飞沫和呼出的水汽也很容易打湿口罩, 让人觉得有一点恶心。我现在在社交的时候就有一点想脱掉口罩, 相比当下病毒感染的概率和交流的感受, 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人正常的交流更加重要吧。

## 整理和讨论

前两部分记录了本人对于“疫情中的社交”进行的观察和访谈, 以下的内容是本人以一条完整的逻辑线, 对上述的观察实录的整理和讨论。

### *香烟在社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根据第一部分观察地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 该市场的卫生状况一般, 并且“农贸市场”这一意象在新冠疫情中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负面隐喻, 所以在该市场中的顾客应当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然而, 在这样的条件下, 香烟仍然能够具有让人摘下口罩的能力, 可见“交换香烟”的行为在被观察者的社交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具有特殊的含义。

实际上, 香烟社交是我国居民社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们身份标识的核心, 它

对于居民社会阶层认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申云、贾晋,2017)。在交换香烟的过程中,香烟的品牌、价格等要素传达出了交流双方的经济、阶层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人们也在不断地划定着自我和他者认同的边界,塑造着对于阶层、身份的认知。

相比于握手、微笑等社交行为,交换香烟似乎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高的社交效率。这一方面是因为香烟中具有化学物质具有成瘾性,抽烟能为人们带来清新、悠闲等积极感受。此外,在传递香烟时,人们除了在展示善意,也在传递出关于自我更为丰富的信息,并且由此进行着对于“同阶层”概念的认定和划分,其社会意义显然是更为丰富的。

### *交换香烟的背后——“风险”的交换和承担*

在疫情中,交换香烟的行为显然带有了更为消极和危险的影响。

因为香烟作为消耗品的特殊性,人们在接收对方递来的香烟的同时,必然做出“立刻吸烟”或者“将要吸烟”的行为以反馈对方的诚意。上述行为反映在实践中,就是接收香烟的一方会立刻点燃吸食香烟,或者将香烟卡在耳后的位置,向对方传达“下一支/过一会就抽”的信息。

然而,在疫情期间,上述过程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方面,通过观察,交流双方会选择在交换香烟时摘下口罩,同时吸烟者通常也是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这直接导致了易感人群的暴露。另一方面,“用手递烟”的行为将递烟者手部可能带有的病原体黏连到了烟嘴处,若接烟者直接吸烟,则导致了大量病原体从嘴部进入,加剧了感染的风险。

在任何时期,当个体处在社交环节中的时候,在交换彼此的认同感、善意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交换着各种风险,例如接触性的疾病、后续社交行为的安全性风险等等。在正常的环境中,个体可能会更加侧重于社交行为本身;然而在疫情中,社交背后的“风险”以一种高频率、高严重性的形式被重新揭露,这不仅提醒了我们这种风险真实的存在性,也启示我们需要对风险做出应对和规避的举措。

### *控烟禁烟在疫情中的文化含义*

疫情中的控烟行为具有其特殊的舆论背景:在疫情之初,网络上一度广泛流传“吸烟可以通过以毒攻毒有效杀灭新冠病毒”的谣言。与此同时,大量具有吸烟历史的新冠病人快速死于众多并发症(钟南山,2020)。结合之前的讨论和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谣言的内容已经对疫情控制产生了极为负面和恶劣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控烟禁烟也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含义。

一方面，该举措寄托了社会舆论对于“疫情中的真实信息”这一概念的思考，也表现了管理部门对于疫情中不当舆论的回应。确切的说，群体对于“真实”这一概念的怀疑会由于疫情难以被控制而变得特别强烈，公权部门的失利会让个体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更可能相信原来被归为“不真实”的信息。疫情中加大力度控烟，则是再次通过公权以一种强烈的手段划定“真实”和“虚假”在部分语境中的边界。此举和社交媒体上的大范围“辟谣”的举措互为表里，以不同的侧重点展现了管理部门对于不当舆论的态度。

更重要地，该举措也以较为强硬的方式提醒了人们风险的存在，借助疫情的特殊环境塑造了人们对于“风险社会”的认知。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递香烟和戴口罩这两个行为高度关联，由于香烟的特殊文化含义，这近乎成为了一种社交中的潜意识。个体由于思维的惯性，仍然很难认识到这一行为在疫情语境中的新含义。而禁烟举措中蕴含的对于旧习惯的反思，将旧习惯所遇到的挑战和困境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展示的，还有旧认知的张力。这就提示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中蕴含着众多不可预期的风险，它们因为条件的限制而被隐藏。这样的观念就将“风险”以一种常态化的视角被展示，从而加强了人们对于“风险社会”的认知。

### “口罩”真正挡住的是什么？

在本节，我们将结合第一第二部分所有的观察实例解释“口罩”在社交生活中的象征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口罩”作为疫情中的自我保护和隔离的一种工具，其在疫情语境中的初始象征意义就是“安全”。确切地说，口罩防止佩戴者吸入环境中的病原体，同时口罩也防止可能的感染者通过咳嗽、喷嚏等方式向环境中散发病原体，故无论从利己还是利他的层面看，口罩都象征着“安全”和“保护”。

其次，口罩作为一种面部的遮挡物，也遮盖住了人在语言交流时的面部表情。相比于语言本身，面部表情能够更加直观和精确地刻画发言者的心理状态（胡志雄，2017）。由此，口罩也成为了一种“隔阂”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的产生正是因为口罩遮盖住了我们日常交流所需要的一些重要信息，例如发言者的口型（用于和听到的声音相互补充）、心情状态（用于理解部分有歧义的语言的含义）等。当口罩和物理距离二者作为“隔阂”的象征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自然地需要削弱其中的一种来达成对于交流隔阂的预期，表现在实际的观察中，（在第一部分中）大部分顾客就更有可能在贩卖肉类的商铺的长案板前脱去口罩交流。

此外，口罩遮盖住的还有我们容貌中具有一定辨识度的部位，例如鼻子、脸颊、嘴等，这种遮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与人之间能够被感知到的差别。换句话说，个体的差异逐渐被口罩遮盖，“群体”的概念在人们的认识中被极大地深化。个人特点的隐去给个体之间的社交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即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表达自己的特点，同时我们也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去认知别人传达的个性化信息。同时，口罩所隐喻的群体性，也在时刻提醒着社交生活中的个体，来自公共权力机关的“管理决策”的存在，而被“口罩”这一意象所隐去的个体特殊性，自然也无法成为管理决策的考虑因素。表现在观察中，（在第二部分）戴口罩的校园社交受到了高中生的抵触和反感，正是因为口罩背后隐喻的是来自学校、家长的管理，这样的管理和青春期的学生对于隐私、自我的追求是相悖的。

### *疫情中的我们在社交中如何认识“道义互惠”？*

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下，人们把社交行为理解成第二类的道义互惠，即“平衡”。当一方有一些“付出”性质的行为时，会期待社交中的另一方做出具有同等社会效应的回报，同时，这样的回报也逐渐被社会习惯固定成一种必然。同样以香烟社交为例，当一方向另一方递出香烟的时候，他必然期待着对方具有回报性质的社交行为，例如递送具有相近价值的礼品（物质层面）、对于其展现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称赞和认同（非物质层面）。

首先，疫情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道义互惠”的方式，也为常规的方式添加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在疫情中，“约饭”这一行为变成了“冒着感染的风险聚餐”。而“冒着风险”一类的行为，客观地说，就表示了参与者的诚意和决心。此外，线上交互的形式也在疫情的催化下快速发展，课堂提问、课后发帖答疑等交互方式也正是疫情提供的新的“道义互惠”的方式。

其次，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个体的决策要素中，“生命安全”和“感染风险”被放置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变化，对于“生命安全”的考量也在和社交中的诸多要素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和冲突，在个人的决策中，这种冲突被展现成为个体对于“安全”和“社交顺利”的一次次的权衡。例如，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由于疫情总体上处于爬坡期，个体的感染风险较高，所以人们对于居家隔离、限制出行等几乎切断线下社交的管控措施并未十分反感（赵旭东、赵禹博，2020），这是因为此时“感染风险”在个体的思维过程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在权衡下，我们变得愿意牺牲一部分的社交生活来保障周边环境的安全。然而，在5月到6月，当国内的总体疫情放缓的同时，“生命安全”在我们思维过程中

的出现频率也逐渐降低，我们变得容易观察到社交生活中不那么令人满意的部分（韩拓等，2020），例如，我们会因为口罩带来的表达上的阻隔而摘掉口罩、学生会反感口罩背后“管控”的隐喻。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在当前形势中，“感染风险”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相对地，“社交顺利”就会在个体的考量中占据上风。

疫情中的个体对于“道义互惠”的认识也类似于他们对于社交的认识。在常规的认知中，道义互惠带来的风险常出现在结果中，然而在如疫情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中，道义互惠的行为本身、道义互惠的过程就蕴含着诸多风险。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对于“是否进行交换（道义互惠）？”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会在过程的风险和结果中的积极效应中做出斟酌和权衡。

#### 参考文献:

- 韩拓, 马维冬, 巩红, 胡艳超, 张岩, 张春艳, 王聪霞.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负性情绪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399.20200426.002>.
- 胡志雄. 2017. 性别和面部表情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申云, & 贾晋. 2017. 香烟社交, 圈子文化与居民社会阶层认同. *经济学动态*, (4), 53-63.
- 赵旭东, & 赵禹博. 2020. “五消”强化情绪疏导, 筑牢防疫心理防线. *新长征*, (04):59.
- 钟南山. 2020. 如同应对疫情, 控烟也需要举国之力, 还要更加坚决. <https://xw.qq.com/cmsid/20200601A0954S00>

# 医院疫情志愿者故事

杨炜晔<sup>1</sup>

## 缘起

我曾经在位于上海东北角的 C 医院做过社工实习。疫情期间 C 医院社工部的于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医院急需志愿者，10 人，会用手机的，早上 7 点到 11 点一班，下午 1 点到 3 点一班。

### 紧急招募志愿者

长海社工部 长海社工部 2月24日

#### 【紧急招募】长海医院社工部招募志愿者

服务时间：2020年2月25日起。

服务时段：上午7点至11点，下午1点至3点。可根据志愿者实际情况安排服务时段。

服务内容：协助病人使用手机扫码进入医院。

志愿者要求：1.年龄18-65岁；2.在14日内，本人没有外出离开上海；3.会使用智能手机。

服务保障：会有相应的防护用品提供。

报名联系方式：杨老师 13636589036  
或扫码入群



### 防疫期间志愿者招募

图 1：线上紧急招募通知

紧接着我就在 C 医院公众号上做了有关志愿者招募的推送（见图 1）。但是当时上海的新增病例虽然在减少，但存量还是很多的。我想大概没人来做这个志愿者吧，还不如我自己上岗。我联系了以前关系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人家也没给我积极回应。对此我也理解，那里的积极分子都是老年人，年龄也大了，估计自己还不太会用智慧手机，而且来医院做志愿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后来家里找人帮我把推送转到了杨浦 C 街道办公室的公众号上面，来报名的人就多一点了。

## 志愿者的工作内容

我父母对我要去医院做志愿者还是比较支持的，我感觉他们非常相信 C 医院。他们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有风险，但是他们大概觉得我年轻人顶得住，但是特地叮嘱我最近不要去邻近的爷爷奶奶家。

<sup>1</sup>杨炜晔：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我那天 6 点就起床了，从宝山的家里到医院，然后就去门急诊部门口那一堆帐篷里，我见到于主任的时候，下意识的脱下口罩想打招呼，一个护士长就拍了我的手，大喝一声：“口罩戴好！”其实我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我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里面做志愿者，不过当时只是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见到长辈还是习惯性想摘下口罩打招呼。然后就进了一个装备的帐篷，分污染区和清洁区，我们在污染区穿上蓝色的手术服，一看就是那种不太好的，薄薄一层，但是我又想可能真的物资不太够，人都在武汉，装备也在武汉。我把鞋套当成发套，套在头上了，还被护士笑了，再发了面屏、口罩、鞋套、手套我就上岗去了。口罩领取非常麻烦，要填单子，半天只能领一个蓝色的医用口罩，往日的长海医院哪怕是社工部这种部门领口罩都是一箱一箱的。

当天的志愿者不多，于主任穿着志愿者黄马甲和我们一起上岗，她非常执着于志愿者要穿黄马甲、戴志愿者的牌子。我当时想这个黄马甲也不消毒，是不是不太卫生，传染病的病毒岂不是会附着在马甲上。因此我只在第一天穿了那个黄马甲。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要穿黄马甲，因为在长海医院里干什么都是要留痕的，不然每次开例会就显得自己没干活，会被批评。

工作内容简单又复杂，当时健康码刚刚推出一天，各大医院就采用了，但是看病的主力军——老年人是不会用健康码的，志愿者的工作就是上岗去辅助填健康码。健康码一开始只有微信里的“上海健康云”能填写，而且往往等验证码需要很长时间。我当时在医院门口故意没用工作证进医院，只用了 30 秒就填完进去了，我一开始想这并不难，后来才发现是我太天真，只能说会者不难。

填写健康码对于老年人来说面临多重困境。首先是装备的问题，老年人用的手机以两三年前的安卓机居多，安卓机使用几年之后会变得非常卡。其次这个面屏和眼镜一起起雾，在冬日的阳光下我看不清老化的液晶屏。最后是老年人不喜欢排队，他们看到有人帮忙填码便迅速包围了我。

那天早上的记忆我已经有点模糊了，我只记得一种头痛和脚发麻的感觉。上午门诊 11 点结束的时候，我至少帮 100 个人填了健康码。我和 100 个人的手机斗智斗勇，这让我感觉很累，而且还被人骂了。如果有 2020 年 2 月 24 日的监控探头，一定能看到一个被人海包围的我站在 CH 路的正门口填健康码的样子。

## 健康码的领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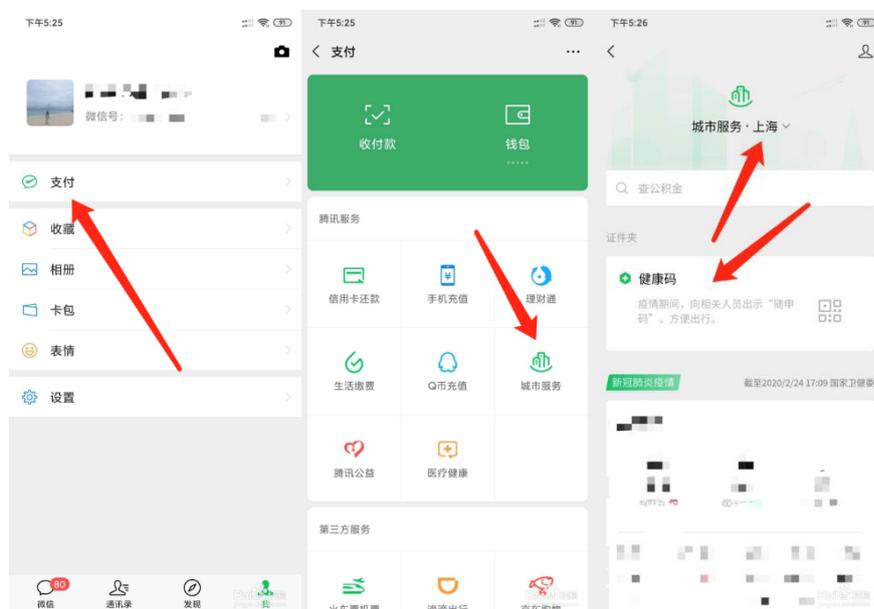
后来医院终于把排队的栏杆立起来了，这次我站在栏杆后帮老人填健康码，终于没那么痛苦了。

那天 C 医院搞医院流行病调查表，医务处不相信上海健康码。我其实不太理解，觉得这个很形式主义，因为两个都是通过自填的方式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一天支付宝端口似乎还不能填健康码，还是用微信。

当时官方推广的健康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海市卫健委的“上海健康云”里的健康码，一种是各个省市的移动、电信、联通三家运营商推出的手机号码漫游查询。许多人试图用手机号码漫游记录来进入医院，但是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们可能有两个手机，只有身份信息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眼中很简单的健康码为什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数字鸿沟”？我总结了一下当时健康码存在的几个问题。首先你要有智能机和微信，因为这个原因看不成病的人其实是有的，大概占 5%。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拿着复旦大学旦苑食堂工作证的阿姨，她的手被割伤了，手里拿着一个山寨的非智能手机，问我怎么进入医院。当时医院执行的政策是持有上海的身份证和医保卡没有健康码也能进入医院。她着急要处理伤口，但是她也沒上海医保卡，只有身份证，后来我带她走后门绕小路进入了急诊，也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旦苑上班。

领取健康码的界面有两个，两个界面都各有离谱之处。（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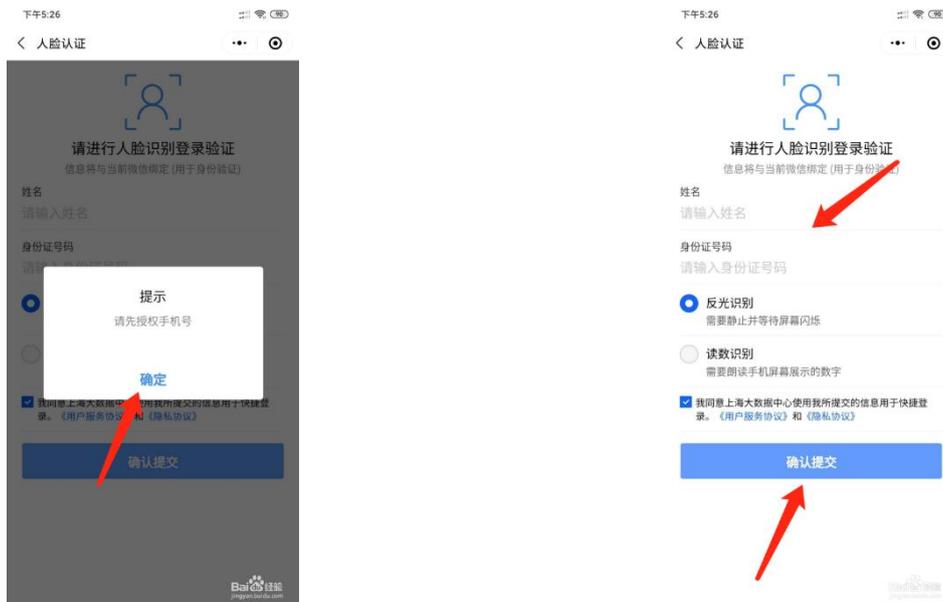


图 2：微信健康码

图示为微信自带的人脸识别入口，人脸识别就要在医院人山人海的队伍里脱口罩。当时有一则新闻，我也没看过，是一个来看病的人对我说的。他说有一个得了新冠的癫痫小男孩不小心把一个护士的口罩摘下来，就短短 30 秒时间，护士就被感染了。所以病人对于这个行为是很抵触的，这个端口医院也不鼓励大家使用，但是有时候队伍实在太长，病人实在太多，就只能用这个端口来加快速度。所以就会见到很多病人翻过栏杆，到旁边的草丛里摘下口罩进行人脸识别。

识别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反光识别，一种是读数识别，反光识别对于光线和手机是有要求的，识别的成功率不是很高，很多人读数识别，但是读数识别就要求病人看着手机读出手机上的数字，有的老年人视力不行，在太阳光下看不见数字。也有残疾人出示残疾证，表示无法读数识别。而人脸识别在信息时代还有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这种方式确实不好。



图 3：“上海健康云”微信公众号

另外一个接口在“上海健康云”微信公众号里（见图3），医院的医务处接到的通知是鼓励大家用这个公众号来填写健康码，但是这个公众号的运营主体也不是政府机关，是万达下属的一家企业，这个公众号可能已经掌握了上海市大半市民的信息了。

来看病的大多是老年人，平日里我总感觉老年人对微信的使用非常熟练，但其实他们可能连怎么关注微信公众号都不会。他们宁可把手机塞在我手里，也不愿意看着医院门口的告示牌一步一步做，甚至有些阿姨也就40多岁，也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帮忙填写。数字隔离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现代生活排斥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排斥着现代生活，我也说不清楚哪边是对的。

我打开他们的微信时，会发现无论老年男性女性都喜欢关注一些打色情擦边球的微信公众号，吸引人的大胸美女的封面图、劲爆的标题，而点进去之后一般都是在南海舰队让美国人震惊，特朗普又被吓尿了这种信息。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互联网也是两个互联网。

关注公众号，找到这个隐蔽的防控服务专区之后，就要点这个随申码健康，之后就是填写界面了。而填写界面也危机重重。第一个危机是手机号要和身份证号相同，很多老人手机号不是实名制的，或者实名制信息填写的是自己的子女，就要填子女的身份证号码，问子女就很麻烦，有的子女还不接电话。第二个危机是验证码，老安卓的验证码出来五秒就没了，也不能直接复制，老人的短时记忆背不出来6位数的二维码。第三个危机是在地址栏需要找自己住哪个区哪个街道，但是那个选项很小，老年人找不到那个选项在哪里。甚至还有老年人自己看不清楚，点了一个14天内去过武汉，获得了一个红码，当天他就没办法看病，据说这样的情况第二天居委会就会打电话向他调查情况。

我是没见过能自己完成这个复杂过程的老年人，我感觉这个系统包容性太差。但这已经是疫情前半段最靠谱的健康码获取方式了。

## 疫情期间的病人

在C医院，有几种人是不用出示健康码便可直接进入医院的。第一是有工牌的人，第二是有红卡或者军官证的人，第三是有上海医保卡的75岁以上老年人。至少在我做志愿者的那段时间内，可以说这些人被认为是没什么风险的人。

很多来看病的人拿的医保卡不是自己的，他们是来便民门诊开药的，如果他们在春节前没有开到足够的药，他们就只能冒着疫情的危险前来医院开药。这些人拿的医保卡一般是他们80岁的老父老母的，他们自己也都60多了，让他们白跑一次我也很不好意思，但是他们

如果没有健康码，我也没办法帮忙。其中有一个人我印象很深，她抱住我们另一位志愿者的腿说她老公的心脏起搏器下个礼拜就没电了，再不看病命也没了，求求我们放她进去，其实她带手机了，是能填健康码的，但是她看到那么多人没能成功看病，一下子就心急上火了。

后来要求全预约制看门诊后，门口的秩序就好多了，他们都是在家预约好了再来看病。我觉得疫情之后也应该推行全预约制度。

那天我爸告诉我，他要来 C 医院执法（环保局污染防治科），他说 C 医院在疫情期间把没有处理过的生活废水（如马桶水）直接排放到走马塘里，还对他说我们是部队，不受地方的管制。我不禁对 C 医院产生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老百姓对于 C 医院的感情很深，有南汇来看病的农民，操着本地话对我说早上四点就出门了，想不到被这个健康码卡住了，而殷行的地方志里，有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了长海医院的烧伤科救治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烧伤儿童。C 医院是非市中心最好的医院，浦东北部几个镇、崇明、宝山、杨浦居民，他们看病的首选都是 C 医院。但另一方面 C 医院又暴露出嫌贫爱富、仗势欺人的缺点，拿着红卡的人直接由护士带着去挂号，且不需要什么健康码，对地方政府执法也很不配合。

## 志愿者招募

疫情期间的志愿者招募，是和平日里不同的。平日里招募挂号的志愿者们，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单位统一派来的，还有很多复旦大学的本科生为了毛概学时来做志愿者的。这些志愿者是为了补贴或各种好处，他们的动机很单一。

疫情期间也确实有一些志愿者是为了补贴来的，22.5 元的时薪确实比较高了，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但是医院也要求我把那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志愿者开除了，为了委婉地说服他们我还是用了一番功夫。我只能说等疫情结束后，他们可以来门诊做别的志愿者。做了几天志愿者后，我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我一直想研究研究志愿者，所以和他们做了朋友。

## 志愿者 zjh

这个人是我的高中学弟，但是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是看了长海路街道的公众号才来做志愿者的。他在健康医学院的医疗器械专业读大四，是一个药代表。他一开始觉得可以结识一些医生或者行政才来做志愿者的，后来发现其实我也是个临时工，不过发现我是他学长后，他变得很高兴，开始说他的药代表故事。他在一个美国药企做药代表，但是他们办公场地在同济医院，而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科室里帮忙打杂，甚至帮医生拉心电图。带他的师傅定期

以开会、政治学习等名义举办活动，给医生们发红包，让医生们推荐他们企业的进口药物。大概做了三天就不来了，然后一直催着我要志愿者证书。

*志愿者 G 大侠*

G 大侠今年五十多，当过兵，家里是军旅世家，他也当过兵。他在医院里有点关系，他是惟一个不通过我报名的人，不知道他从哪个科室的朋友那里要了一件白大褂，他非常享受人家叫他 G 医生的时刻。他是退伍老兵志愿队的成员，但是从来没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这次就是要一张证书，以留在组织里。他很热心，也喜欢对人指手画脚，所以帮忙填健康码非常适合他。他还把女儿带来做志愿者，他似乎还想把女儿介绍给我。

*与志愿者 csj 和辅导员 zh*

csj 是一个在旅行社工作的职员，上海人，大专文凭，每天都在自学英语。她上班的旅行社似乎快倒闭了，这使她处于半失业状态。因为志愿者补贴的事，我和她发生了几次冲突。C 医院定下的志愿者补贴是 17.5 元/小时，疫情期间是 22.5 元/小时。我在公号推送宣传的时候说是一小时补贴 20 左右，财务告诉他们是按照 17.5 元/小时算的，她就不高兴了，打电话给我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和她解释之后她就原谅我了。后来她一天做 6 小时志愿者，算下来一个月赚了 4000 块补贴，财务就不高兴了。为了她补贴的事情，我和财务沟通一百次，终于在 6 月底的时候把她三月的补助发下来了。她在这几个月里每天都要向我催一次补贴的事情。

到了 2020 年 3 月初，学院辅导员 zh 打电话给我，要求我不要再做志愿者，我很生气。他说我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就要被他管着。我没答应他，嗯嗯啊啊了一阵，他自讨没趣就挂了。后来，他也不做 MSW 辅导员了，同学们都说是我把他逼走的。

后来社工系的 F 老师打电话给我，也让我不要做志愿者了，她说她很支持我，但是她和系主任商量下来觉得这样还是危险，而且 C 医院也是社工系长期合作的对象，也不差我这几个礼拜。我说好吧。就这样出于配合学院工作的需要，我就不去做志愿者了。

##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思考

智慧城市的有效运作是极度依赖信息的，但信息的获取还是依靠人。在疫情期间，我们见到了志愿者在医院门口帮助老人填写健康码，社区工作人员填写各个部门派发的统计表格。智慧城市的神经末梢不是一部部智能设备，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社区居民或者社区

工作人员已对填写各种信息表示厌烦。首先是各个部门数据没有打通，导致重复统计，其次居民自身也无动力自填信息。

现在“健康码”系统已经迭代数次，开发出数个 app 接口，每个版本都比上个版本更加友好，各个部门的数据也在打通，但只改进系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让老百姓明白为什么要填健康码，信息的流向是哪里，为什么绿码就是安全的。

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应该共享。

### **对于就医需求的思考**

对普通病人而言，来 C 医院看病可说是杀鸡用牛刀。大部分病人的需求其实是便民门诊，就是只能开药和简单医疗的门诊。分级诊疗体系和家庭医生制度的建设还是略显滞后，对于上海的老齡化程度而言，慢性病管理是最大的医疗需求，这种需求不应该由三级医院来承担，还是应以社区卫生中心为核心。

### **对于志愿者的思考**

在我看来，准志愿精神以道义互惠和地方归属感为基础，对志愿者来说，除了金钱回报之外，精神回报也非常重要。很多志愿者说以前在 C 医院看过病，有感情，才会来 C 医院的门口吹冷风站岗。然而医院并没有制度化地回报这些志愿者的机制，靠的都是志愿者和社工部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当然这样的私人关系在疫情这种特殊时刻也非常重要。志愿者的需求是多样的，有的要证书，有的要方便看病，但纯粹为了经济补贴或者不图回报的志愿者，其实是没的。

# 新冠疫情观察笔记：如何得到我的口罩？

童昊楠

将来若有人回顾疫情期间的影像资料，一定会注意到图像中行人清一色佩戴口罩。可以说，新冠病毒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口罩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人们如何获得他们的口罩？在疫情初期，公众陷入普遍恐慌时，作为稀缺资源的口罩又是如何分配的呢？围绕这一问题，笔者依据自己在东部 Z 省省会 H 市的生活经验，记录了三则观察笔记，分别涵盖公共领域、工作领域与亲属间的口罩流通。

## 一、公共领域

口罩的生产与分配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作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口罩交易并不完全以来“自律性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而是采用市场与政府再分配（redistribution）并存的混合模式。在 Z 省，口罩由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生产，并批发给有资格的各医院、医疗机构与药店；同时，该公司又受到 Z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简称“经信厅”）和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的管理。（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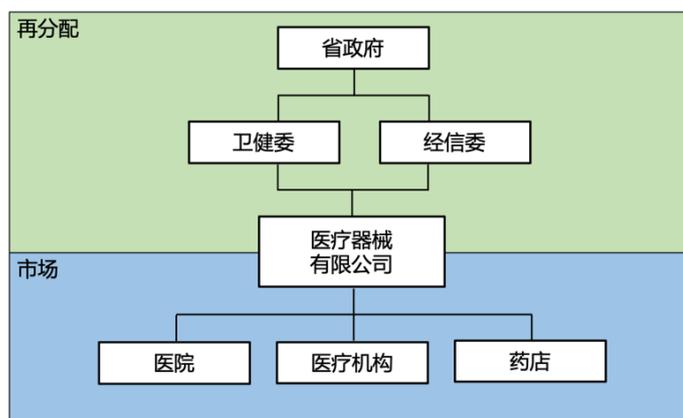


图 1：日常口罩流通机制

疫情爆发后，日常流通领域的口罩很快销售一空，而口罩价格的供求规律也体现在“闲鱼”、“微信群”等非正规市场上。根据笔者亲身经历，普通口罩标价在 1 月底高达 50 元/个。与之相对，在正规交易途径中，政府再分配功能很快发挥作用，并取代了医疗器械公司批发的市场交易方式。

在实际操作中，H 市实行每日定额发放与个人限量获取的管制措施。市“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于 2 月 1 日设立线上的口罩分配系统。（如图 2）市民在官方微信平台实名认证

之后，可以预约次日发放的口罩。每位市民每次限领 5 个，每 10 天有 1 次预约机会（预约失败则不计数）。<sup>1</sup>预约成功的市民凭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药店领取口罩，避免药店人员密切接触引起交叉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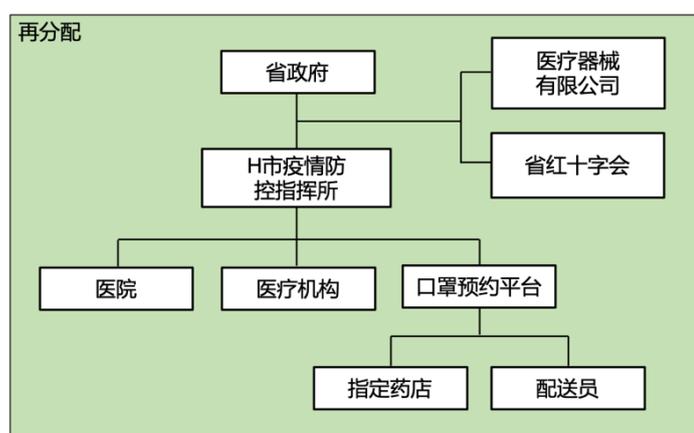


图 2：疫情期间口罩流通机制

随后，H 市政府又对分配方案作出两点改进：其一是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支付宝”平台中的“口罩预约”服务，以解决原网络平台容量小的问题；其二是将市民到店领取改为统一配送上门，进一步降低外出感染风险。<sup>2</sup>

在口罩资源集中（centricity）方面，H 市采用统一生产与集中接受捐助的措施。Z 省内新生产的口罩统一集中在医疗器械公司仓库，而国内外援助的口罩也由省红十字会统一集中。<sup>3</sup>集中后的物质由省政府分配给 H 市，之后通过 H 市疫情防控指挥所进入再分配领域。

再分配的口罩调配方式仅在疫情初期短暂存在。在 Z 省抗疫局势基本稳定之后，H 市也结束了口罩的无偿供应。H 市口罩预约平台于 2 月 12 日下线，之后采取政府统一标价的市场销售模式，每人每次的购买数量依然受到限制。

笔者认为，对 H 市口罩分配的观察印证了波兰尼对自律性市场与社会的讨论。在经济人类学的视角下，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波兰尼，2017：96）。换言之，自律性市场不是人类唯一的经济模式（economic model）；相反，当嵌套与社会之中的市场模式“脱嵌”（disembedded）出来，以市场关系规定社会活动，就必然导致社会危机——比如对口罩的哄抢与社会恐慌。因而，“再分配”与“互惠”（reciprocity）的分配

<sup>1</sup>杭州市政府. 杭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公告（第二号）. 杭州市人民政府网. 访问时间: 2020.5.5. 网址: <http://www.hangzhou.gov.cn/index.html>.

<sup>2</sup>柴悦颖. 杭州市口罩预约方式有变 登录支付宝预约统一派送[N]. 杭州日报. 2020.2.3. 访问时间: 2020.5.5. 网址: [https://hzdaily.hangzhou.com.cn/hzrb/2020/02/03/article\\_detail\\_1\\_20200203A026.html](https://hzdaily.hangzhou.com.cn/hzrb/2020/02/03/article_detail_1_20200203A026.html).

<sup>3</sup>浙江省经信厅（省中小企业局）. 浙江省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网. 访问时间: 2020.5.6. 网址: [http://jxt.zj.gov.cn/art/2020/1/30/art\\_1582900\\_20731.html](http://jxt.zj.gov.cn/art/2020/1/30/art_1582900_20731.html).

方式依然存在于以市场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并在危机时以“反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方式避免市场制度对社会的危害(波兰尼, 2017: 324-340)。

疫情期间,笔者全家领到两次共 10 个口罩。

## 二、工作领域

笔者母亲就职于 Z 省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由于工作涉及公共卫生领域,在整个疫情期间都要到单位上班。在交流中,她向我分享了一段“口罩交换”的经历。

由于安全需要,到班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佩戴口罩。但因上级单位没有统一发放口罩,各个事业单位只能自行购买。笔者母亲所在单位在省医疗器械公司停止批发口罩前,抢购到 50 个医用 N-95 口罩。

然而,省政府旋即下发通知,除抗疫一线的医疗单位外,禁止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佩戴医用 N-95 口罩。该通知让笔者母亲所在单位再次陷入“无口罩可用”的困境,既不能发挥现有口罩的使用价值,也不能解决复工人员戴口罩的需求。为了解决困境,该单位向有业务合作的其他单位寻求帮助,并在偶然中得知 Z 省疾控中心有对 N-95 口罩的大量需求,且其提出愿意用普通口罩交换 N-95 口罩。有趣的是,在协商交换比例时,双方并未按照两种口罩的市场价格比进行交换,而是依据双方单位近期的口罩需求,达成了 1: 5 的交换比率。

笔者认为,这段经历中折射出两个人类学思考点。首先是公职人员使用医用口罩的“禁忌”(taboo)。从口述中得知,禁止公职人员佩戴 N-95 口罩不仅仅是出于“向抗疫前线集中医疗物资”的考虑(因为并没有相关举措统一收集医用口罩,如果没有上述交换过程,这 50 副口罩在短期内也很难投入一线),也是考虑到了口罩“身体仪式”(body ritual)的影响。

由于口罩成为生活必需品,“高级口罩效果好于普通口罩”的观念使人们偏好获得医用口罩。<sup>1</sup>进而,口罩的类型成为获取资源能力的象征。而口罩又恰恰是交往过程中最容易识别的标志物,佩戴高级口罩即成为优势地位的象征。同时,由于 N-95 口罩的稀缺性,以及前文所述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制度,公务人员身份与 N-95 口罩更易于让交往对象产生“不公平”的厌恶情绪。即使获得高级口罩的过程与公务人员身份无关,两者的共存也同样会产生消极的象征含义。

---

<sup>1</sup>H 市经信委的官方公告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该公告反复强调普通口罩在日常接触中有足够的防护性能,并着重指出,除医疗部门外,普通群众并无使用 N-95 口罩的必要性。据笔者观察,在公告发布后,身边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依然尝试各种途径获得 N-95 口罩。详见 浙江省经信厅(省中小企业局). 社会公众使用口罩简易问答指南.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网. 访问时间:2020.5.6. 网址:[http://jxt.zj.gov.cn/art/2020/2/20/art\\_1582900\\_20739.html](http://jxt.zj.gov.cn/art/2020/2/20/art_1582900_20739.html)。

其次是基于工作分工的“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在口罩流通中发挥的作用。笔者发现,在“口罩交换”中,跨部门的工作关系起到“弱关系网络”的作用,并在重要物品的交换上发挥关键功能。口罩交换并不依赖公共领域的市场制度,而是在关系网络内部基于彼此需要完成交换活动。

### 三、亲属之间

除工作关系外,亲属之间“关系网络”的强化也是疫情期间的有趣现象。就笔者的家庭而言,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家庭采用类似“从母居”(matrilocal household)的家居模式。虽然外公外婆没有直接住在家中,但同属一个小区,只有数步之遥。同时,在家庭经济与家庭日常生活上又呈现“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特点,主要的家庭活动集中在笔者与父母之间。

但在疫情期间,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作用有明显增强。如图3所示,笔者的核心家庭在疫情初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口罩,而“大阿姨”<sup>1</sup>家通过人脉关系从海外购得一批普通口罩。在获得口罩后,大阿姨以礼物(gift)的形式将口罩赠予笔者的外公、嬢嬢和母亲,保障了最初两周基本的口罩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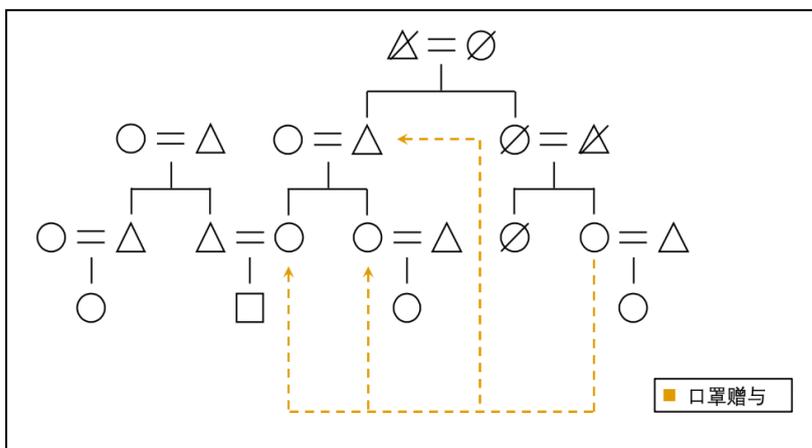


图3:亲属间口罩赠予(1)

随后,笔者父亲从外地邮寄回一批质量更好的口罩,母亲也托人购得数量较大的口罩。这两批口罩又以礼物的形式送给笔者的阿爷、外公、嬢嬢与大阿姨。(如图4)

<sup>1</sup> “大阿姨”是习惯性称呼,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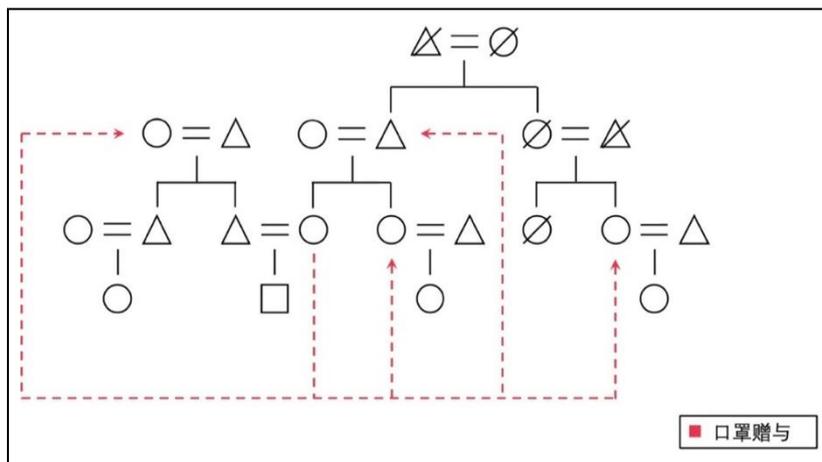


图 4:亲属间口罩赠予 (2)

观察发现，亲属间的“互惠关系”在疫情期间发挥关键作用。首先，日常生活中的互惠关系体现为节日的宴请和礼物交换等社交活动；但在疫情中，日常礼节性的互惠关系成为重要的交往方式，发挥亲属间关键物资分配的功能。在对其他家庭的观察中，笔者发现危急状况使扩大家庭的关系网络更为密切，人们倾向于在血缘亲族中寻求帮助与心理慰藉。

其次，两次口罩赠予也折射出双边结构（bilateral）的代际互动。第一次口罩赠予来源于母系亲属，而第二次口罩赠予来源于父系亲属。和张聪老师研究祖父母育儿模式的发现相似（2019），在亲属间的互惠关系中，并没有父家与母家间基于单边结构的明显分工，而是更多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最后，在互惠类型上，虽然没有被明确规定，但赠予者基本上保持同辈之间的平衡（balanced）互惠与对长辈的泛化（generalized）互惠。同时，在父系亲属或母系亲属之间，也存在对彼此长辈的泛化互惠关系。

## 参考文献

- （英）卡尔·波兰尼.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书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Zhang et al. 2019. The Rise of Maternal Grandmother Child Care in Urban Chinese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1174–1191.
- 杭州市政府. 杭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公告（第二号）. 杭州市人民政府网. 访问时间: 2020.5.5. 网址: <http://www.hangzhou.gov.cn/index.html>.
- 柴悦颖.杭州市口罩预约方式有变 登录支付宝预约统一派送[N].杭州日报. 2020.2.3. 访问时间: 2020.5.5. 网址:

[https://hzdaily.hangzhou.com.cn/hzrb/2020/02/03/article\\_detail\\_1\\_20200203A026.html](https://hzdaily.hangzhou.com.cn/hzrb/2020/02/03/article_detail_1_20200203A026.html).

浙江省经信厅（省中小企业局）. 浙江省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网. 访问时间 :2020.5.6. 网址 :  
[http://jxt.zj.gov.cn/art/2020/1/30/art\\_1582900\\_20731.html](http://jxt.zj.gov.cn/art/2020/1/30/art_1582900_20731.html).

# 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 ——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新加坡新冠疫情防疫措施

陈靖雯

### 一、前言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破坏力前所未有的，可谓是“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人类危机”。如果把这次新冠病毒的暴发比作足球赛的话，一些海外华侨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战中的处境：“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笔者认为这句话用来形容与中国大陆有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台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措施是非常贴切的。

身为一名在中国留学的新加坡籍华人，笔者在一月中旬放寒假回国的时候就经历了新加坡的第一波疫情<sup>1</sup>。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以外情况最糟的国家，但是通过追踪、隔离并监控所有疑似感染病例，在没有实行封锁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有效地遏制住了第一波疫情，被外界戏称为“佛系抗疫”。但是随着欧美病例激增，我国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出现了第二波境外输入性病例。到了4月，外籍劳工居住的宿舍内出现了聚集性传播的情况，第三波疫情的感染人数达到高峰，全国被迫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断路器”（circuit breaker）防疫措施。<sup>2</sup>前，新加坡确诊人数达到33895人，其中已有23人死亡<sup>2</sup>。幸运的是，近期每日新增病例数已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在这场新冠疫情的持久战中，新加坡和谐社会下潜伏暗涌的社会问题逐渐遭到暴露：外籍劳工的居住环境恶劣，成为病毒天然“温床”，他们默默的辛勤付出是否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政府给人民分发口罩、发放补贴金，但是新加坡人是否会因为过度依赖政府而缺乏自我面对危机的能力？疫情催生免费线上演出和网络资源，看惯免费视频的观众在疫情结束后

---

<sup>1</sup>1月23日，新加坡出现首起确诊病例，他是一名来自武汉的旅客。

<sup>2</sup>于2020年5月30日填写的数据。

是否还愿意付钱看演出或购买这些资源呢？笔者希望通过经济人类学的“道义互惠”理论，探讨以上几项重要课题。

## 二、互惠理论的概念

### 2.1 互惠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对礼物交换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具体描叙美拉尼西亚社会库拉交易的民族志中，对馈赠、酬劳及商业交易进行了分类。

在马林诺夫斯等人类学家的启迪下，法国社会学家莫斯于1925出版了《礼物》一书。在该书中，他把礼物交换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整体现象，并认为是“豪”（*chau*）——礼物之灵促使了礼物的交换，即礼物中的“豪”迫使收礼者要作出回报，他把这称之为“礼物之灵”（2002：18）。

1960年，古德纳（Alvin Gouldner）提出了“干泛道德交换模型”（*a generalised moral norm of reciprocity*）理论。他认为，互惠源于“如果你想得到他人帮助，你必须帮助别人”，在互惠的讨论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涉及交易人所界定的价值对等及在送礼和还礼的互动间的时间消逝问题（Susana Narotaky, 1977：45）。

在马林诺夫斯基及古德纳理论的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一方面使莫斯的“礼物之灵”非神秘化，另一方面他又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提出了三种互惠类型：泛化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和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阎云翔，2000：7）。萨林斯对互惠的三分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他的互惠理论为经济学对礼物交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 2.2 概念定义

互惠的三种模式各有不同的特征。在泛化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过程中，给予者不计算给予别人东西的价值，并且偿还的时间也不确定。例如捐赠、富有同情心的举动等都属于泛化互惠。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则指赠送和接受，以及涉及时间都很明确的交换。在平衡互惠中，接受一定价值的物品的人有义务以相同的价值作出回报。例如，某

对年轻夫妻在新婚时收了亲朋好友的“份子钱”并不意味着挣钱，因为通常情况下，在这些亲友结婚时，他们也要相应地给出对等的“份子钱”。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的目的则是在于以最少的付出获得赠予，交易双方可能有对立的利益。（哈维兰等，2014：186-187）接下来，笔者将根据以上三种互惠模式来对新加坡的一些防控措施进行分类。

### 三、疫情中的道义互惠

#### 3.1 防护用品的抢购与捐赠

面对疫情，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人性往往会展露无遗。有人抢购口罩和消毒液，再高价转卖出去（见图1），但也有人做出善举，为邻居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新加坡东北部榜鹅地区就有居民特地把消毒洗手液和口罩放在电梯内供取，还匿名留下字条，写着“回家前消毒”（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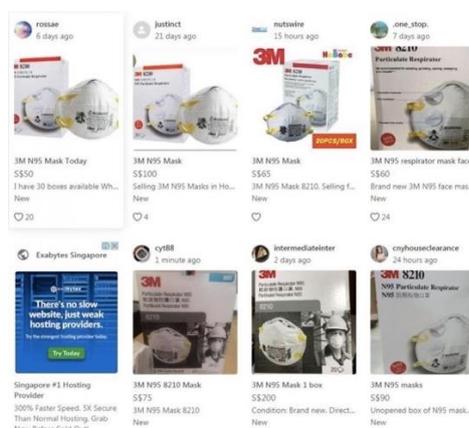


图1：网民在新加坡类似“闲鱼”的平台上高价转卖口罩<sup>1</sup>

<sup>1</sup>陈姿瀨.疫情难掩人性光辉！本地民众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抗炎[EB/OL].<https://www.redants.sg/good-reads/story20200205-3627>, 2020年2月6日。



图 2：榜鹅居民放置在电梯内的消毒液<sup>1</sup>

那些高价卖口罩的“商人”试图趁机发灾难财，引来众多冗民讨伐，可以说是消极互惠的最佳例子。另一方面，热心居民免费派发口罩和消毒液，让一些有需要却买不到防护用品的居民也能够使用，这种不分你我，不求回报的举动是值得人们赞赏的泛化互惠。

### 3.2 艺术团体的免费线上演出

在全球持续防疫的情况下，各地民众大多只能待在家里。为了防止发生群聚感染，许多原定的演出无限期延后，各领域的制作公司和艺术团体遭受空前的打击，但是人们也开始探索另类的表演舞台。本地剧团“九年剧场”原本在三月有一出戏准备上演，限制措施宣布之后，剧场也取消演出。“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谢燊杰之后决定把过去几年的舞台剧录影挂到网上（见图 3），<sup>1</sup>目的是希望在阻断措施期间，继续和观众保持联系。国内外歌手为了保持曝光率，也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了更多的直播和上载短片，增加和粉丝互动的机会。

---

<sup>1</sup>联合早报.榜鹅热心居民电梯内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EB/OL].<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0203-1025737>, 2020 年 2月3日。



图 3：九年剧场在社交平台（脸书）上提供舞台剧录影的截图

观众在网上观赏这些表演和视频基本上是免费的，只有少数人会在看完演出后捐款给表演团体。因此，观众给予这类线上表演的关注可以算是消极互惠，但是如果考虑到疫情结束后，欣赏他们线上表演的观众会买票去现场支持他们，那么这项举措也可以归入平衡互惠模式之下。况且，在防疫期间失去了表演的舞台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也需要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平台。

### 3.3 政府的补贴

至今，新加坡政府已宣布了四个抗疫预算案，包括团结预算案（Unity Budget）、坚韧团结配套（Resilience Budget）、同舟共济配套（Solidarity Budget）以及最新的 坚毅向前预算案（Fortitude Budget），总值 929 亿新元（大约 4700 亿人民币）。从全员发放薪金补贴、外劳税回扣、到对企业现金流的支持以及对受损严重的行业的特殊救助等等（见图 4），政府大规模、多主体、全方位的财政补助和经济救助计划旨在协助国人保住饭碗、提升技能和创造新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图 4：新加坡 2020 财政预算案摘要<sup>1</sup>

从短期来看，我国国民是单方面的受惠于政府给予的补贴，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帮助企业保住产量和产能，不大幅减退，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地金融市场，不让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以便将来全球经济复苏时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不是一次不求回报的付出，也就是说，此项措施不属于泛化互惠模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根据宪法，新加坡下一届大选必须在明年 4 月之前举行，执政党能否再次获取高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选民对于政府应对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的表现的满意程度。因此，政府给人民发放补贴的这一项措施可以被视为赢取下一届大选选票的一个政治手段。也就是说，此项措施看似属于泛化互惠模式，实则属于平衡互惠的模式。

当然，选民最终的选择还包含很多其他考量因素，例如反对党候选人的质量等等。但是新加坡历届大选中，但凡危机时刻，执政党都能取到高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变当前，人心思静。例如，纵观新加坡 2001 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9·11”

<sup>1</sup>联合早报. 齐心共进预算案 抗疫兼为长远计[EB/OL].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singapore/budget2020>, 2020 年 2 月 19 日。

事件，全球局势恶化，经济前景黯淡，时任总理吴作栋希望选民给予他强力的委托，好让他更有信心处理一连串的棘手问题<sup>1</sup>。横观韩国执政党在今年国会选举以狂风扫落叶之姿大胜，其主要原因无非是政府在疫情暴发后，快速抑制疫情扩散，凭着出色的防疫表现而再度虏获民心<sup>2</sup>。可见，选举时间点对选民投票取向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么本届大选又逢危机，李总理频频释放即将选举的强烈信号<sup>3</sup>的目的是可想而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发放补贴的这一政策或许是为了迎合选民的奋力一搏。

### 3.4 外籍劳工——被忽视的群体？

曾在与新冠交手的“热身赛”中表现不错，并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表扬为“抗击疫情典范”的新加坡，4月以来确诊的新冠病例却不断上升，4月20日成为了东南亚病例最高的国家，而新加坡外籍劳工占了新加坡总确诊人数的一大半（见图5、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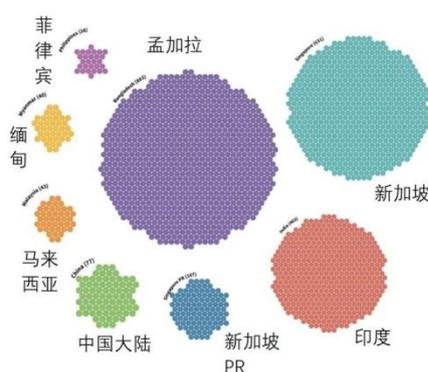


图5：新加坡新冠病例国籍分布图<sup>4</sup>

<sup>1</sup>新加坡眼.新加坡大选或在“解封”第二阶段举行[EB/OL].<https://mp.weixin.qq.com/s/7uoL-WZSYFgwLoEEVDqF6Qw>, 2020年5月24日。

<sup>2</sup>李国豪.“疫起去投票” 韩国选举能给本地大选带来什么启示？[EB/OL].<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00416-3912>, 2020年4月16日。

<sup>3</sup>联合早报.李总理：疫情左右大选日期 最快下个月大选[EB/OL].<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200314-1037086>, 2020年3月14日。

<sup>4</sup>新加坡眼.客工确诊病例一周激增数倍，新加坡紧急制定新规！[EB/OL].<https://www.yan.sg/kegongquezhen0414/>, 2020年4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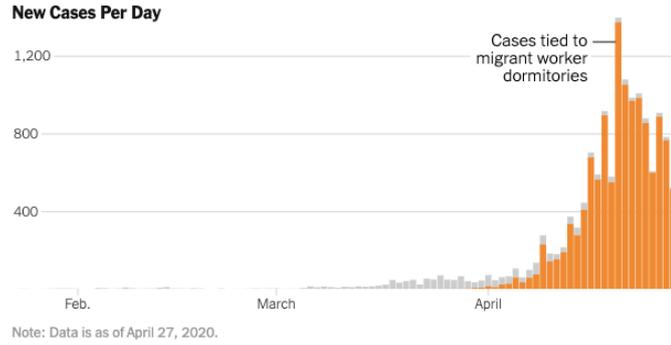


图 6：新加坡新冠病例的外籍劳工比例<sup>1</sup>

为此《纽约时报》长篇评论新加坡近期确诊数增多和其应对措施，暴露出在这个 40% 民众出生在国外的城市国家，富裕外籍人士和贫穷外国劳工有着截然不同的处境<sup>2</sup>。文章里指出，虽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国家”的美誉，街上从来看不见垃圾，培养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 100 多万低薪工人，他们盖起了新加坡的摩天大厦，把城市打扫干净，维持着繁忙港口的运行。但这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外国劳工，没被纳入社会保障网，尽管新加坡有许多确保最低工资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法规。事实证明，这个外劳群体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个主要盲点。

文章也指出，虽然一开始新加坡防疫措施做得到位，但是因为过去几天新加坡感染者翻倍，其中最大的感染群来自客工宿舍。为此《纽约时报》表示：“大多数新增病例都是在外来务工人员拥挤的宿舍里，这些人未受到新加坡许多富裕居民的注意，而事实证明，政府也忽视了他们。”笔者也认为，人口高度集中、居住条件恶劣的客工宿舍是病毒的天然“温床”。据悉，这些客工一般住双层床，有时候一间房里甚至可以居住 20 人。宿舍每层楼居住着数百人，却只有一个共用的卫生间和淋浴间<sup>3</sup>（见图 7）。

<sup>1</sup>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Weiyi Cai and K.K. Rebecca Lai. Packed With Migrant Workers, Dormitories Fuel Coronavirus in Singapore[EB/OL].<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4/28/world/asia/coronavirus-singapore-migrants.html>, April 28, 2020.

<sup>2</sup>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Hannah Beech. Singapore Seemed to Have Coronavirus Under Control, Until Cases Doubled[EB/OL].<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0/world/asia/coronavirus-singapore.html>, April 20, 2020.

<sup>3</sup> 上观新闻. 裘雯涵. 曾是全球“模范生”，但如今病例激增，新加坡发生了什么？[EB/OL].<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239435>, 2020 年 4 月 20 日。



图七：新加坡外籍劳工的宿舍

因此，新国政府和人民确实需要对此问题进行检讨与反思。没有了外劳们的默默辛勤付出，新加坡的基本运转根本无法维持，更别谈什么快速发展的一线城市了。这些外籍劳工虽然有自己的劳动获得薪酬方面的回报，但是这方面的回报远远不及他们为建设新加坡所付出的努力。因此，笔者认为，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予外籍劳工的待遇应该归类于消极互惠模式。

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改善客工宿舍的环境，为防止病毒的蔓延，当局前正在对客工群体进行大范围的病毒检测，将未检测的客工安置在空置组屋、樟宜展览中心（见图 8）、位于裕廊和勿洛的陆军军营、内政部下属的内政团队学院、浮动宿舍、尚未启用的北岸小学校舍等临时宿舍。当局除了在 8 个被列为隔离区的宿舍设置医疗站措施外，全岛 43 个客工宿舍都将有医疗人员进驻<sup>1</sup>（见图 9）。

---

<sup>1</sup>新加坡眼.《纽约时报》评新加坡两重天：富裕外籍人士VS 贫穷外国劳工[EB/OL].<https://www.yan.sg/niuyueshibaopingxinjiapoliangzhongtianfuyuwaijirenshivspinqiongwaiquoiaogong/> 2020 年 4 月 25 日.



图 8：樟宜展览中心被改造为客工临时宿舍<sup>1</sup>



图 9：当局在客工临时宿舍设立的医疗站<sup>2</sup>

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声称，待疫情稳定后，政府将全面检讨客工待遇与住宿条件，以及国家整体的流行病监测，负责任地面对此次防疫的任何缺失<sup>3</sup>。李显龙总理在发表冠病疫情声明的时候也肯定了劳工为新加坡的贡献，并承诺新冠疫情期间保护劳工们的健康和安（见图 10）。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客工们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阻断措施结束后有足够的人手复工复产，因为我国许多基础建设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劳工，比如组屋、地铁、公路桥梁、新机场的建造等等都需要大量劳工。因此，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期间给予外劳的帮助也潜藏着平衡互惠的<sup>四</sup>的。

<sup>1</sup>同上。

<sup>2</sup>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的脸书贴文。

<sup>3</sup>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待疫情稳定后 全面检讨客工福利[EB/OL].<http://www.cea.org.sg/kegong/>,2020 年 4月27日.



图 10: 李显龙总理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承诺疫情期间保护劳工们的健康和安全<sup>1</sup>

除了政府人员的肯定以外, 新加坡网民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向外籍劳工表达慰问和感谢 (见图 11), 如#SGforFWs (Singapore for Foreign Workers) 以及#Welcome-InMyBackyard (相对于 Not in my Backyard [NIMBY], 又称邻避效应, 因其简称音近似中文的“邻避”)。这可以说是一份迟来的关心, 但是迟到总比好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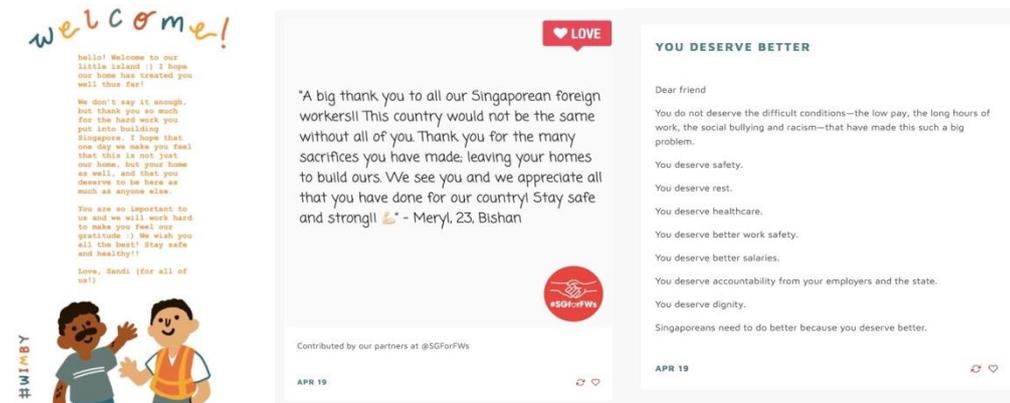


图 11: 新加坡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向外籍劳工表达慰问和感谢的截图

#### 四、面对疫情的反思

从国家层面来说, 新冠危机激发了新加坡社会的反思。新加坡一向社会安定祥和、环境优美整洁、人民安居乐业。不过, 当冠病疫情来袭时, 大众明白了这一切都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因为有了前辈们的苦心积蓄, 新加坡在面对此次疫情时才能“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sup>1</sup>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的脸书贴文。

正因为有了外劳们的默默辛勤付出，新加坡的基本运转和快速发展才有所保障。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社会展现出更多的是同舟共济和守望相助。当然，部分企业和民众未来可能也需要反思，该如何增强自我面对危机的能力，而非事事都依赖政府。

从个人层面来说，新冠疫情也给笔者带来很大的启发。人们的生活或许也很难回到疫情之前的老日子了，“很多人没有想过有一天戴口罩上街是日常，坐在外头用餐是无常；看着荧幕工作上课聊天是日常，和朋友拥抱是无常。”<sup>1</sup>那些过去以为的日常都被冠病夺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什么都不是。人们唯一能做的是调整好心态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日常”，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 五、结论

本文主要用了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新加坡疫情期间所发生的社会现象以及政府所制定的一些防控措施。总体来说，在三种互惠模式当中，平衡互惠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惯例”最为密切相关，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默认法则。艺术团体的免费线上演出、政府的补贴，甚至是对外籍劳工感染的应对政策都有其平衡互惠的部分。笔者身为一个局内人，角度可能略微偏颇，但是以上论述都是笔者基于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防控措施的了解所得出的结论。

## 参考文献

阎云翔.2000. *礼物的流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 马塞尔·莫斯. 2002. *礼物*. 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Susana Narotaky.1977.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Pluto Press.

维兰等.2014. *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原书第13版）*.陈相超、冯然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姿瀛.疫情难掩人性光辉！本地民众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抗炎

[EB/OL].<https://www.redants.sg/good-reads/story20200205-3627>,2020年2月6日.

联合早报 . 榜鹅热心居民电梯内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

---

<sup>1</sup>张承尧.当无常回到平常[EB/OL].联合早报 U游频率，2020年5月18日。

[EB/OL].<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0203-1025737>,2020年2月3日.

联合早报.齐心共进预算案 抗疫兼为长远计

[EB/OL].<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singapore/budget2020>,2020年2月19日.

李国豪.“疫起去投票” 韩国选举能给本地大选带来什么启示?

[EB/OL].<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00416-3912>,2020年4月16日.

新加坡眼.新加坡大选或在“解封”第二阶段举行

[EB/OL].<https://mp.weixin.qq.com/s/7uoLWZSYFg-wLoEEVDqF6Qw>,2020年5月24日.

联合早报.李总理: 疫情左右大选日期最快下个月大选

[EB/OL].<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200314-1037086>,2020年3月14日.

新加坡眼.客工确诊病例一周激增数倍, 新加坡紧急制定新规! [EB/OL].<https://www.yan.sg/kegongquezhen0414/>,2020年4月14日.

Megan K. Stack. A Sudden Coronavirus Surge Brought Out Singapore's Dark Sid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EB/OL].<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0/magazine/singapore-coronaviru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0/magazine/singapore-coronavirus.html>.

Weiyi Cai and K.K. Rebecca Lai. Packed With Migrant Workers, Dormitories Fuel Coronavirus in Singapor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EB/OL].<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4/28/world/asia/coronavirus-singapore-migrants.html>,April 28, 2020.

Hannah Beech. Singapore Seemed to Have Coronavirus Under Control, Until Cases Doubled.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EB/OL].<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0/world/asia/coronavirus-singapore.html>,April20,2020.

上观新闻, 裘雯涵. 曾是全球“模范生”, 但如今病例激增, 新加坡发生了什么?

[EB/OL].<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239435>,2020年4月20日.

新加坡眼.《纽约时报》评新加坡两重天: 富裕外籍人士 VS 贫穷外国劳工

[EB/OL].<https://www.yan.sg/niuyueshibaopingxinjiapoliangzhongtianfuyuwaijirenshivpinqiongwaiguolaogong/>,2020年4月25日.

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 待疫情稳定后 全面检讨客工福利

[EB/OL].[http:// www.cea.org.sg/kegong/](http://www.cea.org.sg/kegong/),2020 年 4 月 27 日.

张承尧.当无常回到平常[EB/OL].联合早报 U 游频率,2020 年 5 月 18 日.

# 疫情笔记

唐沈琦<sup>1</sup>

从 2020 年的 1 月上中旬至今，疫情依然在持续。不知不觉间，人们的生活方式被疫情重构，社会结构进入到“例外”状态，世界的各部分也仿佛在“分裂”中继续关联。

还记得 1 月 11 日，我带着亲戚家的孩子去松江欢乐谷玩。那天，下午的阳光晒得人懒洋洋的，游乐场上游人如织，或游玩，或吃食，人们都趁着春节前的最后两个星期尽一尽兴。玩了一整天，回家的地铁上，拿起手机，扫过若干条不起眼的新闻，仿佛说着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不明疾病，但当时的各大网络社区都没有太多的相关讨论。举目一望，地铁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说有笑。一片常态中，谁又会想到两星期后发生的一切呢？

春节前的一两天，越来越多的肺炎病例在武汉浮现，钟南山医生突然公开发表对这一不明肺炎的看法。就在一两天之内，上海的大街小巷、公交地铁上，人们纷纷开始戴口罩，便利店的口罩也被一抢而空。在我居住的小区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戴口罩。在一股公共性的恐慌之下，我也开始警觉，但发现此时已经买不到符合 N95 标准的口罩。无奈之下，我只能在小小区附近超市旁的个体流动商贩上，买了几只棉布口罩应急。当我戴上这些事实上并不符合防疫“技术标准”的口罩，我才体认到了我所身处的社会所掀起的公共性的紧张和恐惧。

在疫情期间，口罩被人们赋予了诸多社会含义，这些社会含义在城市空间内被不断符号化，最终成为一种社会标记。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一个月，口罩是稀缺的，市场上可以被获得的口罩都已经被一抢而空。作为一种消耗品，口罩的使用次数和时限是有限的，加之人们无法估计此次疫病的持续时长，因而，人们往往会成批购买口罩，从而应对未知的风险与危机。突然之间，口罩成为一种紧急的刚需。与此同时，武汉的疫情援助也开始发起，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了口罩等医疗物资的走向，大部分的口罩都直接流向了疫情最为严重的疫区。而在疫情较轻的“非疫区”，人们需要通过内部的社会网络获得相关的卫生防护资源。在最缺口罩的那段时间内，我的小姨通过她在医院的医生朋友，给我送来了第一包口罩，一共 50 多只，我非常感激。随后，我的父母以及丈夫所在的人事组织也开始分发口罩，数量并不多，人均 5-10 只，但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补给。过了段时间，我所在的社区也开始向居民分发口罩，居民需要持户口本前往指定的申领点领取。因而，社区的物资援助是建立在业主身份、组织身份等个体的制度性的身份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口罩最为稀缺的时段里，有无符合

---

<sup>1</sup>唐沈琦：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9 级人类学博士生。

防疫标准的口罩，成为一种社会标记，它标记了个体在社会体系的位置，它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分类结构。通过口罩，人们可以获知一个人被“安放”在了怎样的社会类别之中，并且不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社会类别的差异。在小区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类别的口罩，有白色的最为昂贵的 N95 口罩，也有蓝色或黄色的普通医用口罩，人们可以通过口罩大致判断出戴口罩者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当戴口罩成为一种集体的社会行动，并成为一种公共的社会景观，口罩便被赋予了社会性的含义，它可能包含了对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的判断，可能也包含了特定的道德判断，这些判断都和公共性的风险抵御机制息息相关。疫情期间，人们习惯戴上口罩出门，戴口罩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在日常实践中被例行化和常规化，这不仅仅是个体为了抵御疫病风险的日常实践，也是个体与公共性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达成一致的结果。戴口罩出门，成为公共性的道德事项，并在群体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下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成为人们的共识，形成社会秩序。倘若不戴口罩便出门，则意味着违背共识和破坏社会秩序，将会受到道德谴责，背负社会压力。戴口罩，成为施加于个体的社会性的道义与责任。

在疫情之下，城市空间由于其高度的束集性，成为风险的聚集地带。城市社区不得不形成明确的边界，从而抵御风险。社区的边界不仅体现在社区制度层面，并且弥散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社区边界往往由具体的社区制度实践而成。在我所居住的浦东金桥某社区，社区制度不断制造人们日常生活的边界，这一过程围绕着防疫措施而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识别和分类是最初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建立在社区门禁制度之上的疫情检测制度便是较为典型的一个环节。在小区内部，业主和租户的信息都已被居委会登记造册，每一位业主和租户都有一张电子门禁卡。同时，业主和租户的车辆信息也需要被记录，并且被录入小区的门禁系统，只有和信息匹配，车辆才能出入社区。因而，在日常状态下，小区便已设立身份识别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基础在于地方基层组织的行政权力，人们的身份信息被数据化，被统一收集并分类。在疫情期间，病毒使社区产生建立严密边界的需要，而原有的社区门禁制度则促成了边界的确立，这一边界的确立原则，则是社区内部的身份划分。于是，每当居民步行或开车出入社区，社区的门禁系统便一次又一次对居民的身份加以识别、分类和确认。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的外部边界和内部秩序得以确立。然而，社区边界尽管在结构上清晰可辨，但个体的能动性往往将对边界产生冲击和挑战。

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内部的边界也正在形成。在城市社区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间被束集在一起，人们不得不在私人空间之外共享一些公共空间，以及部分无法被定义

为“私人”或“公共”的、处于模糊地带的空间。例如，电梯以及楼道口的空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然而，在一户一梯的居住格局中，电梯以及楼梯口则兼有了私人和公共的属性。空间定义的模糊性则带来了边界冲突的可能。疫情期间，我和住在我对面的邻居差一点产生正面的冲突，原因在于，我们在共享同一条走廊，走廊以电表为界，被一分为二，而邻居却经常将他们的生活垃圾倒在距离我家门口较近的地方。由于疫情的爆发，卫生问题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他人的生活垃圾则成为一种污物，携带模糊的风险。我看着那一袋袋堆放在我家门口的邻居的生活垃圾，觉得这些垃圾充满了危险。由于我们刚搬来不久，我也从未和我的邻居搭过话，我便贴了张字条在中间的电表上，留言道：“请以电表为界，将生活垃圾放置在自己家门口。”第二天，邻居果然有所“收敛”，不再将垃圾放置在靠近我家门口的地方。不禁唏嘘，在模糊的区域划分空间属性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它既需要外部的协商和共识，也需要内部的规范和自律。然而，在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被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所区隔，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共交流，难以形成共识。

除了可见的、模糊的空间交叠可能会带来边界的冲突，一些隐性的生活联系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中浮现为一种矛盾。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许多医学界人士通过大众媒体发表观点，认为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的方式传播，而气溶胶是一种弥散在空气中的固态或液态的载体，容易以隐蔽的、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将病毒传播到处于相近的空间的人群，其中，居民楼的下水管道，则是重要的传播途径。假设楼上的居民患病，其病毒可能会通过下水管、马桶等生活用具，传播给楼下的居民。这一观点甫一公布，便引起公众的剧烈反响，一时间人人自危。在各大网络社区，人们开始回忆起 SARS 期间，香港淘大花园的一位感染病毒的居民，通过气溶胶的方式，将病毒传播给了同一居住楼的另外 42 名居民。这一案例如今似乎有重演的趋势。2 月初，内蒙古也出现一例“奇怪的”病例，病患并未出过家门，也并未接触过其他感染者，却依旧被感染，而在他的楼下，则有一例确诊病例。一时之间，人们无法判断究竟是这位患者以一种隐蔽或不自知的方式接触过楼下的病患，还是气溶胶将病毒传播开来，而这两种可能性，都将处于束集状态的城市社区空间内的个体推向位置的、似乎触手可及的风险之中，社会信任岌岌可危。在这段实践内，人们对家中和办公场所的下水道和马桶都怀有一定的戒备。人们准备了消毒液，提防着从下水道和马桶中可能会逸出的病毒。在这一过程中，关于病毒的社会恐慌通过气溶胶这一知识而被具象化，人们似乎在用处理气溶胶的方式来防控病毒，同时，人们也在试图划分日常生活中的内部边界，抵御来自邻近空间内的陌生“他者”的模糊与危险。

# 新冠疫情如何重塑乡土的亲属关系与互惠关系：密而不亲

石佳鹭

我常常感到是分裂的，我一面属于城市，一面属于乡村。当我吃饭和朋友 AA 时，爸妈“多请同学吃吃饭，这样同学间才有人情味”的声音就会在我脑子里响起；而当我回到老家，来自上海的烙印让我在七大姑八大婆面前不知所措，几次把“阿姨”叫成“舅妈”后我便学会了见人先笑、再送点儿零食，等和我妈串通好了再叫。而每年春节，我都一脚踏越“几十年”的距离。人类学家莫斯对于人类的交换关系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演进图式：人类最初的交换是整体性的呈赠（total prestations），在这一交换中，群体之间转让的物品只是某个更大范围的非经济转让的一部分，礼物交换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法律的方方面面；第二阶段是那些代表群体的有德之人间礼物交换。最终，则走向了现代社会中独立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新年于我而言，便是从第三阶段重返第一阶段。（莫斯，2016）

这种普遍而广泛的互惠关系弥漫在农村，而究其原因则是源自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质，以信任、亲近、人情味儿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特征。然而，我一直在思考：亲戚真的亲吗？熟人真的熟吗？这些信任是无条件的吗？农村的人际关系与亲属关系是众多人类学家的心头之好，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2001）用“祖荫下”一词来形象地描述祖先与家族对于个人的意义：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是生长在祖荫下的，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农村个人往往服从群体的集体利益，个人为了“家”而存在，作者甚至根据父辈的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来归纳了五类中国人的个性类型。与之相反，费孝通先生（1998）却在《乡土中国》中却提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质上是己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构成的，而这些以家族为代表的私人网络具有伸缩功能。“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把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当这中间的石头势力越大，这涟漪便越大。“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的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没有所谓的家族主义，有的是自我主义，小我通过大我来和别人、社会建立正当的和谐的关系。因此，所谓的“亲戚”的“亲”和熟人的“熟”也是个弹性概念。所谓弹性，我想就其根本是具有社会情境性。那么当新冠来袭，乡土社会的家族关系究竟是涟漪还是树荫，互惠关系又以什么样的形式重新出现？

## 当口罩成为了新冠时期的“礼物”

当村中几乎一半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新年就成了村里人唯一的团聚时刻。大年初二后，家家户户开始拜年，且拜年手上不提点东西总是不好意思的。往年最常见的礼物便是家家户户自己做的点心，还有烟酒。有意思的是，最受欢迎的礼物往往是野生黄鱼、自家养的鸡鸭——凡是带点“野生”的，都被看作是“有面儿”的礼物。当我问家里人，“这有什么好吃的？”爸妈总说，“你不懂，这上海吃不到的，新鲜有营养。”当然，他们所指的“野生”和官方所禁的“野生动物”（蝙蝠、五步蛇等）并非一码事。但其属性是否一样？吃和送的人的动机是否有相似之处？当我们在骂“野味食客”，将其作为他者，是否忽略了其个体化的消费行为实则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野味具有“礼物”属性，而与寻常礼物相比，价值在于它不可大规模生产，因而具有了孤品的特性；而对珍稀的需求则促成了“野生动物”被商品化、礼品化为了“野味”。

而有趣的是，口罩因为其珍稀性和急需性成为了新冠时期的“礼物”与年货。表姐在香港上学，在香港疫情初起时便抢购了20盒外科口罩，舅妈便时不时地开玩笑说，“你就带着这些口罩，就能拿到好多红包啦！”；而国外进口的口罩，更是成了贵中之贵，韩国口罩成了只能送给最亲的人的“礼物”。当我看到大舅舅拿着一盒韩国的KN94口罩，向外婆夸赞这口罩功效有多好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大舅妈前几年刚赚大钱时背着coach的包包回来向我们炫耀时的模样。当然，大舅舅也给了我两个。是的，只有两个。而我妈妈却念叨，“小宁啊，看大舅舅跟你多亲啊，这么好的口罩也送给你。”口罩作为礼物，在于其象征含义，而不在于往常礼物追求的价格、数量。

而这以礼物为中介的互惠关系，究竟只是面子之举还是稳固而深厚的情感联系呢？当新冠来袭，乡土社会的家族关系究竟是涟漪还是树荫？我们再来看以下两个情境：一场新冠时期夭折的婚礼；一次乌龙病例的发生。

### 一场新冠时期夭折的婚礼

我们一大家族（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小阿姨一家、我们一家）生活在同一所大房子中。今年，房子的窗上贴满了红色的窗花，表哥要结婚了。一个月前，舅妈就开始准备好了一个个红包，再去上海的市场精心挑选一个个酒席的食材，且请好了烧酒席的师傅。同时她还让外婆选好了良辰拜菩萨，准备在村里办一场简单的婚礼。而“不得在公共场所聚众”的命令一下，全家的努力眼看着就将毁于一旦了。“命令都是人下的，我就不信这群村里的老东西

不让我们办了，我们也没多少人，就自家人。”舅舅和往常一样，总是搬出自己给村政府捐的那点修路钱来，仿佛自己在村里面有权有势。过了几天，村上便派人来我们家里。“阿光啊，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么点小事就通融通融。我们不办三天了，就办一天！我们象山现在还一例都没有，很安全的。”舅舅请他在沙发上坐下，面前放着瓜子和水果。“我们也知道你们准备了很久，但着疫情实在是没办法啊。阿哥啊，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就不办了吧。一家人不能看我掉饭碗啊你说是吧。”阿光也摆出了“家”来讲道理。“家”在这样的语境下仿佛被扩大了，虽说是家人，可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哦，他的姓跟我们一样。

离原定的婚礼日期越来越近，而双方互相软磨硬泡，僵持不下。最后双方决定各退一步，我们只邀请直系亲属，各种仪式也取消；而政府那边则答应让我们把场所移到自己家中，红毯也可以直接铺在家里。本以为这是皆大欢喜，可就在两天后，县里直接派了人到我家。县政府怎么知道的呢？村政府报告的？县里说，有人在县政府官网上匿名举报我们的婚礼移到家里举办，而无论是家里还是公共场所都不得举办。说是匿名，可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知晓这场婚礼变动情况的，不过是我们家族一家人和直系亲属罢了。

### 一次乌龙病例的发生

“小东和他前两天一起吃过饭？”“对，就吃过饭，就一个多小时。”“他的好朋友的是武汉大学的？”“对，我听耀威说的。”饭桌上的空气里不再是往常的饭香，而是充斥着难以名状的紧张，各人都低着头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小东是我的表哥，表姐从同学那儿听说象山出现了第一例病例，是一名在武汉上学的大学生，姓吴；而小东刚回象山时，和他表哥一起吃过饭，而他表哥又曾跟一个武汉大学的吴同学一起吃过饭。好巧不巧，就在刚知道消息的那天，小东似乎有些感冒。那天晚上，我发现小舅妈偷偷摸摸地来我们房间的洗手间上了厕所，而没有用二楼的公共卫生间；小舅妈悄声跟我说，“二楼那个小东用过。哎小东怎么不隔离呀，那我们怎么办呀。我们轩轩抵抗力很差的，这怎么办呀。”她的焦虑与恐慌全写在了紧皱的眉头里。而过了几天，当确认了那只是虚惊一场时，她却又在饭桌上说，“哎我们小东福气好，就知道肯定不是这个病的！”熟人关系既是谣言的散播网络，又由于其近距离性承载着比普通关系更多的恐慌与焦虑，而一旦出现疑似病例，便是人人求自保，涟漪般的家族关系立马就缩小到了核心家庭。

### 新冠时期家庭就是避风港吗？

当亲属信任因疫情带来的人人自危而被削弱，是否就代表着我们将回归核心家庭这个温柔乡呢？清华大学的严飞在3月31日《疫情下的数字化生存与社会治理》一文中提出新家庭主义的内核在深化。新家庭主义是由阎云翔提出的，强调核心家庭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与代际的依赖关系重新增强。我想，我们与核心家庭的距离确实更近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港湾与依凭。但“近”是个中性词，家庭中原有的矛盾与焦虑也因而放大。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在中国，自从2月初政府封锁疫情中心湖北省的城市以来，总部设在北京、致力于打击针对妇女暴力的非政府组织“为平”接到的求助热线电话开始激增。在西班牙，家庭暴力的紧急求助号码在封锁前两周接到的电话，比一个月前同期多了18%。“我们接到一些非常痛苦的电话，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人们一天24小时被关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会发生怎样的心理和身体虐待。”<sup>1</sup>

一场新冠疫情仿佛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各国公共卫生的体制的黑暗面，也让一切指责、污名、偏见无处可藏，同时也照亮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关系。疫情并没有中止家族中的礼物交换，而互惠关系以口罩作为新的礼物继续维系。但这种互惠关系更像是莫斯所说的均衡互惠关系而非总体性互惠关系，且以面子为其维系中介。而没有情感基础的面子在危机中则是吹弹可破的。在这场危机中，住在同一个大房子中的家族因隔离而更加密，却并不亲；涟漪般的家族关系也随着这场公共危机的到来而缩到了最小。

## 参考文献

- 马塞尔·莫斯. 2016.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商务印书馆.
- 许烺光. 2001.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 人格与社会流动*.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阎云翔. 2000. *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阎云翔. 2006.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 1949-1999*. 上海书店出版社.
- 严飞. 疫情下的数字化生存与社会治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663279299724379&wfr=spider&for=pc>.

---

<sup>1</sup>纽约时报中文网《疫情中的“亲密恐怖主义”：全球家暴事件激增》，<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00408/coronavirus-domestic-violence/>。

# 新冠疫情观察笔记

## ——谈到“抄作业”你会想到什么

陈舒萌

一场疫情冲乱了 2020 年的所有计划与安排。突然蔓延的病毒与每天疯狂上窜的新增感染人数，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等情绪冲击，不仅是对社会承受能力的重大考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与应对能力的挑战。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口罩和酒精等相对日常的防护用品被赋予了全新的符号象征意义，双黄连在媒体报道的推动下一跃登上防疫抗疫高台，在其被赋予了“神药”称号之后成为众人疯抢的“必备药品”，但也随着澄清报道而跌落“神坛”，回到了普通药品的位置。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而言，对疫情期间应对措施的安排以及对资源的调配等也成为了对中枢的一道严肃而真实的考题，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管理机制在答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 一、更新的概念：“抄作业”包含对政府“积极有效作为”期盼的新象征意义

“抄作业”是国内疫情蔓延开端时期蹿上热搜的新鲜词汇。讲到抄作业，你会想到什么？是小学时期马上要上交作业，却因为昨天晚上贪玩还没有动笔，苦苦哀求同桌把做好的作业借你看一眼，并迅速拿起笔在作业纸上飞速填充并踩点提交作业，还是初中时期把你困住的数学作业的倒数第一题，绞尽脑汁但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求助解出题目的“天才同学”并对答案进行复制粘贴？“抄作业”原为略微带有贬义的词汇，原意为指出于种种原因，学生为按时交作业而在没有理解或未经思考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与感官获得作业信息，并直接记录在自己的作业上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负面影响的应试教育产物。但在疫情期间，这个词似乎被“改头换面”，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作业”被认为是一种在疫情考题下政府对于防控所做出的“答案”，即应对措施等，“抄作业”则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之下被认定为是一种对被大众认定为合理、有效的严格防控措施的借鉴学习，也是一种公众对于学习有益做法与措施的期待与推动，而并没有被归入抄袭等具有部分负面含义的范畴。

在应对疫情方面，河南省成为了一月底时期拥有最为严格、收效最明显、行动力最强的硬核防疫措施的代表。在快速响应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措施进行“严防死守”：及时停止班车、禁止售卖活禽、进行全面排查等。在河南农村的防疫措施尤其受到社会关注：在村口设置对挂武汉牌车辆的劝返点，并在村中贴有关于“鄂”字车牌的告知书，村民相互劝阻武汉

返乡人员不要出门；村中拉有各类简明通俗的标语，从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前的“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来往”，到村口的“带病回乡，不肖子孙”横幅……大力度的防控措施在当下基于社会对于病毒的些许恐慌，以及与部分省份力度较轻的防控规定措施的对比而受到广泛赞扬，因而有网友提出希望其他省份也“抄抄”河南的“作业”，进行借鉴与学习，以达到一种民众对于政府在疫情中更加有所作为的期望情境，但对于该“作业”的适用程度以及能否作为标准却未经仔细考量。由此，“抄作业”从学校范围内明令禁止的不良行为，转变为在疫情期间公众在对不同政府防控工作的对比之下，对严格防控要求的期望以及对政府完成一种期望之中“积极有效作为”的呼吁。但这个意义下的“抄作业”却并非是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理性选择。

## 二、民族中心主义：当“抄作业”被应用到世界范围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期间，各国以不同的方式应对 COVID-19 的侵袭。在各类新闻报道之中，对国外应对疫情的方式的报道几乎都有较高的讨论热度，这里也稍稍列举一二。暂且不考虑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全面性与代表性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立场与利益问题，仅以部分报道为代表进行初步阐述分析。同属东亚的日韩吸引了大量目光，日本出于对奥运举办的考虑等因素，在疫情刚开始爆发期间并没有进行大量核酸检测，甚至也出现了部分医院劝返发热病人、不进行检测的情况。虽然之后企业也推行了远程办公的模式，但仍出现了在日本政府 3 月初宣布开始停课时，部分地方政府以本地没有感染者为由，并没有遵照执行的情况。而对韩国而言，虽然企业也推行远程办公的政策，政府的跟踪、测试、治疗三步法则也卓有成效，但新天地教会的礼拜促成了“超级传播者”的威胁，短期内韩国确诊病例迅速增加。欧美国家的防疫措施也很快成为关注热点。英国从一开始较为积极的相应措施，逐渐放缓防疫措施推进，检测策略也转为消极且不再为轻症提供检测，并试图推行“群体免疫”；瑞典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进行统计，也不再对轻症患者与疑似患者进行检测；西班牙与意大利相继传出由于资源紧缺不再为老人提供呼吸机、将治疗机会让给年轻人的收治方式，医疗资源与防护物资告急；美国则是急于重启经济等。而相比国内较为严格且全面的防疫措施，以及逐渐实现的应收尽收、集中资源支援“重灾区”的情况，国外的防疫状况乍一看确实与国内有很大差别。

对新闻报道内容与部分网友的反应进行反观与复盘，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一些趋势：当媒体对国外较为松散、或是迫于医疗资源紧缺而较为无力的防疫措施进行报道时，不难看到

标题中偶有类似字眼：“痛心”、“发人深省”；而当报道内容主要为其他国家政府下令进行“封城”及其他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措施时，则是使用较为中性或支持的字眼，这点在微博媒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希望其他国家“抄”中国的“作业”的类似声音也经常出现，特别是当特定国家的防疫措施较为松散、政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发布有力的限制措施与应对措施，或从更加主观的层面上说，其他国家的防控措施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一种“正确、适当”的程度时。

但我并不认为希望其他国家、甚至是希望国内其他省份“抄作业”的声音是完全妥当的。我国防疫措施下的成果证明了其有效性，固然是值得被肯定以及赞扬的，但再次进行审视也未免能够成为完美无缺的范本，其中仍有较多可以改进的部分。将其他国家的救助与应对措施与本国进行比较并且尝试分出高下，且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标准对其他国家提出进行相同行动的要求而忽略实际情况，本身似乎就带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即在产生希望其他国家“抄作业”的想法之前，一种对我国防疫措施的高度认同以及将其作为一种应当被广泛执行的、理所当然的标准的想法已经产生。在主观上将我国的防疫措施作为“正确答案”与“金标准”对他国进行衡量评判，将失去从更为客观与相对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的可能，既是盲目自信的表现，也忽略了通过不同路径解出谜题的可能性。

### 三、文化相对主义：这份“作业”真的可以“抄”吗？

国内语境下的“抄作业”尚且不易实施，且这份作业也并不能够被认为是满分案例，那么对于世界范围而言，这份作业真的是可“抄”的吗？或许看待这个问题要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出发。“文化的本意为我们理解‘他者’提供了路径”（范可，2008：3），因而除物质基础以及管理能力的限制外，对于不同国家应对方式与救助的评价过程也应该将其特殊文化背景纳入考虑范围。在执行层面而言，要“抄”这样一份作业就是较为困难的：对于实行不同政治体制的其他国家而言，迅速进行资源统一调配所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可能并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就算联邦政府希望能够对资源进行统一分配利用，具有较大自主权的州政府是否愿意服从于联邦政府的指令仍是未知数；再从具体措施而言，“封城”是否是可以执行的呢？从美发布居家令后出现的游行示威中可见一斑。

当聚焦文化相对主义，看待问题的角度将从主观转向客观。文化相对主义由博厄斯提出，意在指明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形成过程，其形态并无高低之分，使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衡量是不恰当的，且对文化的衡量并没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绝对标准。将关

注点放在不同国家的救助模式上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进行展现。疫情肆虐初期，由于较为慌乱的临时应对措施以及突然发生的医疗资源超负荷与挤兑而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感染病人应收尽收，但在获得各方支持的情况下尽力救助每一位感染者；而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期间则是选择将紧缺的呼吸机资源供应给年轻人，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重症患者的救助上，采取轻症患者隔离自愈的措施以减缓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冲击。有夹杂着“人道主义”的声音出现并批评没有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尽力救治的做法，但重新考虑看待该问题的角度却会有不同的结论：医疗资源紧缺固然是对救助、治疗而言最为棘手的限制条件，能够提供的救助数量与质量受到现实条件限制；同样，这种救助思维的产生不仅是基于现实条件，同时也是出于对其文化基础的考量。与此类似，在美政府颁布“居家令”后，反而出现了部分示威游行，对“居家令”表示强烈反对：“We Americans born free”和“宁愿感染病毒也要出门”的标语和言论频频出现。当我们对其文化背景进行探究，或许能够对出现这些“怪状”的原因略窥一二。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生与死的认知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理性体现在儒家文化的生命观中，即具有现世意义的生命个体，生死都是必然，孔子将其归为“天命”；佛教禅宗与道家“齐生死、顺自然”的理论具有相似之处（芦雷，2010：11）。但同时也仍有“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詹福瑞，2003:69）的论述以及道家文化中重生恶死的倾向，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人们的共同心理，也是一种根本、自然的好恶选择。对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家文化中，其宗法伦理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爱亲”（张践，2000:76），子女应当孝敬老人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无怪人们对于减少对老人的救助投入的情况感到不解。将视角转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以更加直接的态度面对死亡，将人的肉体生命与其精神生命进行区分，承认肉体生命的短暂性，同时提出死亡是通往永恒生命的开端（毛丽娅，2008：70-71）。因而在基督教中，死亡并非是令人恐惧的、厌恶的，而是充满永生希望的。此外，自始至终对自由的强调也在示威游行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居家令”并不是一种对民众的保护措施，而是对其自由的禁锢。将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不难发现，虽是类似的复杂情况，但由于在文化价值上的巨大鸿沟，使用任何一方的标准对对方进行衡量与评判都是有失偏颇的，不同的文化倾向于使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寻找合适的答案。因而这份作业，或许并不能够以其原貌融入其他国家，反而极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对他国的救助与应对方式的完全复制困难重重，但在具体应对经验上却是可以相互借鉴

并进行“本土化”的，如具体救治方式的交流与学习以及对有益管控措施的应用等。从疫情期间各国的合作与互帮互助中能够看到道义互惠的身影；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独善其身难以实现，各国只有通过互相支持才能共克时艰。互联网在疫情期间承担了重要的信息传递职责，但在接收信息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多一层思考与过滤，避免掉入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差异的鸿沟中，应以更加客观中立的视角对信息进行分析，切莫让非理性的“抄作业”压制了理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范可.2008.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世界民族,000(002), 1-8.

毛丽娅.2008.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命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 70-75.

芦雷.2010.中西方生命观的历史回溯——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 16-19.

詹福瑞.2003.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儒、道生命观.中国文化研究(03),71-79.

张践.2000.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哲学史(03),74-79.

# “疫情中的城市”观察笔记

黄钰涵

## 一、疫情期间的家庭相处——父亲和母亲的矛盾

本科阶段我经历过一段和父母亲的矛盾期，源于脱离小镇到大城市的认知不适应，加上大学后的放飞和叛逆，就觉得父母小地方呆了一辈子什么也不懂。后来我由重庆来到了上海，走到更加现代化的一线城市，但本科期间的历练和成长，让我对城市和乡村（小城镇）的认知差异和生活状态差别有了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我只是依靠着父母和学校在大城市暂居一隅，生于长于小城镇，我更应尊重家乡和家乡人，而不是以大城市的视角进行俯视。

然而疫情期间，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居家隔离，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相处，在家这个狭窄的空间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家的三个人，各种原因导致了彼此间很微妙最后到比较激烈的冲突矛盾，其中尤其表现在父亲和母亲之间。

父亲：货车司机。年前刚卖掉车在家处于待业状态，常年居家乡小城镇。

母亲：家政育婴师。从2016年始先后在嘉兴、上海5年在外打工。

我：本科以来一直在外读书，本科在重庆、研究生在上海。

因为疫情，三人三地的常态局面消失，一家三口迎来久违的长时间相处。

自母亲外出打工以来，父亲一直独自留守小城镇，两人最长时间相处就是每年的过年几天假期，但都是在走亲访友中匆匆度过。虽然两人之前过年期间也有过摩擦，但都不严重，小打小闹笑笑就过去了。但是2019年，也是母亲来上海工作的第一年，上海与嘉兴相比还是更为“城市主义”，母亲也因此见识和视野宽广许多，在原本性格基础上养成了重效率、爱干净、不喜交际等习惯，在很多问题上和父亲有了较大的分歧。

父亲在母亲打工以前，是家里经济来源的顶梁柱，但近年来货运行情并不好，经历过两次换车后，年前终于卖掉了与父亲相伴5年的旧货车，父亲也因此陷入失业的局面。因为不再外出出差，再加上家里经济主要来源转移到母亲身上，这使得父亲变得敏感多思。父亲留守小城镇，一个人无事时养成爱与同学朋友常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在我和妈妈在家时也依然存在。

自懂事以来，在我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向来感情很好，前几年的小吵小闹我也并没有当回事。但就在2020年新年期间，这些因素集中于家这个小小空间里压缩爆发，我多次劝架，疲惫不堪、感慨万千。

母亲习惯了上海的生活，在家看不惯小城镇的生活方式，认为父亲在家不打扫卫生、不打理院子；抱怨家里洗碗没有热水、邻居态度恶劣、房屋结构不合理；批评父亲看重同学朋友比家人重要、过年不陪伴家人去找同学……各种牢骚唠叨，加上母亲本身的性格喜欢碎碎念，以及在上海打工的憋闷委屈，母亲认为自己过年回家应该好好休息、好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片刻时光。

父亲也有自己的想法。之前还在做货车司机时，父亲经常出差，家里没时间打理，自己一个人难免懈怠。长期一个人在家，父亲很珍惜与同学、朋友建立起的友谊和陪伴，导致即便是在家时他对朋友们也是即喊即应。另外，车卖了之后母亲一直抱怨，让父亲去找事做，甚至打听想让父亲也去上海打工，父亲觉得母亲是在嫌弃他不挣钱。过年事多，母亲过年在家想要休息的表现让父亲不快，他认为母亲不体谅自己，回家只想享乐。

我父母原本的性格加上近几年一个在小城镇一个在大城市的环境熏陶，以及疫情影响、家庭经济来源变动，原本就有的矛盾不断尖锐化，争吵不断。父亲母亲似乎无法从各自立场出发去体谅对方，或者说，就算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和立场，也坚持自己，不愿让步。我在劝架过程中，有以下一些思考：

(1) 父母亲都存有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家庭分工的传统思想。

(2) 母亲在大城市生活以后某些文化性格的嬗变，不自觉蔑视小城镇生活。

从不习惯到嫌弃，都基于对原本小城镇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家乡其实并不存有很强的认同感，在见识到大城市的美好后，急于将自我和原本不满的现状剥离开来，这也是我刚上大学时有过的心路历程。

(3) 父亲不喜吐露内心想法，但重视家庭地位。

几年比较孤独的留守生活让他从除了家人之外的朋友身上寻求陪伴和安慰，但又不愿被家人孤立。

(4) 长期相处以来，父母彼此都知晓对方脾性，因为心里知道对方不会轻易离自己而去，所以习惯性忽视顾及对方感受，不自觉伤害最亲近的人。

疫情之后的离婚潮，或许也是各个家庭基于这些类似的矛盾之下无法排解后的结果吧。在和我自己的朋友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她们也会有类似的家庭矛盾（见图 1），这次疫情将人际交往隔离压缩到每家每户关起门的房子里，仿佛是将点燃的爆竹扔进了密封的玻璃瓶里，你看着它燃烧、冒烟、膨胀、轰隆一声，结局或是闷雷或是玻璃瓶四散碎裂。不过，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次也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母亲终究要回到小城镇和父亲一起生活，这些

矛盾不可回避，提前的适应以及我在其中的劝架和参与，还是给了此次危机很大程度上解决的空间。



图 1：朋友家里的家庭矛盾

## 二、疫情期间辗转几地的体验（城际：湖北-上海-江苏）

### （一）在家的煎熬

我家乡是在湖北省荆门市，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并非属于严重地区，身处小城镇的人们反应也比较慢。后来在武汉、黄冈等地接连封城以后，紧张和恐慌感一下子扑面而来，人们后知后觉认识到春节期间从武汉四散回乡的人可能会造成可怕的感染蔓延。对我们家而言，煎熬主要是三点：

① 买不到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我们家意识到人们开始在抢购口罩时，1月21日前去排队购买（见图2），还是很幸运买到两包共计二十个医用口罩，在那之后口罩根本处于脱销状态；

② 不知道何时封城。1月23日武汉、黄冈接连通知封城后，湖北多条进出通道关闭，我们家所在的小城镇部分村镇切断了进出村的通道，高速进出口逐渐开始管控。封城以后我们并不知道会怎么样，各种谣言四起，大家都有恐慌情绪；

③ 失业的危机。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卖掉货车在家待业，母亲春节八天假期原本准备2月2日返回上海，但是家政群里传出上海人拒绝湖北阿姨、不允许湖北阿姨回上海的消息，而母亲的东家是否辞退态度不明但希望母亲早日回到上海。家人一直判断如果不回上海那么母亲也将面临失业。

我了解疫情给所有人带来的损失和冲击，但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我们家来说，失业的危机等于一座压倒性的山。我们家做出决定，我和母亲1月25日晚上出发，经过河南南阳高铁中转26日到达了上海。那时候，我们家所在的小城镇尚未封城，但第二天即传来高速封闭，只出不进的消息。



图 2：我所在的小城镇一药店里大家排队争相购买口罩。

## （二）上海的隔离生活

回到上海以后，我和母亲在我租住的单身公寓居家隔离。期间经历了疾控中心电话问询、签订居家隔离保证书、上报学校每日体温等各种事情，担心、焦虑、不安在隔离的 14 天内一直没有间断，所幸和母亲一起相互陪伴。

在上海隔离期间，是国内疫情严重爆发的时期，社区管理也非常严格。

我们被要求不能出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每天派人在我们房间门口消毒；因为公寓有小厨房，我们在叮咚平台上网购食材，送至楼下由公寓工作人员替我们拿到门口；每日垃圾定时清理等等。

来到上海的时间点非常尴尬，刚好 1 月 26 日学校统计信息，于是学校联系我确认信息并上报学校，差点被要求去学校隔离点集中隔离。当时并不想和母亲分开，也害怕我去了母亲无法适应在公寓的生活，幸运的是经过学校审批我被允许居家隔离，每日需上报体温和身体状况。

隔离期间我被各种情绪包裹着。一方面认为母亲真的需要赶紧回上海不然会失业我们家会失去经济来源，另一方面经历了一番折腾觉得是在给当前疫情添乱，隔离期间麻烦了很多工作人员，还各种怀疑害怕自己真的有被感染……种种情绪交织，五味杂陈。而后我和母亲终于在 2 月 12 日拿到解除隔离通知单（见图 3）。母亲的东家也并没有排斥湖北籍的我们，之后过来接走了母亲去家里工作，失业危机才算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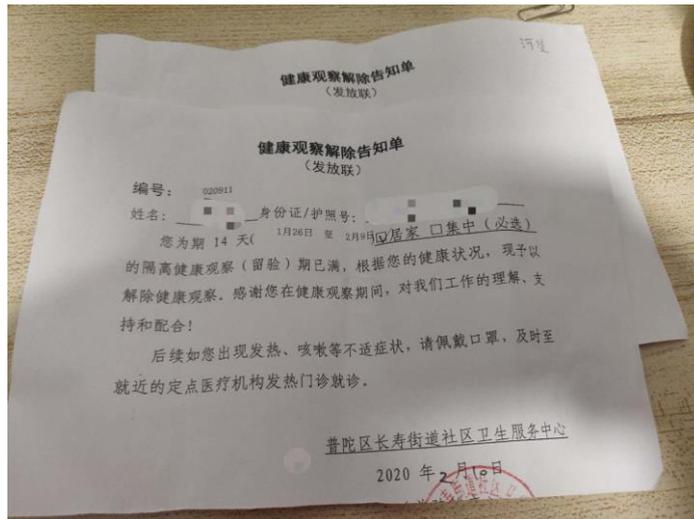


图 3：收到解除隔离告知单。

### （三）作为湖北籍人群的在外生活

在从家出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外省排斥湖北人的消息传来。那个时候既担心也伤心，为自己是湖北人而感到羞愧又愤怒。但是，从离家到现在，辗转几地的体验也让我有了新的感受：

① 高铁上的摩擦和冲突。1月26日从河南到上海的高铁上，我和母亲目睹了一次因是否是湖北籍而起的摩擦。就在我和母亲座位的后排，一位河南的老太太多次询问旁边的一家三口是否是湖北人，被问询的一家人回应自己是重庆人，但老人依然询问并嘟囔说口音像湖北的，后一家人被惹怒，丈夫大声说就算是湖北人又如何，引起了整个车厢的关注。后乘车间赶来调解，期间同车厢的一位男士站起来勇敢承认自己就是湖北人，呼吁大家不要歧视，自己也是做好隔离和防护措施才出来的。

② 隔离期间的关心。在上海隔离的两周，公寓和社区工作人员十分尽责，也非常客气，并不因为我和母亲是湖北人而有丝毫歧视或不满，反而是我们因为给他们带来额外工作量而内疚不安。

③ 作为敏感人群的流动。在上海近两个月后，我男朋友的母亲3月22日又驾车来上海接我到江苏。那时候国内疫情已经有所控制，上海和苏州往来只需要上海的健康云绿码和江苏的苏城码，我将解除隔离通知随身携带但是并没有被要求出具，到苏州以后也没有要求社区登记和再次隔离观察。后国内面临境外疫情输入防控，湖北也解封了，江苏要求3月25日到苏州吴江的人主动社区登记报备，或许我是属于“漏网之鱼”吧。



图 4：苏州小区疫情管理，供外卖小哥、快递员不进入小区递放物品的“购物车”

面对高铁上的摩擦和冲突时，我和母亲并没有像那位勇敢站起来的男士一样说话，说实话，我们是在刻意遮掩我们是湖北籍的事实。心虚、不安、担心被遣返等等让我如同吞了铁一样难受，不敢出声。群体压力下，少数个体如此弱小，即便歧视这种行为不对，似乎也掩盖不了湖北人就是疫情源头的事实。

疫情当前，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个体似乎免不了为自我和家人考虑。可是，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者，可以舍小家而为国家，即便为此牺牲而不顾。每每读到他们的故事我感动万分、羞愧难当。此疫情观察也是心路历程，期间点滴希望有鞭策我成长。

# “疫情中的城市”观察笔记

## ——以山西长治沁源及网络所见为例

邓嘉欢

**摘要：**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武汉，并在数月之内席卷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受到了多方位影响。疫情期间，笔者基本在家隔离，通过外出工作的父母、新闻报道、微信聊天等方式获取疫情消息。接下来将从家人思想及行动变化过程、对流动性的规范和控制、焦虑的排遣、线上教学初体验等方面阐述笔者的观察所得。

**关键词：**疫情，管控，线上

### 一、观察地点概况

笔者的家乡位于山西长治沁源，地处晋东南，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距离省会太原 200 多公里。县城以 54.12% 的森林覆盖率而闻名，居山西省之首，是全国“油松之乡”。县城生活节奏较慢，民众彼此熟识，基本一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回答者就能准确说出其家中人口数量、发生的比较出名的事情等。地貌上，以盆地和山脉为主，相对闭塞，火车站、高铁站、机场均无，目前在建一条高速公路的服务区。2003 年“非典”期间，县城无一例确诊病例。

### 二、疫情期间家人思想、行动变化过程

1 月 18 日，笔者从上海回到家乡，当天从朋友圈看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确诊几例肺炎患者，自然联想到因乱食野生动物导致的季节性爆发的流感，以为只是小范围内的疫情，所以没有放在心上。

1 月 22 日，看着新闻资讯里说武汉的疫情开始往周边省市蔓延，笔者前往药店购买口罩。一连问了三家药店才买到两包普通医用口罩，而这一物品稀缺现象在笔者居住的县城是不常见的，笔者对此次没有防护的出门感到些许担忧。口罩价格涨了一倍，每包 5 元。到家后，家人的反应是“乱花钱”、“买回来也没人戴”。随后，笔者在网上浏览相关新闻，发现“丁香医生”从 1 月 21 日起上线了疫情地图，当日疫情蔓延到北京、广东、上海等三个城市，觉得形势不妙。由于家里的长辈在手机使用上比较熟悉，笔者并未经历朋友圈里部分同学对家里长辈的口罩科普难题。基本从笔者买回口罩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长辈们就开始自发出门戴口罩、进家门酒精消毒了。

此外，家人会观察邻居有没有从武汉回来的亲戚，哪些是“外地回来的人”，身边的人是不是“四处乱跑”。这些信息大都是依赖人际沟通而不是大数据科技来搜集和分析。

1月25日新年过后，笔者母亲开始用配水稀释的84消毒液拖地，频率每天一次。新年当天，家中长辈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告知为了彼此健康考虑，今年不上门拜年，改为微信视频拜年。这种“开明”程度是出乎笔者意料的。

家人对疫情的态度从不知情、不在意到引起关注并付诸行动，其间的决定因素，一是手机作为传播媒介，为他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途径，这与当下的全媒体时代背景有关。媒介具有为受众设置议程的功能，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二是老姨作为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起到的号召作用。老姨是家中学识和地位较高的长辈，擅长手机使用。经过对新冠疫情相关新闻的观察，老姨跟家里人强调了该病毒的高风险，从而有效劝导家里其他长辈戴口罩、不上门拜年的行动，摒弃了“非典”期间不戴口罩、散漫随意的态度。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他们介入大众传播，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这提醒我们，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如果能借用关注度高的权威人士之口表达观点，民众的接受度和重视程度会相应提高。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笔者观察自身发现的。整个疫情期间，媒体报道很多，但笔者常看的几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澎湃新闻、丁香医生等，其他自媒体的报道很少关注。而且常看的几家也倾向于交叉验证信息，并不完全依赖某一家媒体的报道。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困扰笔者的“自媒体崛起后，传统媒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的问题得到了解答。自媒体由于主办人层次参差不齐、缺乏行业积累、没有采访权等原因，产出的文章可能在说服力、煽情度、阅读量方面尚有用武之地，但可信度却要打上一个问题。之前“咪蒙体”带来的社会危害依然让人心有余悸。传统媒体因为有多年的信誉积累和受众基础，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发生时，他们的报道及时、深入、有力，能起到受众的定心丸的作用。要论社会责任与担当，传统媒体首屈一指。

### 三、对流动性的规范和控制

由于隔离期间无法出门，笔者从供职于县公安局的父母口中了解到了县城疫情期间的管控情况。1月26日大年初二，父母收到单位的上班通知，通知称公安局取消节假日休息，

立即安排部门排班。同时，派遣应急值班人员上街巡逻，包括乘坐巡逻车和徒步两种巡逻方式，遇到不戴口罩者劝返。此外，公安局还派出警车用方言广播喊话，主要内容是“不要在街上逗留，赶快回家”。不同于河南、天津等地或“硬核”或风趣的广播喊话方式，县里的喊话较为朴实、日常。县里还派洒水车在主要街道路段每日喷洒消毒水两次。

疫情期间，县里所有村镇和小区只留一个出入口。特殊岗位需要上班的人领取县里统一制作的出入卡，上午和下午各填一次体温，盖单位的公章，以此作为出入小区的证明。每户每两日可派一人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进出小区要测量并登记体温。

县里设置两个定点超市，以满足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购买。其余商铺、餐馆、娱乐场所、网吧、宾馆等全部关闭。

1月底，县城开始设置四个主要进出控制卡口，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保证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防护物资车辆可以进入，相关车辆和人员进出需要登记信息和体温，并进行包括轮胎在内的车内和车外消毒。由于临近的长治市区、平遥县均有确诊病例，这两个地区的车辆一律不可进县。县内人员如需出县，需要户口所在地社区或村委出具证明，经所在乡镇镇长、疫情防控指挥部审批通过方可。

据亲历“非典”的家中长辈口述，“非典”期间并无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出门戴口罩的居民很少，整体感觉就是“非典离我们很远”。此次新冠疫情的形势之严峻，从进出县城的管控可见一斑。因而县城居民不敢掉以轻心，以高度警觉的态度视之。

此次疫情期间，十几亿中国人以高度组织化的“待在家里做贡献”的方式，初步遏制住了疫情，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难以置信的。诚然，这与西方人追求自由、反对束缚的文化有关，但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居家隔离行为与道义互惠（reciprocity）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中国人看重建立较为长期的合作性的“互惠”关系，例如“人情”关系、组织中的互利共赢等。这需要社会成员彼此的合作和利益关系非常密切和稳定，包含着对他人信用的普遍认可，对当下的付出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得到回报的信心较强，长此以往才能使得“道义互惠”或“均衡互惠”的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之所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与相信自身的举动能降低社会中的其他人的感染风险有关。即使不能出门很憋屈，他们也还是忍了，愿意为了这个社会的总体福祉作出个人的一点贡献或者说牺牲。

#### 四、焦虑的排遣

疫情期间，国人居家隔离，出行时间大大减少，在线时长大幅上升，网民们的创作热情

空前高涨。调侃在家长胖、开学日期、学习状态的表情包开始流行，也出现了以疫情为主题创作的表情包（见图 1），引起了朋友圈和微博的病毒式传播（go vi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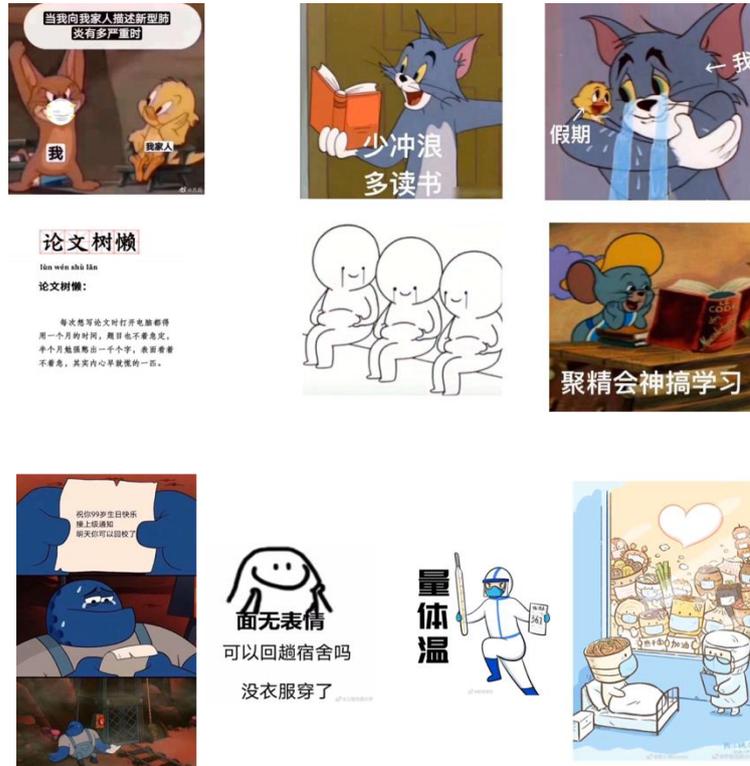


图 1：疫情主题的表情包

表情包作为符号，具有视觉表征功能，即传者与受者在认知图像意义时，依赖于视觉图景而产生的反映，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双方对世界的阐释达成了共识。表情包还有消遣愉悦功能，即表情能够表达传者的愉悦，也能调节交流氛围。

表情包多用于网络聊天。作为聊天内容的一种，其基本功能是提供并传达信息。同时，表情包生动形象，同时有 gif 形式或者辅以文字，使得传播更高效、快捷。疫情期间，笔者观察到最早出现的表情包是“当我向家人描述新冠肺炎有多严重时”。这一表情包率先在青年群体中流行，作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人际交流的工具，表情包的互动性有利于在初次建立联系时拉近距离，增强人际交流中的认同感。口语传播中一些不方便讲出的话、文字传播中一些繁杂的内容，在表情包中往往可以较好地呈现，表情包表意简洁清晰，传受双方意会即可，创造共通的意义空间（the meaning of common）。

当然，表情包也存在显在的不足。首先是表情包内容参差不齐，有低俗化倾向。“论文树懒”类的表情包为青年群体的“佛系”心态作注解，可能会消解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次是如果传受双方对表情包的解读不同，容易造成表达误读。表情包的使用人群多是青年，

不懂表情包含义的人会被排除在外，表情包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区隔，是一种面具。我们应防止表情包意义的滑动，走向意义的枯竭。

另一种焦虑排遣方式是全民参与在线直播。1月底2月初，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启动建设，央视采用“慢直播”的形式向网友在线直播医院建设情况，提供陪伴感与在场感。这一过程中，观看直播的网友为医院建设工地的器械取名，如给小叉车取名“叉酱”，给小铲车取名“铲酱”，给高层吊车取名“送高宗（宋高宗）”，给摄像头下面的三棵桂花树取名“吴三桂”等，甚至还产生了后援会、每日打榜等粉圈行为。表面来看，这体现了网友创造性的活跃，可谓是一场全民创作行为大赏。然而事后细思，会发觉这一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并不简单。一方面，大量器械昵称取自中国古代帝王及著名人物的谐音，似有对历史的不尊重、不敬畏。另一方面，我们应警惕这种低幼化的命名，一定程度上，其背后隐藏的是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观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功能，它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萌化，是不敢面对现实的成年人的理想乡，是不愿意成熟的少年的乌托邦。

## 五、线上教学初体验

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用户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在线教育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笔者就读的复旦大学从3月2日起开启了线上教学。起初的一到两周时间里，老师和同学们都在逐步探索和学习腾讯会议、Zoom、钉钉等软件的使用方法，包括开启静音、开启视频、屏幕共享、聊天框使用、举手、联席主持人设置等。经过短暂的适应，教学与学习逐渐步入正轨。笔者认为，这一疫情催生的线上教学现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线上教学诚然有其优点，比如减少了课间换教室的奔波、相对延长了休息时间、衣着自由等。笔者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线上教学期间，师生互动频率有所上升。班级里上学期上课几乎不发言的同学，这学期竟然都有主动发言。笔者认为，技术带来了话语平权，线上发言没有面对面教学的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限制，所以开口率大幅提升。意见

气候是指自己所处环境中的意见分布情况，包括现有意见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意见。其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个人所处环境中的群体意见，二是大众传播信息。个体在家上课时，空间上是独处的，在发言时无法通过获知班里其他人表情和肢体的反应来判断其对自己观点的态度，发言时没有心理包袱，意见气候暂时失灵，因而可以畅所欲言。

线上教学的初期，需要老师与同学花时间去适应。一方面是设备调试的不熟悉，另一方面是老师们面对屏幕“对空言说”产生的心理不适。线上教学期间，因网络连接不畅而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因家中环境嘈杂导致听课效率下降、自律性不强而在上课期间开小差等，是显在的问题。对线上教学的不适应在笔者初一的表弟身上表现尤为明显。表弟所在的中学使用钉钉软件授课，每门课都建立了课程钉钉群，同步有家长的微信群。据笔者观察，表弟使用 iPad 上课期间，会使用分屏功能，左边是钉钉的上课界面，右边是抖音或音乐软件等娱乐应用。当老师点名要求表弟回答问题时，表弟会在家中网络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假装”网络不畅，以此逃避回答问题。以上情况说明，线上教学存在可见的“漏洞”，仅靠学生的自律和家长的监督显然无法弥补。如何保证学生听课的效率，能否设置屏幕使用监督程序，以及设置该程序可能带来的道德和隐私侵犯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 六、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在疫情期间对居住城市所做的观察及所思。疫情的到来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和挑战，口罩戴与不戴的变化、居家隔离的焦虑及其排遣、线上教学与开会的适应，都需要个体心态的及时调整与适应。此次参与式观察让笔者开始留心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提醒笔者日后的学习和生活要将日常观察和思考提上日程。往往一滴水见太阳，时代的轨迹可从些微小事中窥见，只要足够用心。

# 疫情观察：何以“正常居家”？

林思恒

如果说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那就是让我久违地在家停留了很长时间。这里的“家”甚至可以取最狭义的理解：居住的那个房子。从1月23号开始直到3月下旬，我几乎没有离开居住的社区一次。换句话说，在杭州疫情最为严重的，管理最为严格的一长段时期里，我没有任何一次外出观察的经历。这使得我的疫情观察笔记有些无聊，写来写去似乎无非与家里另外两个人的互动，或从互联网中了解到的咨询。记录下来的居家日常生活好像平平无奇，到底有什么可以反映这场几十年难一遇的事件的特殊性呢？

这样的纠结一直持续到一些问题的出现：我的生活虽然平淡，但真的“普通”吗？我习以为常的东西，真的那么自然吗？正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式提问让我想到了另一种分析可能：调转枪头，去讨论“为什么我可以在疫情管控期间过得如此正常”。这样的问题必然引发下一串疑问：其他人的经历与我一样吗？为什么有的人的生活与我类似，有的人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疫情特殊体验呢？

下面，我将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什么支撑了我能够在疫情期间正常的生活。

## 一、正常居家的物资保障

与大多数大城市的居民家庭一样，我的家庭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生活物资，这也这是一切居家生活的前提。在居家的近两个月里，家庭的正常饮食和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说明生活物资一直是充足的。那么，在漫长的居家生活中我的家庭是如何获得生活物资的呢？

口罩是疫情中的必备品。即使我选择不出小区门，但取送快递外卖也得从家里走到小区门口，中间还要乘坐电梯。许多消息灵通、眼疾手快的人在疫情早已有苗头的时候就抢购了口罩，而我们家则都稍显迟钝，没有提前从市场中抢购口罩。而在口罩有价无市的一段时间，我们更不可能买到口罩。没有从市场获得口罩，但在疫情期间，家里的口罩储备一直相对充足。那么，我们是如何获得口罩的呢？在我的观察中，主要有以下的渠道：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和从工作单位获得。

1月21日，我母亲去我二姨家拜访，这成为了过年前后最后一次走亲访友。听说我们家还有购买口罩，二姨特地送了8只，这成为了我们家最早一批口罩。当天，我父亲下班后

带回来一袋口罩以及一些基本药品和一瓶消毒液。这些都是工作单位发放给员工的。

除夕过后，家里还收到过两次口罩的快递包裹。一次是母亲的同事寄的，还有一次爸爸的朋友寄来的。其中一包口罩还来自欧洲，是包裹的寄送者委托在欧洲的朋友邮递过来的。总之，在居家期间，虽然没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口罩，但亲朋好友间的礼物交换和单位制提供的职工福利使得家庭的医疗物资需求得到了满足。

如果疫情期间坚持居家而完全不出门，又碰巧全家身体健康没有药品需要，口罩等医疗用品可能都显得不那么必要。也正因如此，疫情期间家里的口罩在我父母复工之前都基本没怎么使用。相比之下，食品等生活物资会变得更加重要。在小区开始封闭式管理、超市和市场逐渐停止营业之后，我们家的生活物资的获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疫情期间三人的伙食与平时变化不大。

生活物资一方面来自集中的储备物资。首先是冰箱中冰冻的肉类和其他冷冻制品。这些肉类生鲜制品主要是先前亲戚朋友赠送或使用工作单位发放的提货券领取的。平时我在外地上学，父母经常在外用餐，因而这些东西消耗地比较慢，常有累积。恰恰是疫情居家给了消耗它们的机会。还有一部分的储备物资来自于过年前已经进行的一些礼物交换带来的年货（或还没来得及送走的），主要是水果、零食点心和腊制品等。

肉类和冷冻制品可以消耗存货，但餐桌上也不能没有新鲜蔬菜。疫情期间各种买菜的app发挥了作用，许多人通过叮咚买菜或其他同类软件保证了自己和家人维生素的摄入。在居家的过程中，我们家一方面有通过有人蔬菜的快递。而在另一方面，家里的亲戚也联系到一些郊区的蔬菜供应点快递来许多蔬菜。这部分蔬菜是居家期间重要的一部分食品供应。从2月初到3月初家里大概收到了3次亲戚购买赠送的蔬菜，每次的量都足以食用4-5天。

## 二、物资保障何以可能？

仅仅考察了家庭的物资供应，也可以发现哪些支撑着我过着普通居家生活的看似不可见的要素。在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中，居民家庭都需要通过各种渠道通过交换获得生活资料。而在当代中国的大城市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毫无疑问，为抗疫而进行的城市的管制会使得正常的商品交易渠道受到限制，但这样的限制对我们家的影响似乎没有想象的大。如上所述，从疫情开始家里就一直在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和一定的医疗物资。当然，这不是说这些物资没有经过市场交换，只是说我们家庭的获得不是通过直接的市场交换的：一部分来自单位制内的福利分配，熟人网络的礼物交

换则提供了另外一部分。

那么，这种渠道的存在何以可能呢？首先，我居住的城市是一个身处非核心疫区的大城市。这使防控的管制等级相对较低，社会秩序的收到的冲击较小，能够保证疫情期间的生活物资虽然短缺但不至于特别短缺；其次，由于我的父母都在事业单位有正式的工作岗位，这样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单位性质保证了从各种再分配领域获得资源的渠道。具体而言，单位制依然会给予员工一定的福利性资源，相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保证了一个能获得更多物资的社会关系网络；再者，大城市中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许多服务业劳动者的劳动亦是重要支撑。如果没有快递和外卖员的劳动，没有快递物流网络，或许物资的获取都会困难许多。

如果再深入细节，会发现我的家庭更多的特殊性。比如，家中没有老人，家中没有慢性病患者，居住的社区是一个物业管理相对完善的门禁小区等。到这里，我们如果再次掉转头，又会呈现新的分析思路：如果将上面的种种条件逆转过来，会发现哪些人并不具备相对正常的居家生活的种种条件。他们可能就是疫情风险中相对脆弱的人。

比如，如果有老年人，他们的生活会在疫情中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呢？城市的管制限制了居民的外出。对我而言，虽然管制极大的延迟了开学，限制了外出的社交活动，但即时通讯软件足以满足我很大部分的社交需求。虽然感觉生活有些枯燥，但也没有变得很“封闭”。由于许多居家的老人的社交活动主要通过外出和面对面交流（散步聊天、下棋打牌麻将），他们在社交上会受到更多的剥夺；同时，外出散步时许多老年人活动身体的主要方式，长期无法出门可能导致一些潜伏着的慢性病隐患。

在疫情中，慢性病患者可能会遭受更大风险。首先，慢性病患者即使在疫情间可能仍然有就诊需求，这很可能会增加他们暴露的风险。其次，由于疫情一方面总体上增加了医院的负担，另一方面医院的主要精力会放在新冠肺炎的防治上，用于其他疾病的防治的资源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从就业形式考察，我父母的职业中没有如医生、一线社区工作者、快递员、营业员、等疫情期间必要的一线劳动岗位（我作为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更不必说）。同时，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保证了工作和收入的稳定，疫情期间不会有近在眼前的经济收入风险和失业压力，相反是可以“躺着拿钱”。同时，家庭中的复工压力不大，也不需要跨地区流动。而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得知，许多服务业和工商业企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极大，此时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就很容易受到波及；即使没有丢工作，也

很可能会因为暂时失去收入而陷入入不敷出的生活阶段。

### 三、引申：互惠的限度

当然，上面的种种设想更多来自我的推测和我阅读到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也相信所列举的哪些容易遭受风险的群体也自有自己的应对风险之道。但由于缺乏观察资料，在此我将不会讨论展开讨论这一问题。但在最后我想就我观察到的种种类似“互惠”获取生活物资的方式做一些理论上的讨论。

在波兰尼的框架中，市场、再分配和互惠性质的礼物交换是三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运行模式。如果仅考察形式，会发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疫情期间我的家庭获得物资的方式中市场—商品交换似乎最不明显的：亲朋好友的礼物往来和单位制的福利再分配是主要的物资来源。但若我们再往前思考一步，就会发现市场机制才是背后真正的支配力量。无论是亲朋好友的赠送，还是单位的福利，都躲不开归根到底的市场采购行为。无论亲朋好友还是工作单位都不生产口罩和食物，他们依然是以各种方式和渠道购买到了这些物资。这同许多民族志中呈现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社区很不同：他们中许多人是作为生产者来进行互惠和礼物交换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他们可能找到了更合适、便捷的渠道。

也正因如此，形式上的“互惠”和再分配对于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不平等不一定具有期待中的那种“抵消”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市场机制在归根到底地支配着”礼品“和”单位福利“只能在特定的领域范围内流动。换句话说，这两者可以在同一阶层内起到拉平效应（如中产的亲朋好友相互寄送口罩蔬菜，单位职工内部保证每个人都有基础的医疗物资），但其不太能直接保证资源跨阶层和跨团体的更平等的分配。

# 疫情中的田野观察——再定义中的“洁净”空间

赵雅卓<sup>1</sup>

1月15号晚上十点是我回到兰州的日子。火车途径江苏，横贯安徽，穿过河南和陕西回到兰州。当晚坐在高铁上的我，数着从古诗中跳到现实中的地名，淮南、凤台南、颍上北、亳州……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会像遍布全国的高铁线一样，快速流动传播席卷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在全民流动，每一个都被镶嵌至世界发展体系之中的时刻，“流动”这个社会语词，伴随着逐渐严峻的疫情被剥离掉“灵活”与“发展”等意味，逐渐被靠贴上“危险”与“不洁”的意含。同样“人口流动”的社会“空间”也被贴上特定的标签。同样作为高危险性传染疾病相比于17年前的SARS，人口流动性更高，空间范围也更广，短短三个月时间，COVID-19就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下是我基于近三个月的田野观察。疫情的到来限制了我惯用的人类学调查手段，由于无法长时间全接触的进入田野，以往的接触式、亲临式田野调查手段、方式和技巧好似派不上多少用场，这也是在疫情之中颇为头疼的事情。三个月的长时间隔离加上少量的外出机会，构成了本次的田野资料，针对于“空间“与”流动“我观察到三个有趣的现象：1.不同的空间被给予不同的洁净意涵——被重新定义的空间卫生观念；2.不同人群在疫情之中与空间的镶嵌程度不同；3.“洁净“与”清洁“的再定义。

疫情的到来，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空间范围与话语体系的重构，疫情中的医院是个很好的例子。医院作为接收和诊疗大量流动患者的空间自然在疫情期间看作是“危险“和”不洁”的，但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必须要去医院的情况下，进入医院的患者好似有一套相对公认的区别“安全”的医疗环境与“危险”的医疗环境的标准。除此之外在医院范围内，到底什么是“科学的”，“有效的“和”洁净的“卫生观是一直讨论的话题，在疫情前期的卫生洁净标准也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的弹性状态。从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发表病毒人传人观点开始，空气传播成为被确认成为主要传染源头，再到李兰院士表示75%酒精可以灭杀酒精，每一次洁净标准的发布，不仅仅伴随着口罩，酒精等卫生用具的脱销，还是重要的洁净观的重要指标，以及之后疫情中“洁净”仪式“的根本。

## 一、不同空间内弹性的洁净观点与卫生仪式

---

<sup>1</sup>赵雅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新闻媒体报道以及疾控中心的权威病毒信息发布，大概勾画出了安全空间的理想样态，空气流通足，人群密集程度低等标准。但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安全”空间的定义却是弹性十足的。三月初黄河岸边茶摊已经开始挤满了人，人与人保持着较近的距离，甚至在靠近河边的茶摊里有人下意识脱掉口罩。奥特莱斯、兰州中心等半封闭购物场所，看似是疫情防控措施最低的地方，只需要简单在入口处测量体温即可，门口摆放的消毒酒精也鲜有人使用。相比之下露天的菜市场，不仅需要进入之前测量体温，同时部分菜市场还需要提供居民出入证，但商城依然被大部分访谈路人当作是更安全的空间场域。以往看似尘土飞扬的市郊在疫情面前被看作是更为安全的地区，甚至是在医院这个看似“百病汇集”“危险的空间范围依然享有弹性的”“洁净”划分，除了区分“安全”的医疗环境与“危险”的医疗环境外，中西医不同的洁净观点在未知的疫情面前也在不断竞争融合。

3月4日起兰州本土新冠病毒案例呈零增长趋势，从二月初就开始腿痛的我终于在三月底下定决心来到甘肃省中医院就诊。中医院属于基本西化的三甲医院，少数门诊科室（例如，皮肤科等）开设中医或藏医窗口和就诊服务，但是完全是西医医学标准为主的医院。由于兰州地处西北疫情相比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来讲并不算严重，且重症新冠患者会送至兰州肺科医院，所以该医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安全”且医疗资源较为充足。4月25日之前，患者进入医院前并不需要微信扫码登记自己的健康状态。但是在此之前，医院依然设有三道关卡，确保筛选潜在的新冠患者。第一道，医院规定特定的进出口后，全面关闭所有的入口，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亭，测量第一次体温；第二道关卡，门诊大厅各科室楼设置全身体温检测装置，（4月25号后，进入门诊楼需要微信扫码填写医院系统的健康申报，登记身份证号）医院人工开放窗口减少，推荐使用自动挂号机，显眼处摆放消毒酒精；第三道关卡，挂号后，正式进入看病科室前，大厅会有护士值班测量体温，4月25日后，变为填写身份信息和健康信息（分为微信网络版和手写版两种，手写版给没有手机和不会使用手机的人，但有意思的是，4月25日起，如果没有手机微信，不进行网上信息申报的话，根本无法进入门诊大楼，4月25日当天，我由于不知道医院要求变化，没有带手机，非常麻烦，并且两次信息收集重复，且体温等信息且均由患者自填）。进入医院，意外的是，我发现除了戴口罩外，没有人保持特定的安全距离，人与人的距离依然还是很近，口罩仿佛就是万能保护罩，医院的空气内除了充斥着常见的消毒水与酒精的味道外，还飘散着点燃的艾叶的味道。顺着楼梯上去，在西药药房的窗口旁边摆放着正在燃烧的艾条，烧艾的味道很大，在艾条不远处摆放着一瓶供大家使用的消毒酒精。看到这一幕的一刻，我意识到中西卫生观在疫情期间产生了

交融和碰撞。在正式看病之前，甚至是进入任何公共场所时，每一个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清洁仪式，戴口罩，实名信息登记制和伸手测体温，触碰公共物品后酒精消毒，组成了清洁仪式四件套。清洁仪式的形成与监督是基于社区空间的精细化，即到家到户管理，项飙在《从链式反应到网格反应：SARS 和 COVID-19 流行期间的流动与限制》将其称之为网格反映（grid reactions）。各小空间划分标准虽然可以限制人口、缓解流动，但为了保证各小空间以及社会整体的正常运转，不免存在一群临时穿越该空间限制的人群，但这类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的边缘人群，被现定卫生观点所忽视的人、他们在疫情之中的社会记忆与生活境遇如何是我所关心和在意的。

## 二、穿越“安全”与“危险”边界的普通人

疫情之中，我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影响。疫情开始的前期，远在日本的哥哥就寄来了一箱口罩，由于是过年期间，家里的食物储备也十分充足，再加上父母在疫情期间没有太大上班的压力，实际上疫情期间对于我来讲可以算是难得的家庭时光。

从一月底开始到现在，整个城市被予以充足的生活物资。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不禁在想谁是这所城市的守护者与运输者。我的姐姐是社区主任。疫情开始，姐姐就没有了假期，每天驻守在工作岗位上，整个二月都是白加黑、二加五，只有三月休息。除了要在社区轮岗外，还要时刻关注流动人口信息，配合多方组织工作。除了像我姐姐这样的普通公务员外，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市区马路每一天都保持干净与清洁，快递服务与外卖服务也都处于正常的运转中。从疫情的一开始我就在思考，这些帮助城市正常运转的普通人，他们是如何看待疫情本身的，在“隔离即安全”的标准之下，他们如何去定义“安全”与“危险”的关系，在这段社会记忆的背后，又潜藏着什么故事。我于2月底，进行过一次简短的随访，我看到一位将水杯放在垃圾桶上，靠着扫帚摘下口罩喝水的清洁工阿姨。二月底还算是疫情较为紧张的时刻，整个城市刚刚恢复生气，口罩不仅是隔离病毒的有效工具还是重要是洁净象征和标志，在我可见范围内几乎没有人敢摘掉口罩，特别是坐在看似充斥着细菌和病毒的公共设施上（例如，垃圾桶旁，天桥旁）。但对于清洁工阿姨来讲，看似充斥着危险的公共空间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工作的私领域，反而由于疫情人少，更干净了。但是由于戴着口罩，对方看不到我的脸，对我的信任感也许不高，我并没能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访谈。但随着疫情的好转，我想去挖掘更多的普通人的故事，我想去看看那些病毒抵御能力和社会资源相对较弱的人又是如何定义和解读自己的疫情故事的。

辑三  
课程作业选编



# 洁净与污渍——基于北区食堂田野观察的研究设想

梅雪<sup>1</sup>

## 一、研究背景及发现问题

复旦大学北区食堂位于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公寓内，主要服务于居住于北区的研究生和留学生，以及部分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其饭菜口味广受学生好评和推荐，北区食堂的服务范围往往扩大到全校，经常有居住于本部甚至南区的学生长期性的到在北区食堂就餐。北区食堂共有二层楼，一楼主要为中式菜类窗口，供学生点菜；二楼则窗口类型多样化，提供中式菜类，也有西北火锅，麻辣烫，意式面饭，韩式饭菜，以及各地风味小吃等。虽然两个楼层提供饭菜多样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就餐配套设施、空间布局设置、工作人员岗位安排、灯光布置特点几乎没有差异。两个楼层有着各自相对完整的结构和运行流程，表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北区食堂的工作人员由多种不同类型构成。包括餐厅经理，厨师，窗口内负责打菜的人员，负责清理桌面的保洁人员，回收碗筷的工作人员等。而学生“能直接能看得见”的是窗口打菜的工作人员，保洁人员，以及回收餐具的工作人员这三种类型。不同的类型的工作人员，各自分布于不同类型的空间，活动于不同特征的地方。我之所以对此区分感兴趣的，来源于我一直以来对颜色和灯光的敏感。我发现同一餐厅内的不同职责的工作人员穿着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他们的活动场所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灯光强度。于是我产生好奇和疑惑：为何负责打菜的工作人员身着白色工作服，而负责保洁和回收碗筷的工作人员身着绿色或褐色等深色工作服？为何打菜的窗口都灯光明亮，而负责回收的窗口里灯光昏暗？这些看似细节和偶然的差异，背后是否被赋予其特定的意义？这些问题引发我继续探讨这其中的机制的兴趣。

## 二、玛丽·道格拉斯的启示和灵感

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清洁与污垢的区分与社会秩序相连加以考察。书中指出，事物的洁净肮脏与否，和它们本身的“洁”与“脏”无关，只取决于它们在人类文化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它是分类的剩余和残留，被排除在我们正常的分类体系之外。就像书中所说：“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

道格拉斯指出，我们现代人的日常活动，也往往带有原始仪式特点，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我们关于洁净和肮脏的医学观念与原始人的神圣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重建我们周围的环境秩序。而在社会秩序（包括伦理道德）的重组过程中，污染观念、禁忌、宗教仪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通过象征秩序的建构，往往能够帮助相应的一种社会秩序的维持。干净、整洁，象征着新的可以由愿望来安排的秩序，如在庆祝新年到来时，家家户户都会洒扫庭除，这样看来，这一切都仿佛是对一种新秩序的期望和许诺。而污垢本质上是混乱的无序状态，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它只存在于关注者的眼中。污垢冒犯秩序，去除污垢并不是一项消极活动，而是重组环境的一种积极努力。在去除污垢、整理杂物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受到了“要逃离污垢”的渴望，而是要积极地重建我们周围环境的秩序，使它符合一种观念。污垢

---

<sup>1</sup> 2010年本科定性研究课程作业

意味着越界，意味着对现有差别体系的威胁，因而是危险的，必须通过某种洁净仪式来消除它，使一切恢复常态。

而对于那些模糊不清的事物，虽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非正常事物，但她仍然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非正常和模糊在现实中很难区分。非正常是不能融入到已存在的系统中的元素；而模糊则是一种陈述的特性，即这种陈述允许两种解释，它其中也暗含着其无法被清晰分类的性质。人们对暧昧不明的行为的反应表达的是一种期许，即万事万物都应正常遵从世界的治理法则。

《洁净与危险》一书对于我理解北区食堂内所观察到的现象有很多启发，不同职责工作人员有着深浅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不同的场所配置着亮暗不同的灯光，由此带来的明晰或模糊的不同视觉效果，这些是否和我们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避免有关？是否也和我们所希望建构的社会秩序有关？这些都激发我提出假设，以上这些区分可能不是偶然和无意义的安排。

但是《洁净与危险》一书并没有完全能够解释和回答我所想要了解的内容，对于作者的假设、推理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仍存在几点疑惑。首先，《洁净与危险》一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污垢意味着对秩序的危害，人们对此难以容忍。但是，由于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太多的冲击使得人们难以有足够精力来一一消灭所有的污垢，为此人们完全有可能把一部分污垢纳入秩序的一部分，用来增加秩序的弹性，将之列为秩序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得秩序的运行更加顺畅。正如中国一些流传很久的谚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污糟污糟，吃了长膘”。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并未选择对污垢进行敏感的祛除，而是对其显示一定程度的容忍，并且表达为谚语的力量将之传承，使后代同样接受。

其次，即使《洁净与危险》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污垢危害秩序，人们对污垢是难以容忍的——因而道格拉斯提出推论：人们会积极的去除污垢来维持秩序的井然。但是对于这些污垢，人们往往有若干种方式来处理。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有意识面对这些反常事物，并且创造出一个它们能够融入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新的现实模式。但同时消极方面，我们也可以故意忽视它们，不感知它们，转移人们对这些非正常事物的注意力。正如同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眼不见为净”，为了追求洁净，人们不一定是积极的去除污垢，也有可能选择对污垢进行有意识的无视。

第三，道格拉斯认为，事物的洁净肮脏与否，和它们本身的“洁”与“脏”无关，只取决于它们在人类文化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但是在实际观察中，我们发现，即使事物处于该处的位置，它也仍旧会被视为污渍，如当就餐者想要丢弃其吃或未吃过的饭菜而将其放置于回收餐具处时，此时这些饭菜处于其该处的位置，但它被放置于此，它同时也就被定义为污渍；因此，我认为作者也忽视了除位置错乱以外其他影响事物“洁净”与否的因素。

第四，道格拉斯认为，模糊同非正常事物一样，是难以被分类的，无法被划入系统之中，也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挑战，因而也是被人们所要积极避免的。但在现实观察中，我发现，无论是昏暗的灯光，还是深色的工作服，都在试图营造着一种模糊的视觉效果，这种对模糊和暧昧不清的事物的追求与道格拉斯的陈述也有所出入。如果在食堂中存在着对清晰和对模糊的二元的追求，那么这是否仍然与秩序有关？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实际田野观察中继续考察。

### 三、研究假想

白色这种色彩，在视觉文化中往往表达了一种纯粹洁净的意义，而正是这种纯粹往往不能容忍任何污渍，因而一点点污渍都很容易凸显出来，白色的这种特征能够让人保持一种对污渍的警惕感。因而，餐厅内白色的工作服是为了让污垢看的更清楚，让工作人员注意及时清洗工作服，也让学生感觉到饭菜的卫生清洁，给予就餐者以安全感，维持系统的秩序感；而绿色或褐色等深色工作服，更接近泥土和大地的颜色，它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对各种色彩都具有较大的相容，使之难以轻易辨认。绿色和褐色的工作服本身就是对污渍颜色的一种模拟，是为了让油渍污垢看不清楚，因为负责保洁和回收碗筷的工作本身更容易接触到油渍，这样工作服沾到污渍也不容易被注意到，使得他们即使行走在学生附近，学生在就餐时也能感觉远离污渍，感觉食堂环境的卫生和清洁，从而感受到一种秩序感。

同样，打菜的窗口内，明亮的灯光是为了衬托出菜的鲜艳色泽和窗台的窗明几净，以此希望被就餐者关注到，而灯光昏暗是让剩饭残羹和油渍汁液尽量不引起就餐者注意，即使被看到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掩饰住其真实状况。亮度的高低程度不同往往体现对事物的强调程度的差异，也体现其对于就餐者关注与否不同程度的期望。

如果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即颜色和亮度的区分都是出于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逃避，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负责打餐的工作人员总是高声吆喝的行为，有的甚至哼出抑扬顿挫的调子，是为了吸引就餐者的注意，从而在众多窗口中凸显出本窗口的饭菜；而保洁员和回收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总是沉默少语，也是他们希望尽量淡化自己以及自己所接触的污渍对于就餐者的影响，如果这一角度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轻易的把不同职位工作人员的不同言语和行为特征仅仅理解为他们个人的性格不同，而更能够从社会秩序的内化使然的角度来理解。另外，我们也能够推测，出于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逃避，同样是身着手套、口罩、帽子、工作服，但这些装备对于不同职责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作用。对于窗口内负责打菜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衣服上和手上的污渍、自己的头发丝和唾液会污染到食物，从而追求饭菜的清洁；而负责保洁和回收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全副武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皮肤和污渍直接接触，避免衣服被污渍污染到。

总结以上假设，我认为，在食堂这一环境下，存在着对清晰和对模糊的二元追求，存在着对污垢的积极去除和消极忽视的二元处理方式，而这些不同的途径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洁净，从而维护秩序，维护的秩序是一种更有弹性更容易维持的秩序。而通过色彩、灯光的强调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体系来建立起与现实秩序的联系。

#### 四、理论意义及实际意义

理论层面上，本文的主要假设是建立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理论框架之内，但同时对该书很多观点和结论也提出不同的观点。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事物是否处于它该处的位置往往能够决定它是否是污渍，污垢危害秩序，人们对污垢是难以容忍的，因而人们会积极的去除污垢来维持秩序的井然。该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也有一些内容需要继续推敲。但是本文力图对话该观点，基于初步的田野观察，认为即使事物在其该处的位置，但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其清洁的感受不同；当污垢危害秩序时，人们不一定对污渍难以容忍，也有可能将部分污渍纳入秩序范围之内；人们对污渍的态度也不一定是积极的去除，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忽视。本文提出假设并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田野观察来验证该假设的真伪。因此，本文所作的研究计划有助于更深刻的了解社会在追求洁净、维护秩序时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通过本次研究有助于对道格拉斯的“洁净-秩序”的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实践层面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餐饮业营造怎样的就餐环境提供参考。颜色和光

亮对于就餐者有着很大的影响，深浅不同的颜色和明暗不同的光亮往往能够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和意义，这一结论早已被很多餐饮业都烂熟于心，奉为准则。但是本文将颜色和光亮的选择与对洁净的追求相连，与秩序的维持相连，力图发现色彩和光亮选择偏好背后的深层的稳固的因果机制，而这一因果机制的揭示对于餐饮业营造怎样的就餐环境能够具有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建议，也有助于餐饮业从业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就餐者的个人偏好是如何和维护社会秩序相连的，赋予决策者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而为其多方面的决策提供更理性的指导意义。

## 五、前期准备工作

在研究之前，我已经在北区食堂多次进行观察，并且作为实际的就餐者，体验北区食堂的就餐环境，感受就餐者日常就餐的全过程，与工作人员进行直接接触，并且在此基础上，已经完成完整的观察笔记一篇，这些都有助于我更好的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环境和发生背景，为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实际基础。此外，在北区食堂做田野调查时，我已与负责打菜的工作人员、保洁员、回收员、其他就餐同学都有过口头交流，初步询问过他们对于北区食堂清洁状况的感受，虽然还不够具体和全面，但是对于后面详细的调查设计很有启发。另外，在开展正式研究之前，我已查阅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洁净与危险》、《阴翳礼赞》、以及一些有关餐饮业色彩选择、艺术设计等的书籍资料，这些来自于人类学、文学、餐饮业、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对于本文分析色彩和光亮也能提供更准确的多领域的知识补充。

## 六、方法设计

### 1.结构性访谈

分别访谈就餐学生，打餐员，保洁员，回收员四类不同群体，请他们列出理想的就餐环境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并追问其如何实现这些因素；

要求四类访谈者对北区食堂内环境进行简短描述，特别关注其提到洁净、秩序相关的内容，以及对北区食堂工作人员的相关描述，如有需要，及时追问；

询问四类被访谈者各自对清洁的定义和对污渍的表述，注意其描述清洁或污渍时提到的其他事物，请其举例列出几个洁净的事物和污渍的事物，询问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清洁与否的感受；

询问学生对于理想的打菜员、保洁员、回收员的形象描述，特别注意其对于清洁程度的不同期望的表述，并追问其原因；

请学生描述出理想的打餐窗口、回收窗口的形象，注意其对于光亮的表述以及对洁净程度的表述，以及对秩序的期望，询问其不同的窗口需要什么形象的工作人员，追问以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

### 2.情景比较

将学生带往四种场景：灯光明亮的打餐窗口，灯光昏暗的打餐窗口，灯光明亮的回收窗口和灯光明亮的回收窗口，每体验一种场景就要求其简短形容该场景，并询问光亮程度的强弱带给他们的感受，记录其不同场景的不同感受，比较不同场景对于他们的不同的意义。

再将学生带往三种场景：一碗同样的菜，在打餐窗口内，由身着洁净无污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就餐者，由身着沾有少量油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就餐者，和由身着褐色工作服、看不清是否有污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工作者，给他们什么感受，请学生选择愿意从哪位工作人员手中接受饭菜食用。

再将学生带往三种场景：在回收窗口内，当站着一位身着暂时还洁净无污渍的白色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当站着一位身着已沾有大量油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当站着一位身着褐色工作服、看不清是否有污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询问学生对其分别有什么感受，询问其对于三者洁净程度的比较，以及自己对于回收窗口洁净程度实际的期望。

### 3.角色扮演

请学生扮演工作人员，分别扮演打菜员、保洁员、回收员三种角色，体验其工作。扮演每种角色时，都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工作服的颜色，调节自己工作场所的灯光亮度，工作时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与就餐者的交流方式，允许其使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维持本窗口前的秩序。

当学生扮演完三种角色时，请学生谈谈对此角色的感受，询问其当时选择工作服颜色、调节灯光、行为方式、交流方式等不同行动的理由，了解这些选择对于该角色的不同的意义；请扮演角色的学生从其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出发对清洁和污渍再次进行描述，比较其与当初所作定义的不同，以及对秩序如何维持的理解，对就餐者的角色期望等问题。

### 4.Mapping

让打餐员、保洁员、回收员、就餐者四类被访者每人一张纸上分别画出北区食堂打菜窗口、回收窗口的位置，以及学生就餐的位置，比较不同被访者群体对于三者相对位置的不同距离，询问这样的位置给予其何种感受；如果被访者不满意于此种位置的现实安排，请他们在纸上画出他们理想中的位置安排；并请每类被访者都在其所作的图上标记出自己以及另三类人群，选择他们认为舒服的位置和相互间的距离，询问其这样安排的意义。

#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石佳鹭<sup>1</sup>

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抽象的数学模型中推出资本自由流通将惠及全球的结论之时，人类学家通过“嵌入性”（embeddedness）来理解世界，并对真实世界的权力运作保持敏感。“嵌入性”的概念来自于波兰尼，强调经济活动嵌入在人际联系中并被这种联系所塑造，而人际联系中内含着复杂的权力互动（引自原书第4页，下同）。所谓自由流通，不过是巩固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

“灵活性”是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要求，以临时性、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与可迅速市场波动为主要特征。笔者认为，《全球猎身》围绕“灵活性”的构建回答了三个问题，即：灵活性满足了什么样的需求？灵活性是如何被制度化地制造的？灵活性的代价由谁承受？以下将分别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阐述。

## 内容概述

### • 灵活性满足了什么样的需求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由于金融化而大起大伏的网络公司市场的内在需求，灵活性匹配了市场的快速波动，其本质是资本扩张的要求。项飏在书中提到了三层原因：第一层是IT行业本身的性质，即人海战术。IT业界在过去30年是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的，编程、测试和检错的阶段需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投入。第二层是金融化，以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成立为代表，大量资本的投机流动使得IT行业随着股票市场而大起大落。第三层是直接的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繁荣，在经济低落期灵活性降低了企业成本，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要求。

面对国际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要求实则与国家的要求形成了张力与摩擦。企业希望拥有高度灵活、可随时处置的劳动力；而国家则希望外国工人处于控制之下。企业要求快速猎身，而国家官僚机构手续繁杂。在美国，获得H-1B签证需要通过4个政府机构：当地就业服务，美国劳工部，美国移民归化局(INS)和国务院，仅移民局就需要4个月时间才能通过H-1B签证。在澳洲，公司不能在确认工作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为外国工人提供入境担保。

这样结构性的矛盾需要制度化的解决方案，IT行业的人海战术与灵活性要求与国家移民制度的管制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中介的产生。

### • 灵活性是如何被制造的

为了解决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中介的功能包括：建立全球劳工数据库，匹配劳工与客户；密切关注市场趋势与技术发展，培训工人使之满足业务需求；增加劳动力储备，稳定劳动力价格；以及躲避劳动法规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Y2K大项目后对于灵活劳动力的需求再次膨胀，印度独特的猎身行业正式兴起。所谓猎身，“身”（而非头）者，简单劳动也；“猎”者，迅捷寻找和购买也（p.7）。之所以独特，其特点有二：首先，猎身行业由三层中介链组成，链条上每一环的代理人都要扣下工人每月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大代理商一年雇佣50名以上员工，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美元，直接与大客户对接需求，但因与工人的距离难以判断其资格并迅速匹配工人，因此需要二级供应商；中等代理商每年招聘15-50名员工，全年管理数量稳定的长期员工，大多由印度人经营，常由IT专业技术公

---

<sup>1</sup> 本文为本科生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业。

司、培训机构等担任；小型代理商，即项飏的研究重点，劳力行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涌现，往往通过非正式关系与直接的朋友邻里等个人关系寻找劳工，以民族网络为其工具。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劳力行（body shops），直接对接工人为其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

通过这样的三层中介链，工人与真正雇主并不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因此雇主可以随时解雇他；当雇主不再需要他，劳力行即可将他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让其坐板凳，即领极低的生活费等待下个职位（p. 6）。第二个不同于传统中介的即是，板凳制度。板凳制度即在尚未确认客户有需求的情况下即赞助一个工人出国，提供微薄的生活费让他闲置在冷板凳上。板凳制度的出现是一方面为了办理签证的方便，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司面试的要求并且保持工人随叫随到。通过这样的三层中介链，逃避了严格的劳动法规，为用工公司减少管理成本，有序地获得了巨大的灵活劳动力市场。

### • 灵活性的成本与代价由谁承受

项飏系统梳理了印度猎身行业的运作模式，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追问，这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其前提，那么由谁来承担培养劳动力素质的成本呢？

劳动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工们的中介费，劳力行向每个去美国的工人收取 10-30 万印度卢比（大约为 17000 到 50000 元人民币之间），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则需要 10-20 万，去新加坡也要 6-12 万（p. 64）。为什么印度劳工愿意花高额买一个不稳定的工作承诺？进一步来说，教育成本也非常高。如今通过猎身而在全球流动的 IT 人才多数出自私立学院，以西方需求为导向进行 IT 职业培训，建造一所私立工程学院至少要投资五千万卢比（p. 38）。那么，为什么印度劳工愿意花高学费与中介费买一个不稳定的工作承诺？如果是一场投资，其回报是什么呢？

首先，与其说是印度劳工愿意，不如说是他的家庭愿意；教育与出国在印度语境下都是家庭投资而非个人投资。其次，印度家庭的动机，我认为可以总结为：IT 梦本质上是阶层固化下的美元梦与移民梦，以及嫁妆制度下的金龟婿梦。这一场投资的回报也许金钱只是一小部分，而更多的是阶层的上升。

阶层固化下的美元梦与移民梦：

“如果你曾经是学校里的金牌学生，而毕业两年后还找不到工作，你就明白为什么了。”这段话引自项飏采访的一位 IT 工人。公立教育系统的鸡肋、高失业率、单一的产业结构与根深蒂固的家族寡头形成了社会阶层固化的印度，社会问题以失业为代表。根据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统计，从 2000 到 2001 年，有半数左右的毕业生都处于失业状态，在西方国家找到 IT 工作要比在印度国内容易得多（p. 63）。而无业的青年相继在婚姻市场上也会屡屡碰壁，形成连锁困境。在这样阶层固化的环境下，印度人渴望通过移民来实现阶层的上升。

嫁妆制度下的金龟婿梦：

嫁妆制度则是另外一条回报的途径。成功的 IT 儿子将为印度家庭赚来数额不菲的嫁妆，比如一个出身卡马或热地种姓、在大公司工作的 IT 新郎可以得到 80—200 万卢比的高昂嫁妆（p. 47）。另外，嫁妆市场上还有“提前预售”之营销策略，新娘的父亲看上哪个男孩子，即以毕业后他和自己女儿结婚为条件出资支付他的大学学费和出国学习费用。如今，昂贵的汽车和不动产已经成为越来越流行的富人嫁妆。因此，IT 还是一个金龟婿梦。面对这两个梦，建造私立学院的钱来自于哪儿？男性外出打工又以什么为代价？项飏继续进一步追问背后的社会结构。他发现安得拉邦的 IT 人士在种姓和区域上都有明显特征，主要来自于当地两大先进种姓群体，即卡马和热地。

首先，农业盈余提供了剩余价值。在他调查的九个村庄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 25% 左右的农业盈余。在全邦范围内，大概 80% 的投入私立学院的投资来自于农业盈余（p. 47）。

表现在，70% IT 专业人士来自安得拉邦的沿海地区，即富有农业区；大地主、教育者和当地政要联合兴办了私人学院，而当学子们向上攀升的时 90%的当地人口仍停留在农业生产中。其次，童工也提供了剩余价值。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童工人口，而安得拉邦(AP)拥有印度最多的童工人口 (p. 45)。最后，性别关系的不平等也提供了剩余价值。多数 IT 人的妻子都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 (p. 81)，保障家庭收入的稳定性，同时在家照顾孩子，以抵御灵活劳动力市场为丈夫带来的不稳定性；同时有记录表明，丈夫在目的地国面临的压力往往助长了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p. 86)。

印度社会内部的城乡、性别、种姓的不平等与国际结构的不平等对接，将印度基层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了精英群体中，产生了有竞争力的 IT 劳动力；而其代价则是农业比重的居高不下与社会阶层的固化，这又让印度陷入了恶性循环。

### • 全球化下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区别

在最后的结语中，项飏用垂直型和三角型分别总结了东亚和印度的“地方—全球”经济关系。两者相似点在于外向型经济。区别点在于，在东亚地区，不同种类的公司参与度更高，大公司负责对接订单，中型公司分解任务而小公司负责实施，整个产业链深入到乡镇，创造了广泛的就业与发展机会。然而在印度，以农业为主的基层社会事实上并未参与全球制造业的分工，而是为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提供农业盈余，其自身停滞在农业阶段，因此并未得到就业与发展机会。非正式部门实则也是中上种姓与农业精英，基层社会只是作为资源基地存在；主导型的 IT 部门建立在非正式部门的基础上，汲取非正式部门的资源，基层的经济价值被不断地向上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阶层固化：东亚的垂直型分工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发展机会，而高度阶层固化的印度社会无力挽留人才，使得人才纷纷移民。

### 思考引申

《全球猎身》刻画了两个新自由主义劳工市场的普遍趋势。对此，我想追问两个问题：

一是，**劳工市场的灵活性会在什么情况下达到顶峰？**猎身业务活跃于两次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萧条期，资本为降低成本而寻找灵活劳工。而在中国语境下，最近的疫情正是我体会到劳工市场的灵活性最深的时刻。疫情使得企业大受损失，为减少成本企业往往寻找零工来替代长期工人；而远程的模式又进一步扩大了灵活性，加深了剥削。在疫情期间，对灵活性的需求达到顶峰，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共享员工。共享员工开始于西贝西北村与盒马的合作：疫情期间，线下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受到冲击，大量员工无工可返；而在线生鲜电商生意火爆，捡货员、打包员、骑手等人手紧缺，由此出现了这种临时性的灵活用工模式——“共享员工”。共享员工从事的工种比较简单，简单培训就能上岗比如打包、分拣、上架、排面整理、仓库整理、一线流水操作等岗位。共享模式一般有三种：一些用工需求大的企业与输出企业及其员工协商一致，签订三方协议借调员工支持生产，还有一些企业则委托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协议；最后一些互联网企业针对疫情专门推出“跨界”用工平台。比如阿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推出了“蓝海”就业共享平台，通过灵活就近的短期用工形式，缓解企业压力；猎聘招聘平台于 2 月初推出“员工共享”计划，为各类业态提供服务。对于共享员工的权利保障，在共享模式下，企业会维护好“共享员工”权益。比如盒马鼓励“共享员工”免费领取保险公司推出的疫情险；哈啰单车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为员工配备好人身意外保险；原企业复工即可返岗。同时，远程办公的模式将在未来为“灵活性”提供新的可能。

其次，**全球产业链中多层中介的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我认为多层中介会带来监管的困难，而在某些产业中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几乎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甚至

渗透进了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中，全球代孕产业在东南亚国家兴起。代孕产业的需求方往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代孕妈妈则来自于泰国、印度、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两者之间的距离则导致了两层以上中介的出现，而其直接的后果是出现了沟通的失效。2014 年泰国代孕行业则出了 **Baby Gammy** 案，一对澳洲夫妇抛弃了代孕母亲生的唐氏综合症儿子，而由 21 岁的代孕母亲主动抚养，后因难以负荷抚养金而上网求助，引起网友们的关注。而在采访中，澳洲夫妇反复强调中介失责，没有提前检测并及时通知他们孩子有唐氏综合症状；同时中介向他们传达的信息代孕母亲有能力并且愿意主动抚养孩子，而自己并没有代孕母亲的直接联系方式；同时，代孕母亲和澳洲父母关于孩子的病情的信息也不一致，代孕母亲表示自己很早就做了检测，而澳洲父母表示中介告知他们时已无挽留之地。多层中介带来了信息的滞后与不一致，是 **Baby Gammy** 悲剧的原因之一。

# 课程群里，我为何不愿说“谢谢”

沈新湜<sup>1</sup>

## 一、导语

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大学共同参与的“亚洲政治人论坛（AFPLA）”上认识了佐仓同学。他是东京大学政治系的大三学生，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交流。

佐仓在北大修读了一门通识课。期中后，老师在课程群里发布了对于作业的集中点评，同学们纷纷回复“谢谢老师”。两百人的课程群一下子热闹起来，群里充满同学们的感谢声。

这让他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谢谢？这很没意义[1]。”我想都没想：“因为老师发了作业点评，大家想表达一下谢意，或者表示礼貌吧。”佐仓不认可我的解释：“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这样。如果真的有必要表示感谢的事，你应该正式地写一封邮件。大家都在群里说谢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我觉得这在日本的大学难以想象。”

我不知道是佐仓误用了“恐怖”一词而言过其实，还是他真的觉得大家都在群里说“谢谢老师”是“恐怖”的事情；不管怎样，他直到最后也没有在群里说出那声“谢谢”。这令我感到疑惑：确实，很多人说这句“谢谢”时没有那么认真，但不过是发句消息而已，这难道不是既平常又简单、对日本人来说也非常自然的礼貌之举（act of courtesy）吗？

“在课程群里说‘谢谢’”，这样一件课堂相关的小事，由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和阐释方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笔者希望探究这种差异背后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族裔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如何影响我们对异文化的理解、我们又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文化差异甚至冲突。

## 二、秩序与自由：族裔中心主义与“他者”审视

疫情爆发前，佐仓结束了在北大的交流生活。我和他聊起对中国的印象，佐仓说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在一些问题上摇起了头：“如果要我说中国学生的缺点，有两个：一个是很多学生缺乏公共意识，不懂得为别人着想；另一个是很多学生缺乏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说与别人不一样的话。”

他再次提到了同学们刷屏“谢谢老师”的例子：“老师根本不需要这种礼貌。课程群本来就是发送重要通知用的，大家都不敢关闭消息提醒。如果两百个人都说一次‘谢谢’，微信就要提示两百次，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内容。这对于老师和其他同学来说是巨大的麻烦和困扰，可是学生们完全不考虑这些。他们很少想到别人。”

提到第二个缺点时，他补充道：“一个人说了‘谢谢老师’，大家就都跟着回复。有的人都没有看老师发了什么内容，只是复制粘贴。”

社会学与人类学家都对日本文化抱有研究兴趣。最为著名的应数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民族文化及其人格的矛盾特征，认为相较于盛行于欧美的“罪感文化”，日本风行的是“耻感文化”。个人犯的错不能通过告解、道歉、祈祷得到宽恕，而将永远受到社会的审判和惩罚。在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中，“情义”“恩惠”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给别人带来麻烦”意味着一种莫大的亏欠，需要在日后的交往中不断弥补（本尼迪克特，2012）。翟学伟（2016）进一步对“耻感与面子”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日表面相似的“耻感文化”内部有着细微的差别，因为“脸”和“面子”可以具有异质性：“脸”是自己的，“面子”是别人给的；与

<sup>1</sup> 本文为本科生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业。

日本倾向于制止、警告甚至嘲笑公然违背社会规则的法则不同，中国人倡导“得饶人处且饶人”和“不看僧面看佛面”，因此对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采取了更大程度的宽容。

人类学强调濡化（enculturation）的概念。对于社会中成长的个人来说，濡化是贯穿其生命过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习得文化，社会影响着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建构；从最基本的生理习惯，到主宰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人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濡化过程的型塑——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就形成了本尼迪克特研究中的“国民性格”。

佐仓作为在日本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个人，也有一套符合日本“国民性格”的处事哲学和行事风格；中国及其社会创造出的文化对他来说就是“他者”，而他不觉地利用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对其进行审视。在日本的文化习惯里，“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人们总是自觉考量一种行为会对他人带来什么影响、自己会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对他人、对社会有所亏欠或是遭人耻笑。即使是在微信群聊里“刷屏”致谢这样的小事，也会因为会“打扰他人”而被看作是对基本社会规则的违反，是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

佐仓说到“中国学生的第二个缺点”（“缺乏自己的想法”）时，不仅举了课程群跟风说“谢谢”的例子，还提到对于“爱国主义”的反感。他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太露骨了”“难以理解”，不是政治教育的“理想模式”。这种判断也有族裔中心主义的影子：日本人的现代政治观念源于“全盘西化”的改革历史，是一套完整的西方“舶来品”。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制定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的法律和教育制度，有意在教育中弱化对“国家”“政权”概念的强调。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下，“爱国主义”只是政治观点的一种，是右派的代表政见之一，在价值上是中立的；鼓吹爱国主义会被看作是某一派的政治宣传，在一些场域是不合时宜的（比如校园，“官方的”“露骨的”政治宣传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在警惕军国主义复辟的文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是军国主义遗存的象征，鼓吹爱国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保守的政治思想，还有充满创伤和恐怖的战争历史。

族裔中心主义的思维具有“偷懒”的特质。在以某一种文化（往往是评判者自身熟悉的文化）审视“他者”时，人们总是关注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并因此简化了理解文化过程中理应考量的诸多问题。它首先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误读，引人在对异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境下妄下断语；再而制造了理解和交流的障碍，使得对所谓“落后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失去了价值；同时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垄断，使得“先进”的一方总是居于“审判”他者的位置，从而影响了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佐仓在濡化过程中受到日本秩序观、自由观的影响，并运用这一套价值系统批判在中国社会中经历的文化事件，也显示出了这样的族裔中心主义色彩。

### 三、面对文化冲突：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

当佐仓认为在课程群里说“谢谢”是给他人带来麻烦的无意义之举、很“恐怖”时，我承认他的想法有几分道理，但对将大家谢意的表达简单地解读为盲目跟风、忽视他人的感受感到不能认同。从我的角度出发，课程群毕竟不是公告栏，它营造了一个沟通的环境，就有必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互动、作出回应。或许收到重复的消息提醒有些“没有意义”，但如果老师发了什么东西、同学们毫无反应，给人的感受不是大家为彼此考虑，而是人际氛围非常冷漠。当有一部分同学在群里表达谢意时，也会给人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虽然作为学生整个群体的心意可以由部分同学代为表达，但此时不说些什么会显得不懂感恩、没有礼貌。这种情况下大家“刷屏”感谢，不是为了跟风而跟风，而是对于这种社会秩序的遵从和维护。

如果用“面子”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感谢也是一种“给面子”——若无人回应，老师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很“没面子”；如果自己不参与“刷屏”，可能会被他人认为是不礼貌从而“丢面子”。与之相比，消息提醒带来的一点麻烦很快就可以被大家忽视掉——更何况，日本因为给别人带来麻烦而感到亏欠的心态在中国的“国民性格”里并没有那么明显：与“不为给别人带来麻烦感到极其愧疚”相对应的，就是“不为别人给自己带来麻烦感到出离愤怒”，最终

的结果是相安无事、一片太平；中国同学一般不会对这个举动想太多，既不会觉得给别人添了很多麻烦，也不会觉得被添了很多麻烦。

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强调“要了解和认识某种文化，必须从这种文化自身的价值和信仰入手，而不是采用其他文化的标准”（哈维兰，2006）。与族裔中心主义相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无法用所谓科学标准来确定孰优孰劣。在这种视角下，受到佐仓批判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有了更多合理性，很大程度上也就不构成“缺点”和“不足”了。前文已经分析过课程群里“刷屏”致谢的例子，对爱国主义的宣传也是如此：这并不是极权的、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需要改革甚至革命铲除的落后产物，而是根植于中国国家国文化传统、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可行取向。

#### 四、冲突的未来：理解文化是否有“金标准”？

文化相对主义似乎能够规避一些误读和贸然的批判，但如果认为它能够解决理解文化冲突的所有问题，未免就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佐仓在提起中国学生“两大缺点”的同时，也涉及到一些似乎不太引起争议的问题：比如“缺乏公共意识”，也体现在许多中国同学将共享单车随处乱放、在教室门口放雨伞堵塞通道、在满了的垃圾箱周围继续堆放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中。

那这种“不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作是来自族裔中心主义的“审视”呢？从纯粹经济理性的视角出发，“不文明”本身未必带来低效率，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比如共享单车可以“乱中有序”，因为按固定位置和标准化方式停放会给停车人带来麻烦、耽误时间，如果大家能维持现有的“最低限度的体面”、然后雇专人负责重点区域整理，可能反而会实现分工带来的高效；雨伞撑开有利于雨水快速风干，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放伞位置的情况下堵住过道也是效率较高的选择，毕竟通过的人可以稍微挪动伞的位置，不会造成很大麻烦；在垃圾箱周围堆放垃圾虽然不美观，但清运人员集中处理起来很方便，如果大家看到满了的垃圾桶就把垃圾继续拿在手上之后再想办法（实际上，佐仓比照的最佳实践应当是像日本一样，街道、商场基本上没有公共垃圾桶，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可能是为了公共区域的一点“好看”牺牲了太多的个人利益了。

戴季陶（2005）在《日本论》中从三个方面概括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信仰力、尚武、爱美。对于“爱美”，日本人有一套独树一帜的美学系统，按戴季陶的说法，“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对于何为“文明”，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的认知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日本和西方影响的；在日本人对中国“不文明”的批判中，也存在从日本人的美学系统出发形成的偏见。

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化所接受的普适性价值观是否就不存在呢？一种在某种文化系统里有所根基（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文化，是否可能有某种内在的“矛盾”（inconsistency），从而形成类似马克思所言的“虚假意识”？如果族群间的文化难以作优劣比较，那同一族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文化形态是否可以有层次之分？如果可以，那所谓“先进”的地区，是否可能以局外人和发展先行者的视角看到更“高级”的文化层次？实际地说，当我们自主反对“不文明行为”的时候，我们是与“落后文化”做斗争，还是内化了来自“他者”的族裔中心主义判断？这种反对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如果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解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的“金标准”，很容易落入虚无主义，似乎一切基于文化的价值判断都是不必要、不合理的。这不仅会合理化“不文明”，也会合理化纳粹主义、陋习（如割礼）、性别/种族歧视等等。考虑到族裔本身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族裔与族裔的“相对”其实理论上尚有高榘的空间。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相对主义呈现出一种割裂族群文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对可能的共享价值的考量，而共享价值的存在意味着人们有理由在这一框架内进行有限的评判，从而在应对文化冲突时探索出

一条族裔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中间路径”（这并不意味着要保留一部分基于族裔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试图回避机械奉行文化相对主义造成的虚无）。

## 五、结语

“他者”长期以来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中心概念之一（人类学者甚至会因为其重要性而选择将“the Other”大写）。从人类学的发端来看，“异文化”就是众多人类学家的学术旨趣所在，对异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包括理解和阐释的方式）也就推动着人类学的发展与进步。时至今日，对“他者”的研究早已不再服务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猎奇，而是成为“文明冲突”背景下真正想要进行的文化沟通的需要。

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受殖民传统影响的族裔中心主义（甚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应和批评。不过，当下的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内部越来越被视作一种“基本的道德立场”，而不是“灵活的方法论”（Li，2007）——换言之，将其固执地、僵化地推广成理解“他者”的“金标准”将是问题重重的，但怀有跳脱族群中心主义的意识、保持对异文化的理性关切则确有必要。

似乎留下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共享的价值，要怎么找到这种价值？如果能够对“他者”进行审视，从什么角度去批判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合理”？“审视”这个词就暗含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对待“他者”，或许更应采取一种“凝视”的姿态：一方面，仔细端详异文化及其立足的土壤，做到对异文化怀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审慎；另一方面，放下贸然的价值判断，如果要做批评，也从该文化的内部寻找矛盾（inconsistency），而不是将外在的价值观凌驾其上。

至于能否有一种“科学”的方式寻找共享的价值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没有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重要的是在偏见与虚无之间找平衡、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对“发展”保持必要的文化自觉和警醒。

## 参考文献：

- 本尼迪克特，鲁思，2012，《菊与刀（增订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戴季陶，2005，《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
- 哈维兰，威廉，2006，《文化人类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翟学伟，2016，《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社会学研究》第1期。
- Li, Xiaorong 2007,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6(1).

## 注释

[1] 佐仓的汉语水平很好，日常沟通和学习基本无障碍。我与他的交流中约有70%的时候使用汉语，20%的部分使用英语，10%的部分使用日语。文中引述他的话时，尽可能按原文予以呈现。



辑四 复旦人类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选



## 编者按

杨炜晔的硕士论文关注上海老龄社区加装电梯的问题，这一议题的切入点虽小，但是在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问题的当下，是实实在在的有价值的研究。人类学研究需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即有理论指导，杨炜晔的研究重点参考了 F.G. Bailey “规范法则(Normative Rules)”和“实用法则(Pragmatic Rules)”的概念，前者指社会的公共、官方或者说理想型的规则，是行为的普遍指南；相比之下，后者虽偏于理想规则，但却是现实中人们实践的规则，老旧社区的加装虽有写下来的指南，但是却无济于事，现实自有其本身的逻辑，杨炜晔的研究将这套现实本身运行的逻辑解释地较为透彻。所谓立地，即有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上海虽然推出了加装电梯的种种措施和政策，但是成功装成电梯的楼房只占少数，加装电梯对于老年人日常出行无疑大有好处，解释为什么装不上电梯，无疑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的问题。选好题，论文就成功了一半，杨炜晔的论文选题或能给读者朋友些许启发，向“顶天立地”的研究迈出一大步。

#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技助老项目研究 ——以上海市 Y 街道老龄社区加装电梯为例

杨炜晔<sup>1</sup>

**摘要：**近年来，在上海的老龄化社区内通过加装电梯来改善生活设施和方便照护老年居民，已经是科技助老常态化话语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政策支持和居民的迫切需求之下，成功实现加装电梯的楼栋数量仍非常少。加装电梯项目的流程及困境是什么？在加装电梯项目中，影响困境出现的因素有哪些？对于加装电梯的困境又有哪些对策？

本文以社会工作与科技助老相关学科的视角和概念为出发点，聚焦上海市东北角的 Y 街道，围绕加装电梯项目的流程、加装电梯项目的困境、加装电梯项目困境的影响因素、加装电梯项目困境的对策进行了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对于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所获得的资料进行了描述性、解释性的分析。

首先，文章从政策文本和不同主体的实践经验出发，发现加装电梯的流程分为协调阶段、建设阶段和建成阶段。其次，加装电梯流程中存在四大困境，分别为带头人身份困境、资金筹措困境、利益协调困境和责任承担困境。接着，本文指出加装电梯带头人身份困境的影响因素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不足；资金筹措困境与利益协调困境的影响因素是缺乏协商文化；责任承担困境的影响因素是加装电梯多元主体目标混乱。最后，本研究提出需要创新加装电梯服务模式、培育协商文化、总结实践经验并形成最佳实践、改进政策文本，以解决上述困境，从而提升老龄化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实现科技助老。

**关键词：**科技助老；个案研究；加装电梯

---

<sup>1</sup> 杨炜晔：复旦大学 2021 届社会工作毕业生，导师为潘天舒教授。

## 编者按

刘斌娟的硕士论文关注产前基因检测中的风险话语与实践，通过扎实的田野研究（历时一年半），向读者讲述了产前基因检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生产了孕育过程中的“风险”；同时勾勒了不同的行动者面对风险是如何抉择和行动的，个体生活是如何被风险话语所塑造的。这项研究具有较大的反思意义，让读者思考“技术为何”，技术是如何和政治、道德、文化等勾连在一起，形成地方性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在这个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中，对技术多一份思考，尤其是关涉“生老病死”的医学技术；这项研究也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正如刘斌娟在结语中所言，“我们需要询问的是，怀孕的女性真正需要什么？尽管基因检测也属于一种产前护理，‘照护’却是在这段风险经历中所缺失的部分。”在现有的医学实践中，一切围绕“技术”展开，但是我们忘记了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从技术回到人本身，是刘斌娟的研究给读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所提出的有益的建议。最后，刘斌娟从有研究想法，到进入田野，到收集一定量的数据进而分析的这个过程，值得读者朋友注意，刘斌娟的研究选题和自己原有的专业背景高度相关，跨学科的背景让她有了开阔的视野，而扎实地做一个田野工作者，让她的论文立得住。

# 产前基因检测中的风险话语与实践： 以上海市某胎儿医学中心民族志研究为例

刘斌娟<sup>1</sup>

**摘要：**对未来疾病的风险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生命技术的一个典型特征。本研究聚焦于产前基因检测中的风险的话语与实践，以探究对于风险的理解怎样由产前基因检测的地方条件所塑造，又怎样转变着基因检测、遗传咨询、诊断与选择的地方实践。基于在上海的一个胎儿医学兼产前诊断中心一年半以上的田野研究、访谈和文本分析，本文试图呈现产前基因检测技术的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的多元叙事。本文首先分析了在我国人口健康政策的背景下，出生缺陷如何被建构为需要通过产前诊断来进行管理的风险，以及在当地临床实践中，通过“风险”和“选择”的话语，使用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如何成为父母们的责任。接着，本文探究了不同行动者如何解释产前基因检测的诊断结果，这种诊断结果在遗传学中通常被表示为风险统计数据的预测。田野案例表明，在遗传咨询中，临床医生对疾病的风险评估是情境性的，孕妇和家庭对风险的态度和反应也非常复杂和多样，尤其是在检测结果提示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时。这些发现揭示了产前基因检测技术的生产和实践并不是独立于文化的中立过程，而涉及到各种地方形式的科学、医学、政治和道德。这项技术的生产也形成了新的疾病类别、医学知识、风险解释和诊断的形式。

**关键词：**风险，产前基因检测，产前诊断，遗传咨询，选择

---

<sup>1</sup> 刘斌娟：复旦大学 2020 届人类学毕业生，导师为朱剑峰副教授。

## 编者按

本文是以人类学视角观察、记录和剖析居家养老体系建设。其呈现的田野数据质量，就深度和针对性而言，比起那些动不动就甩出模型和统计数据，“科学”证明一些常识的定量研究，要宝贵的多。尽管作者在运用理论来阐释研究问题时，还有不少瑕疵。在国内耗资巨大对老龄化和养老实践进行研究的诸多文本中，这是极少的一篇采用质性方法而且接地气得政策人类学微型民族志。

# 民族志视角下的居家养老服务： 基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田野研究

沈高明<sup>1</sup>

**摘要：**自 2003 年起，上海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希望以社区为依托，使得老人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养老服务。而在运作过程中，由于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单一、覆盖面狭窄，因而出现了养老服务总体供给不足与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存在着一定缺陷。本文以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概念为出发点，采用写作微型民族志文本的方式的，着眼于居家养老服务是否能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对上海市中心城区某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和反思。同时，本文也试图挖掘社区与家庭对于老人的意义，为探索更为合适的居家养老理念和模型提供相应的民族志案例。

**关键词：**居家养老服务，照护实践，老人需求

---

<sup>1</sup> 沈高明：复旦人类学 2017 届毕业生，导师为纳日碧力戈教授。

# 制造需求： 人类学视角下 HPV 疫苗推广的话语实践研究

王佳蕊<sup>1</sup>

**摘要：**接种 HPV 疫苗已被临床认为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有效预防措施之一，然而在疫苗研制成功的这十年中，在全球范围内，围绕 HPV 运动产生了激烈的政治、伦理和公共健康辩论。基于这一背景，笔者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进行关于 HPV 疫苗市场推广话语的田野研究，以微型民族志文本为写作方式，力图呈现当代中国医疗免疫市场与都市女性健康认知之间的互动、联结与碰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流动如何在国家、医药企业与潜在消费者之间展开。

首先，本文从国家视角出发，考察在 HPV 疫苗尝试进入中国市场的十年之间，国家话语从“回避”到“审慎批准”再到“加速供应”的转变过程，探究这种转变背后所反映出的女性健康与国家生育计划之间的互动与联结，以及大众传媒将女性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程度与国际地位的衡量标准，并使疫苗藏匿于“健康需求”和“疾病风险”的包装之下；最终通过“病人”这一媒介来对社会文化起到支配作用。

其次，通过与医药代表的深度访谈，笔者试图呈现医药企业之间如何展开有关 HPV 疫苗推广的商业博弈，在此过程中，商业机构瞄准当代女性对自我健康管理这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追求，将接种疫苗视作对自我健康负责的现代性行为，由此，“健康需求”被重塑，成为消费市场引导的结果。同时，笔者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固定田野点，长期深入考察疫苗的推广活动如何落实在社区的日常实践中。

最后，面对国家与医药企业共同制造的“健康风险与需求”，笔者试图分析个体如何理解 HPV 疫苗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以及这种理解背后所映射出的文化隐喻。

**关键词：**HPV 疫苗 制造需求 现代性与风险 道德隐喻

---

<sup>1</sup> 王佳蕊：复旦人类学 2019 届毕业生，导师为朱剑峰副教授。

# 多重语境下的“规范治疗”： 基于重症肌无力罕见病的民族志研究

张路尧<sup>1</sup>

**摘要:**重症肌无力（MG）是由神经-肌肉连接处传递功能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种慢性罕见疾病。本研究以公益病友组织 AL 重症肌无力关爱中心为向外散射的田野中心点，通过一年以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和文本分析，探讨重症肌无力“规范治疗”这个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不同主体所强调的不同意义。重症肌无力罕见病的“规范治疗”话语是在现代国家公共卫生治理和医疗法律化的大背景中所产生的。在推动这种话语的过程中，各种代理人纠结于自己的利益和议程，其中包括制药公司、临床研究人员、公共卫生学者以及患者团体。首先，本文通过叙述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疾病叙事，展现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其次，我们关注各种报道人中广泛流传的“规范治疗”的话语。“规范治疗”为患者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方案，以便及时进行诊断和治疗。然而，如论文所示，在现实中，“回归正常社会”或“与疾病和平相处”的目标从未完全实现。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我打算展示病人对“规范治疗”的理解和实践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像其他疾病一样，罕见的疾病并非是一个符合医学诊断狭窄分类的实体。病人的疾病叙事是加深我们对个人和社会痛苦理解的重要工具。我们还需要考虑卫生机构、制药公司、专业人员和患者组织等多重因素，以管理疾病，分配社会资源，并最终改善患者的福祉。

**关键词:** 重症肌无力，慢性罕见病，规范治疗，话语，医疗实践

---

<sup>1</sup> 张路尧：复旦人类学 2021 届毕业生，导师为朱剑峰副教授。

# “活在当下”： 中国当代都市正念身体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陈若云<sup>1</sup>

**摘要：**基于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对于正念身体实践的田野研究，本文力图呈现当代中国都市中的正念练习者对于身体不同的认知、理解、论述和使用，并进一步探讨在正念实践中权力如何流动、主体如何被塑造成型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健康政策趋向于强调个人承担起自我健康管理责任。正念以“心理学疗法”的面貌被从欧美国家“进口”到中国后迅速流行，成为心理学爱好者以及热衷“自我探索”的群体新的健康消费选择之一。通过对近年来大众媒体中正念流行叙事的检视，本文指出公共空间的正念相关话语表述将身体描绘为“存在潜在问题的”，但同时也是“可塑的”存在，并将正念消费定义为能够将个体从被“现代”工作生活物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灵药”。对于正念实际实践过程的具体考察则表明，正念权威群体主张的“自我疗愈”实际上要求个体将生活认知为一个又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并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分每秒施加对身体感受的觉察、审视和监管。正念与“科学”、“医学”等权威知识合力对个体身体规范和行为规范的要求，体现了知识/权力对于主体的塑造和作用。面对正念倡导者所要求的“活在当下”，正念实践主体对于“什么是正念”、“个人如何实践正念”的个体性经验揭示出个体在特定身体规训程序面前的能动性，在市场力量、权威话语、知识权力和个体追求“理想自我”实践的互动中，动态的、复杂的、多元的“疗愈”主体不断被生产出来。

**关键词：**正念 身体实践 权力 凝视 主体

---

<sup>1</sup> 陈若云：复旦人类学 2018 届毕业生，导师为朱剑峰副教授。

凯博文 著 姚源

The Soul of Care

# 照护

哈佛医师  
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

医学人类学奠基人凯博文用亲身经历书写：面对一场终将“失败”的战斗，我们该如何抗争与坚持？

我们都曾是、正是或将是所爱之人的照护者。

闻云翔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吴 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序推荐

景 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 林 中国科学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徐一群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于 是 翻译、《查无此人》作者 联合力荐

中信出版集团

Old Age, in a New Age  
THE PROMISE OF TRANSFORMATIVE NURSING HOMES



BETH BAKER

NUMBER OUR DAYS  
BARBARA MYERHOFF



A TRIUMPH OF CONTINUITY AND CULTURE AMONG  
JEWISH OLD PEOPLE IN AN URBAN GHETTO  
"AN OFTEN FUNNY, ALWAYS DEEPLY MOVING NARRATIVE  
OF HUMAN DIGNITY AND COURAGE"  
— CHARLES SILBERMA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Copyrighted material

DEMENTIA  
CAREGIVERS  
Share Their Stories

A Support Group  
in a Book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  
合作研究中心

Filial Piety *edited by Charlotte Ikels*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Michael Herzfeld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y



No Aging in India  
Alzheimer's,  
the Bad Family,  
and Other Modern Things



LAWRENCE  
COHEN

MAKING  
GRAY GOLD

NARRATIVES  
OF  
NURSING HOME  
CARE



FOREWORD BY  
CATHARINE R. STIMPSON

TIMOTHY DIAMOND